

欧洲共产主义 与社会主义

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51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 与社会主义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钟 溪 译

EUROCOMUNISMO Y SOCIALISMO

por

Fernando Claudín

马德里二十世纪出版社 1977 年 10 月第三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钟 溪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2,000 字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200

书号 3001·1838 定价 0.47 元

（只限国内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版说明

费尔南多·克劳丁在三十年代曾任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后来参加反佛朗哥独裁的斗争，担任过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4年，克劳丁与西共领导发生分歧，被开除出西共。目前，克劳丁担任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创始人）研究会会长。

本书是克劳丁的近著之一。他在书中叙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及其内容。作为欧洲共产主义产生的背景，著者分析了六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危机，以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政治危机，剖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苏联社会出现的问题，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际共运的分裂，苏共对其它党和国家的干涉等。著者认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意、法、西等国的共产党摆脱苏共的控制，根据本国的情况来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才产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作为实现这一理论的纲领。为了供国内理论界研究、参考，我们特将本书翻译出版。

克劳丁还著有《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是政党危机吗？》、《马克思、恩格斯及1848年革命》等书。

第三版前言

本书第二版在1977年6月发行后不久，由于莫斯科对圣地亚哥·卡里略和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欧洲共产主义问题就成了当今世界的头号新闻。这一事件和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在这次再版时加写了最后一章。其它章、节未作任何修改。

费尔南多·克劳丁

1977年9月

目 录

第三版前言

一、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抉择.....	1
欧洲共产主义现状	1
危机的性质	5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危机	14
二、欧洲共产主义与莫斯科.....	24
冲突的历史根源.....	24
从1956年到东方的分裂	32
“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37
走向西方的分裂?	46
关键的问题是制度的实质.....	58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63
历史经验	65
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	100
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尝试	111
民主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122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139
四、朝“西方分裂”迈出的步伐	152

一、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抉择

欧洲共产主义现状

1970年末,在各国报纸的前几个版面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这个词就是“欧洲共产主义”。在政治语汇中这个词很快地就红了起来。这个词不是执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的那些党所发明的,但那些党的领导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提法,这主要是指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在1976年6月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上曾说:“这个词不恰当,不存在一个欧洲共产主义”。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柏林会议上也避免提这个词,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却非正式地接受了这个词,贝林格说:“这个词并不是我们发明的,但这个词表明人们对于西欧国家能去探索和解决用新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期望是多么的广泛和深刻。”^①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事实上柏林会议本身就已是欧洲共产主义这个现实很好的证明。

就反对这个新词的合适与否,有两种争论的论点:一点是关于东欧国家的问题。那里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们也属于

^① 见各党公布的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6月23日至24日)。

欧洲。如果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个贬义词，显然不能包括这些党；另一点是，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力量很强的日本共产党的看法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欧洲共产党的看法又十分相似。

这两种论点有共同之处。事实上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各自国家内想解决一些相似问题而制订的方针。从这一点上看，在共产主义之前再加上欧洲二字是不那么严谨的。但也并不是那么十分不确切，因为，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欧洲萌芽的。总之，正象平常对一个新现象的命名那样，约定俗成，欧洲共产主义也正是这样。在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之后不久，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开始接受欧洲共产主义一词了。卡里略在报告^①中说：“谁也不否认，在柏林会议上有些人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倾向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一般的构思，欧洲共产主义使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性的共产党在一系列根本性的立场上一致起来了。不管这些党是欧洲的也好，不是欧洲的也好。”

属于这一倾向的有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典、日本等国的共产党。到1976年年底，卡里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保留好象完全消失了，他还提出了“走向执政的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公式。^②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具体行动中两点十分突出：1. 试图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情况下的过渡

^① 在罗马举行的西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第32页，1976年7月28日至31日西共出版。

^② 见1976年12月16日《工人世界报》。

战略结合起来；2. 把这些党同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分开来。继六十年代的“东方分裂”之后，欧洲共产主义已隐现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分裂”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危机中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①

如果说欧洲共产主义当前声望很高，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和实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目前的危机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抉择提到了日程上来。特别是在南欧的三个国家中，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同政治危机（天主教民主党、戴高乐派、佛朗哥主义）结合起来了。在意、法、西三个国家里，大有左翼成为多数和领导力量之势。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内，共产党已成为左翼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意大利的情况，即使共产党还不是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使欧洲共产主义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的理论，使它超出欧洲的范围，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再次爆发，自本世纪以来，欧洲人第三次看到必须对社会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了。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由此爆发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主要的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二次是以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危机达到顶点。其主要的革命结果是法西斯强国失败了，并为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其它反帝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和与苏联邻近的东欧

^① 导致这一总危机的历史过程可见《共产主义运动危机》巴黎 Ruedo Iberico 出版社 1970 年。

国家内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两次危机中，国际工人运动还都没有条件给资本主义危机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出路。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当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构想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完成的。首先是在古老的沙俄帝国，以后在苏军为打败法西斯军队到过的国家内旧政权又被打碎了，但没有紧跟着就实行工人和人民的民主。只有这种民主才能使劳动群众真正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进行革命的改造和越来越多地参与对社会的领导。相反，在推行工业化和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剥夺了劳动者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自由，又产生了一个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和中欧的工人运动和整个民主力量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以及其它国家陷入法西斯独裁和半法西斯独裁的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胜了法西斯，工人运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进行了社会改革，维护了民主（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为争取民主也进行了斗争），工人阶级的组织有所加强。但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框框之内进行的。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国保持了二十年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和相对的政治稳定。与此同时，“风暴地区”（从1914—1945年基本上还是在欧洲）已转向帝国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区。这是在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现经济“奇迹”的时期。当时有人说资本主义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有能力实行计划和自我调节、工人阶级不可逆转地要加入资本主

义体系,马克思主义已经老朽了。但是从1967年国际货币危机和1968—1969年法国、意大利出现了社会、政治危机起,新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又开始罩上了乌云。法国的“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的“热秋”是一种爆发性的征兆,而绝不是夏日里转眼即逝的暴雨。那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新的全面危机又开始了。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这一危机的产物,并在这一危机中经历着考验。欧洲共产主义所起的作用对其未来有重要的意义。

危机的性质

这次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社会和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在大多数场合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危机的普遍性已经很清楚。在欧洲的拉丁语系国家内(也是欧洲共产主义主要舞台)政治方面的危机即使未占主导地位,也有这种趋势。

在所有西方国家基本的、共同的形势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危机的时间长(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结构危机),它是继1948年至1967年(在美国从1940年)经济持续发展之后出现的。

正如前几次危机一样,这次结构危机的根源在于先前的积累方式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些起着推动作用的工业(这主要是汽车工业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等)也不行了;劳动的国际分

工已经不行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中心和其他边缘的关系已过时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如此)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促使剩余价值长期飞速地增长，因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利润率也不断飞速地增长。比如，曼得尔^①就强调了下列这些因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人运动由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而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由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头十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大的移民运动和众多妇女要就业，这就使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大量地增加了；原料相对价格下降了，固定资产相对消耗也减少了。尽管半自动化有相当的发展，但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固定资产并没有象想象的那么迅速增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利润率一直很低，现在利润又重新上升了。这种情况有力地促使生产资本进一步地积累，并且对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部”战争以及各国日益加紧重新武装自己的军事需要刺激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不断的发展；而科技研究的不断发展又转过来推动第三次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首先具体表现为半自动化，它改变了所有的工业部门生产过程，也改变了流通领域里的许多部门，这就有力地刺激了投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些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因素改变了特点。储备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在一系列国家里实现了充分就业。这就打乱了劳动市场的力量对比关系，工人斗

^① 曼得尔《1974年至1976年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萧条》，《政治经济学批判》1976年4月—9月号第24、25页。

争的高涨使得剩余价值率停止上升,开始停顿甚至是下降了。比较起来,原材料价格一直很低,对原材料部门的投资也很少(相对来说,原材料部门投资的利润就比装配部门少),原材料生产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结果反而导致原材料价格猛烈上涨,使投资重新集中于这一“初级”部门。经济持续发展时期一直靠在主导部门投资获取的超额利润又称垄断资本利润为这些部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投资,结果反而使这些部门的资本大量过剩,超额利润越来越少。这样两种“平均利润率”(一个是占有超额利润的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另一个是竞争最凶的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即使不相等,也至少是接近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开始衰竭了。相继而来的则是不再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而是将以前阶段所试验和引进的技术加以推广和普及。曼得尔判定,所有这一切最终使利润率不断下降,结果只能是资本积累的显著减少和在一个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在这一结构危机中又出现了1974年至1975年临时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或倒退。^①这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第一次发生的大的生产过剩危机。正象1929年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样,这次危机是由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极大地减少了投资而造成的(而投资减少又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引起的)。1973年和1974年上半年官方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压缩了投资,但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几年以来各国政府利用通货膨胀为手段来防止利润率下降造成的结果。

长时间的结构危机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即使在复苏

^① 这次复苏时间很短,但是相反倒退延续时间很长。

时期萧条仍然占据了支配地位。注意到这种情况才能明确欧洲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看到，虽然这次危机和以前的危机有共同的特点，但是这次危机与以前的危机也有重要的不同点。

首先，与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西欧工人阶级以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力量来对付这次危机。工人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抵抗斗争的主将之一。在二十五年多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加强了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到部分的改善和进行了部分的改革，在一系列重要的时机中开展了攻势，特别是在南欧（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南欧诸国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汇合在一起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实现了充分就业或几乎是充分就业，实现了滑动工资制。这就为工人阶级的需要和认识这些需要提供了一个新的客观基础。此外，在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中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现象，例如提出了企业中工人权力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现行制度有更大的冲突性。

也就是说，在经济持续发展阶段，欧洲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斗争（也包括不少由改良主义组织领导的斗争）越来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即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无法“合理”地适应资本主义本身合理性的要求。目前，工人运动所争取到的成果、工人阶级新的力量和觉悟极大地限制了资本主义领导中心为克服或缓和结构危机进行干预的活动范围。

第二，这次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的另一不同点，是原帝国主义殖民地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和人民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为争取独立和经济发展进行着斗争。二十五年

多以来,美国玩着“非殖民化”的牌,一方面要削弱及控制欧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是要为当地的统治阶级提供可能,使它们来对抗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力量。虽然这一策略在一系列国家遭到了失败(如中国、越南、古巴等),但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加强了统治权,并得到了帝国的某些让步。和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这个新的因素(过去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有了人民运动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资产阶级,它们对经济和政治进行积极的干预)破坏了帝国主义体系中中心和边缘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合理性”,也大大限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中心的反危机政策。

第三个区别,这次结构危机与前次危机不同的特点(与前两个因素相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相比是对当前资本主义的补充)是当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了。新资本主义关于发展与消费的理论认为新资本主义有能力避免更大的危机和实行计划经济。如今这种理论造成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是这种破灭不应又使我们对它相反的理论寄予幻想。事实上,在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集团相互交错的关系和跨国公司不管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支配和领导中心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在不断扩大和巩固。这一切使国家可以进行比两次大战之间的时候更有效的干预,以减小矛盾的爆发性,靠通货膨胀与通货收缩相结合的办法维持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到目前它就避免发生1929—1933年那样的生产剧烈下降,使失业的规模没有达到那几年的水平。

当然,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指

导中心的干预能力比三十年代大的结果，也是因为工人阶级斗争能力也比三十年代更强大的结果。但是，相对而言，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的高低、干预能力的大小，是以它对付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力量的能力大小来衡量的，所以到目前，资本主义得以避免其经济—社会机器的骤然断裂（但它的前景仍象一个画饼）。它所面临的结构危机的深刻程度和长期性是它无法避免的。它还不能避免平均增长率的下降，也不能阻止失业达到最高点。没有彻底的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只能靠“紧缩”政策作为必须的补救办法。当1975年下半年开始的复苏在整个形势中刚刚有一点效果时，却又预示了1977年的增长率将有新的下降^①。认为是一次严重而无法预料的危机的看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认为这是一次还算温和且易于忍受的危机的观点也同样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如果说采取的措施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避免了灾难性的不协调，那也是靠延长危机的时间为代价的。

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是在思想、道德的全面危机或是“价值危机”的环境下发展的。这一危机有其深刻的实际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很难衡量出来。新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靠工资生活的广泛阶层曾经幻想（尽管要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资本主义有能力保障充分就业和不断提高购买力。如今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不仅如此，而且这一信任危机也影响到统治阶级，影响到其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与这一危机相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犹

^① 根据1976年11月22日—23日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会议的报告。

如一个巨大的冰川，被揭露出来的水门事件，洛克希德公司事件不过是这个冰川露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就是在丑闻中赖以苟延残喘。

另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有无限能力去发展生产力的陈旧看法（马克思主义也同意这一思想，因为这一思想是同十九世纪对人类能顺利地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相联系的）已被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破坏性的看法所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剥削主要的生产力——人，使人处于低下的地位，而且盲目地、残暴地毁坏我们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可以预见，如果现在的生产方式长期发展下去，生产力的破坏将大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走进死胡同。一门在以前的危机中尚不存在的新科学——生态学就是另一个重要的激化性因素（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闻工具企图操纵这种生态学并使它反过来说明缩减生产的增长率是对的，说明执行紧缩政策是必要的），表明必须有一个新的发展形式、新的社会关系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与资本主义的前几次全面危机不同的是，在今天，先进的思想（其中也有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已领悟到，科学、技术、生产力、劳动组织、大中学校、家庭、性的道德、文化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中性的东西，而是能够再生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它们也处于危机之中。为这些因素的革命化而进行斗争，也如同为国家的革命化而斗争一样，是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必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次危机也是世界性的危机，之所以称为世界性是它不仅涉及到资本主义体系，而且也涉及到另一个称之为社会主

义的体系。在经济方面,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收缩,出口减少、出口价格降低,因而进口成套设备减少,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对社会主义体系有影响,而且也有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生产率低,经济发展失调和停滞不前症结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道德方面,社会主义体系也受到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觉悟”危机蔓延的同时,在官员统治的新阶级的国家内也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危机。这个暗淡的世界里的人们越来越不信任他们的“社会主义”了,越来越不信任那些和事实脱节的思想了,越来越不信任他们的文化和道德的价值了。几十年来,靠着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的控制,自由被剥夺了,广大群众对政治不感兴趣,忍耐着,群众的思想受庸俗的消费主义严重影响;但对抗和冲突还是定期地以爆发的形式显示出来,日前,新的爆发的迹象正在增加。

与前几次世界性的全面危机不同的还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危机中,“世界战争”这一因素还未参与进来。但是“局部战争”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和它们的卫星国通过局部战争或其它方式玩弄的牌已对产生这次危机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样,核恐怖和军备竞赛也发生了影响。虽然认为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毛主义理论带有抽象的宿命论色彩,但毫无疑问,这一恐怖的威胁确在我们地平线上形成。以为核武器将导致双方的灭亡,因而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对建立在脆弱的妥协和各怀鬼胎基础上的缓和抱幻想(如赫尔辛基协议之类),以及认为无需消除资本主义和俄国现行制度就可以争取到有保障的和平的思想,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危险的和麻痹人

的。危机正在加深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集团之间以及每个集团内部的矛盾、国际关系的不稳定都增加着新的局部战争的危险,甚至是核战争的危险。总之,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增加。

和以前的危机一样,还看不出当前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有什么出路。一切都取决于主要国家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这两个因素又有紧密的联系)。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的,从理论上讲在新的积累方式的基础上可以有多种办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这就要建造新的关键工业(如原子能、太阳能、空间技术、遗传学工程、合成食物、海底开发等);国家干预的新形式,竞争和集中的新形式以及中心和边缘地区劳动重新分工(最可能的趋势是把新兴工业集中在中心地区,而原有的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和整个轻工业向边缘地区转移)。另一个改变资本主义结构的重要因素是大规模地向东方市场进行渗透。^①

但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结构危机的办法都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会出现非常紧张的局面、剧烈的矛盾和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政策已包含了关于这些理论的某些想法。但在短期或中期内基本不打算作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只是要重新恢复以前的机能。只有劳动者的斗争才可能避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劳动者的斗争被削弱了,左翼没有加强团结和扩大其联盟,没有组织起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

^① 见萨米尔·阿明《一次结构危机》,巴黎“Minuit”出版社1975年。

联盟足以实现为取得政权而主动进攻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进行彻底改革的战略，那么保守势力就可能在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治形式下把他们的“紧缩”政策强加于人，并为资本主义新的持续发展阶段准备条件。欧洲共产主义和欧洲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都面临这一历史性的挑战。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危机

这次危机的全面性，特别是它的政治意义，在西欧表现得特别尖锐。在当今的历史情况下，西欧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一环。值得强调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来是要建设一个经济上、政治上有充分联系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以变成第三个超级大国，进而更有效地疏导劳动者阶级的压力。然而，由于危机，也由于美国执行了一项向欧洲转嫁危机的政策，这一建设进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确实，这一危机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进程，也扩大了欧洲垄断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欧洲统治阶级努力争取建立一个欧洲议会，使之成为它们反对左翼力量的一个工具。但是，欧洲各国之间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一个长时期内由于危机而激化了。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在策略上和战略上，在各自的国家里以及在争取劳动者的欧洲的斗争中，都可利用这一矛盾。

其次，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保险及通过谈判定期增加实际工资的情况下，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出色的

政治调解者。但是，它的这种作用受到了它社会基础中最保守的那部分人的抵制。在最近的选举中，这一点已表现得很突出。与此同时，在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层中，左翼潮流发展了。不能担保北欧的劳动者阶级会长期安于他们已经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受到限制，特别是如果南欧国家里组成工人政党领导的左翼政府的可能性得以实现的话，情况更是如此。

南欧的形势是欧洲危机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突出的方面；这就是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可能使西欧较快地、较直接地成为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在南欧，现在已不是简单的政治不稳定、表面上的政府更迭了，而是出现了政治制度的危机，这一危机正趋向于变为社会制度的危机。不到三年时间，独裁政权相继在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垮台了。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和法国，力量的对比都从根本上发生了有利于左翼的变化。很明显，在上述各国内，进程都已打开，但还仅仅是开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和资本主义保守力量之间的角逐尚未决定胜负，而且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见分晓。

面对拥有强大的社会支持但处于分裂状态的左翼，希腊的资产阶级靠一部分军人的协助，利用塞浦路斯冒险的失败，在没有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打垮了校官政权，在新的议会范围内，确保了它自己政治权力的延续性。在葡萄牙革命中，虽然保留了它那部进步的宪法和它取得的经济—社会成果的实质部分，但从政治上讲，革命后退了。现在，又有了左翼恢复的征兆。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葡萄牙，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党都起了消极的作用。希、葡两国今后事态的发展如何，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个南欧国家里发生的情况，将对此产生很

大的影响。

在意大利，1976年6月20日的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虽有相对的恢复，但已失去以前的政治优势，整个左翼力量已接近绝对多数了。大选之后，围绕如何解决危机问题，即到底是采取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重建资本主义，意大利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激化起来了。谨小慎微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在1976年10月的一次党中央委员会上作报告^①说，“意大利社会的总危机已达到‘临界点’，即葛兰西所称的‘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从必须实行一项紧缩政策出发，贝林格说，这项政策必须是“均衡的，同时，也是不可推卸的一点，即应为社会改革的政策服务”。贝林格接着说，这就要求“这项政策不能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自发规律来左右，也不能由目前这样的国家机器的作用所左右。

天主教民主党和雇主联合会(企业主的大组织)企图强制执行一条完全相反的紧缩政策。这种政策就是要恢复有利于意大利和国际上大资本的资本主义的作用，它不仅明显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更严重的是打击了意大利劳动者在1967—1969年广泛斗争中在工会、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这些斗争成果有滑动工资、协调合同、工人在企业中对劳动条件的监督、在企业内为劳动者的工会活动提供的方便、人民力量对代议制政治机构(如市、大区、议会)、镇压机关(司法、警察、军队)和意识形态单位(学校、家庭、报纸等)不断增长的干预。总之，对意大利右派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利用危机来恢复资

^① 《团结报》1976年10月18日和22日。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活动，使工人阶级和意大利民主遭受历史性的挫折。

在这个时期，意大利政府脆弱的解决办法表明，在意大利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两种抉择之间、两种不同的“紧缩政策”之间力量对比尚不清楚。这些解决办法可能使左翼的政治、社会基础遭到破坏（宣言派组织坚持认为存在着这一危险），结果可能使天主教民主党搞专制；或相反，天民党的一部分与左翼建立合作，从而组织一个意大利共产党主张的三方（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民主党）“民主联合”政府。

在法国，左翼力量继续发展的同时，反动的统治集团正在加速瓦解。如果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不发生什么意外的变化，法国左翼在1977年3月市政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将预示着1978年3月全国大选的胜利。

在1968年5月运动中受到损害的戴高乐派在戴高乐死后，很快地趋向衰落，这导致戴高乐派失去总统位置而让德斯坦这样一个典型右派的代表、大西洋主义者当上了总统。为了避免左翼阵线候选人密特朗当选，戴高乐派中以希拉克为首的一支重要的派系宁愿去支持德斯坦。但是戴高乐党——共和国民主联盟——在新的统治集团的议会中仍占多数。德斯坦也酬谢了希拉克的帮助，任命他为政府总理。但德斯坦——希拉克的妥协，即一个典型右派与大西洋主义者和一个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右派的妥协，未能经受住资本主义危机的严峻考验。他们之间潜藏在这一妥协中的内政和外交上的分歧加深了。德斯坦的大西洋主义日益依附于美国的政策和多国公司的利益，与戴高乐主义的民族传统发生了矛盾，而戴高乐主

义的民族传统是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符合以前的广大中等阶层和一部分技术官僚的利益的。

右翼中的每一派都以另一派为代价来对付左翼的进展。德斯坦企图把社会党人吸引过来并加强改良主义的中间派，以便孤立共产党人，顺便也就能更多地独立于戴高乐党。用阶级术语讲，这也就是利用危机把工人运动中收入较高的和改良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阶层吸引过来并同大资本及技术官僚建立联盟。大资本和技术官僚们关心的是牺牲原中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来使法国老朽的资本主义得以现代化，其实是劳动者为这个现代化付出主要的代价。但希拉克在对抗德斯坦时和担任戴高乐派的新联盟——保卫共和联盟首领后，就要把法国资本主义传统阶层和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纠集在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针锋相对地对付左翼的进展。他还想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抵抗运动的传统和蛊惑人心的社会宣传把一部分劳动者也纠集在这面旗帜下。从1968年就在历届政府中担任部长、1974年又出任总理的希拉克现在竟把应付经济危机所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让德斯坦一人承担，而他自己则以法国新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好象他对法国社会的总危机一点责任也没有似的。

法国左翼领导人警告不要低估了这种带有拿破仑色彩的勾当并预先提醒人们把1978年的选举看成胜利在握是危险的幻想时，显然，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要打垮右派的这种战略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多地把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和人民群众吸引过来，特别是要将受戴高乐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影响和受教会影响的群众吸引过来，就要加

强左翼联盟，左翼联盟跨出的重大的一步是在有三万人口以上的大部分城市的市政选举中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要打垮右派的这两种战略，特别要开展工人和人民的攻势，反对德斯坦的资本主义的紧缩计划。1976年10月7日的总罢工和游行示威是自1968年5月以来所没有过的。这次总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及在此之后的群众运动给人们指出了应走的道路。如果坚持走下去，就会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使1978年的立法选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将开始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抉择的道路。

在西班牙，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之死加速了已处于即将崩溃的独裁的瓦解。独裁的瓦解是若干个复杂因素辩证发展的结果。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三十年代农业的西班牙到六十年代已成为高度资本主义的工业西班牙了；佛朗哥的国家结构与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大了；在内战之中受到严重失败的工人、人民运动又兴起了，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使西班牙工人和人民运动在欧洲处于最先进的行列中；民族和地区对佛朗哥中央集权的抵抗日益增长；欧洲周围国家施加压力；还有就是世界经济危机使佛朗哥主义及其经济结构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但独裁者死后，民主力量从它们在全国的影响、组织程度和团结情况来说，都还不能实现其当前的目标。大多数居民，如果不是由于悲观或者对政治麻木不仁，就是由于害怕镇压，还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如此，当时很明显，在新形势下，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在飞速地增长着。对统治阶级和它们的政治、

军事、经济人员中日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明显地认识到需要变革政治制度以保持社会制度。他们还明显地认识到，君主制（改良活动的关键）能不能得到巩固，取决于他们对西班牙资本主义客观需要的态度。

胡安·卡洛斯就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他马上改变了弗朗哥任命他为国王时所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从保证弗朗哥主义延续性的最高人物转而成为弗朗哥主义的埋葬人。从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全国的政治、社会觉醒。这一政治和社会觉醒主要表现在工人为反对政府和企业主企图把危机转嫁给劳动者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兴起；政党和工会公开发展组织；具有进步方针的持批评态度的报刊纷纷出现等等。

这一辩证关系发展结果是弗朗哥色彩很强的阿里亚斯—弗拉加的改良主义下台和苏亚雷斯的改良主义上台。苏亚雷斯对人民的压力作了很大的让步，从而争取了温和的反对派并暂时给左翼定下了改良的框框。这种改良结束了作为政治制度的弗朗哥主义，但还不是（甚至还远不是）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要争取的近期目标——民主。这样，就开始了争取民主抉择斗争的新阶段。在西班牙的政治、社会形势下，这一阶段只有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即左翼，特别是工人运动占有领导权时，西班牙才能有出路。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民族地区和地区运动的左派构成左翼的主要政治力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抉择是否具备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力量的政治能力及它们之间谅解的能力。当前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而且过不了很久，将会在民主十分少的情况下进行的6月大选中取得超过预料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南欧三个关键国家内，政治—社会进程正在向前发展，尽管各国的进程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但也有一些基本上共同的东西。首先，那里所发生的事不是在同一基本方针之下的简单的政府更迭或政策的变更，而是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上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是否用“紧缩政策”可以得到克服的问题。这一“紧缩政策”除了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的主要负担外，还要用来恢复资本主义的作用并使资本主义再有个长期的发展。（要做到这点，不以专横手段从当前的进程中退回去，是难以想象的）要采取一些政策使这一危机得以解决，这些政策尽管还要使群众做出一些牺牲，但也要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带来一些深刻的改变，从而也就开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第二种抉择就必须要在政治上和生产上扩大和深化民主，需要工人组织和人民组织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中行使领导权，对国家结构和国家机器进行根本的改革。

第二，与其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三国具体存在着民主—社会主义抉择的可能。在意大利、法国，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工会、文化等力量不仅拥有劳动群众多数的支持，而且还得到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及其他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在西班牙，类似的形势也正在到来。在这三个国家里，目前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势头已能使人预见到，在短期和中期内这些社会主义的力量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将成为多数。其中也包括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最积极和最有力的社会阶层。

第三,这三个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政治轴心,尽管其内部力量构成不一样,但已成为政治和社会集团的主力。而这一集团又有可能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力。在意大利的各个方面,共产党在轴心内部占优势。在法国,在选举方面,社会党占优势,但在组织程度和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力方面则是共产党占优势;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在组织程度和在工人阶级影响力方面占优势的也是共产党,至于在选举方面的情况,马上就要见分晓了,可能也会象法国一样。

还可以指出其他类似之处。同样,也可以指出很多不同的东西来。现时我们仅指出上述类似的地方,另外还要指出一个影响意、法、西三国进程的重要方面,即相对地说这三国的进程都是在同时期发生的。由于这一情况(这种情况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所决定的,这一危机扮演了乐队总指挥的角色),其中一个国家的进程,都会对其他两个国家的进程产生可能是明显的影响。根据每一个进程的发展情况,可能起着积极的作用或消极的作用。如果在这三国内目前左翼的进展得到肯定,那么三国进程同时期发生的特点,可能成为一个对付共同的危险和敌人,特别是对付外部的危险和敌人的突出因素。

现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抉择的可能性(尽管还有使它成为问题的各种疑团)只在南欧这三个拉丁语系的国家内稍有眉目,但其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的了。首先是由于这一地区具有战略和军事意义。1975年12月基辛格在美国驻欧洲各国使节会上的讲话^①中强调说:“(南欧)左翼政策的发展有

^① 1976年4月14日法国《世界报》。

使(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的安全关系和防御政策受到破坏的危险,而且这种发展势将影响西欧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许甚至在法国(基辛格是在法国左翼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多数前讲这番话的),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影响在不断增加,我们也面临我们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从那时起,就这一使人不安的“怎么办”,美国的政界、军界头头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本书的最后我们还要谈及美国新总统的班子对此的回答)。

如果在拉丁语系的国家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抉择,其重大国际意义在于它必将影响其他欧洲人民(并且不仅仅是欧洲人民)。正象我已说过的那样,直接受影响的是希腊和葡萄牙那样的国家。在那里,现在的平衡是很不稳定的,左翼有很大的力量。在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国家里,这种影响还会促进英国工党、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内左的倾向的增长。密特朗说,如果巴黎出现一个左翼政府,它对“德国和英国劳动者所起的思想上的鼓舞是极大的”。他说得有理。而且还会鼓舞东欧人民,鼓舞争取民主的潮流,这些争取民主的潮流并不因被埋葬和镇压就不存在了,而是在发展,在寻求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声援,如波兰工人和知识分子强大的运动、苏联新出现的左派、“正常化”未能消灭的捷克反对派等等。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取得进展,就会树立一个榜样,必然还会促进美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欧洲共产主义三个大党的行动和历史性责任就处在这样一个形势及前景中,我们将在以后几章分析它们的演变和立场。先从它们与莫斯科的分离开始分析。

二、欧洲共产主义与莫斯科

冲突的历史根源

有些人把欧洲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新的策略伎俩，其背后仍隐藏着“莫斯科之手”，实际上他们是看错了。虽然还有模棱两可和矛盾的地方，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个主要的共产党与它们原来从属的俄国领导和模式决裂了，这却是一个事实，当然这还不意味着与莫斯科决裂。这是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的党”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就是所宣称的组织上和思想上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掩盖着潜在的冲突。由于这种冲突是被掩盖着的，卷入的各方又都不承认有这种冲突，所以这种冲突一旦发生总是采取难以预见的和爆发性的形式。

这一冲突的根源是这样—个理论观念（或理论观念的基本部分），即列宁在十月革命年代提出的“世界革命”的观念和必须领导这一革命的党的观念。列宁有过一种假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垂死的阶段，认为一旦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真正革命的”政党，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便会马

上抛弃他们的改良主义头头。从这一假设出发，列宁认为，“世界革命”的命运首先取决于能否立即建立一个这种类型的政党，不过其性质是超国家的、是世界性的。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严格集中、分等级和执行近乎军队式纪律的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应决定每个国家支部的政策并监督它们执行政策和选择干部等情况。也就是说，一切都和第二国际完全相反。更严重的是，第三国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本部就设在莫斯科，处于俄国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在被默认之后，俄国党就正式成了“领导党”。

这一“世界革命”和领导这一革命的“党”的观念以及实现这一观念的组织结构刚一出现就和西方(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发生了矛盾，革命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资本主义复原了。政治制度发生了各种演变，社会民主主义重新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也有所发展等等。这些观念在客观上阻碍了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现实情况和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政策。随着斯大林独裁的建立和“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这一矛盾就更加激化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把苏维埃国家神化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心，要求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无条件地服从苏维埃国家。这一无条件服从的恶果很快便在共产国际中最重要的德国共产党的政策上体现了出来，致使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面前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在这一时期，在各共产党中对一种新的战略(不同于莫斯科所强加的战略)开始进行了一些理论研究和实际尝试，“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和行动使这一反对派同共产国际决裂了，葛兰西的理论(二十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对此

“毫无所知”)从重新分析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是以“阵地战”的公式为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提出并依靠农民进行了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这是适用于在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和受帝国主义殖民奴役的农业国家中进行革命的战略。

希特勒上台之后(1934—1938年期间)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面临着德国的威胁,建立联盟的政策使得人民阵线的战略可能得以实行。这种战略使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更大了一点,但总是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人民阵线政策是同苏联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适应的,就是说明问题的一个例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苏联政府在1939年由执行反希特勒联盟的政策而突然转到执行与希特勒结盟的政策时,所有这些共产党都站到苏联政府这一新的立场上来了。

在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结盟政策进入第二阶段(1941—1947年)和由于这一结盟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的解散(1943年)再一次为这些共产党发挥一定的主动精神创造了条件。这一精神表现在无论是在苏联军队解放的东欧国家里,还是在美国军队及抵抗运动解放的西欧国家里,共产党都提出制定一条民主的和“多元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季米特洛夫和其它杰出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对新的革命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出了怀疑(这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是共产党专政)。虽然这些提法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现实问题,但基本上还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因为这些提法是受到苏美“伟大联盟”演变,特别是受到苏、美瓜分“势力范围”制约的。西

欧共产党的“民族道路”意味着要依附资产阶级政党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东欧共产党的民族道路表面上的多元制掩盖了这些党对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这种控制不是以多数人的赞同为基础的，而是以保障莫斯科能对在这一地区实行统治的苏联军队的支持为基础的。这样一来，1947年苏美“伟大联盟”的破裂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作法全给抹掉了，再次把这些党对莫斯科的无条件依附暴露无遗。不过对莫斯科的抵制情况也越来越大了。

1947年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开始采取措施警告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因为它们对走“民族道路”太认真了；情报局还掀起了疯狂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这方面竟敢反对斯大林。不过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得到了南斯拉夫军队和全国人民支持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的血腥清洗涉及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主要领导人。这些事件和其它一些事件都反映出对克里姆林官独裁的抵制越来越大。有些党是由苏军扶持上台的，这些党受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克里姆林官军队和警察的威胁，另一方面是本国人民要求民主。在这些党内反抗特别大。对付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斯大林没有那么一个象共产国际那样的强制性的手段和组织机构（共产党情报局不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再也没有一个重要的共产党赞成再搞共产国际了。但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的影响还有足够强大的团结力量（对各党的经济援助加强了这种团结力量，不过这不是决定性的），所以避免了铁托—斯大林决裂的扩大。然而自主的倾向增强了（反对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党与苏联党

的紧张关系随时都可能加剧。

斯大林死后，莫斯科政权开始出现了危机。在这个时候，如果同“兄弟党”和卫星国的关系中出现的那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什么危险，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赶忙作出妥协，这种妥协与其说是实质性的，倒不如说是给人看的，如与南共和解，谴责斯大林，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在表面上放弃“领导党”的作用。但实际上，苏联领导人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把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作用置于新的基础上，苏联领导人是不愿放弃这种领导作用的。然而这一企图与那些党的独立倾向越来越发生矛盾。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长期的阶段。它将以东方和西方的主要共产党（苏联军事集团的各党除外）通过各种抉择断绝对苏联党的依附关系而告终。但是，在研究这一阶段之前，最好还是回顾一下我们刚描述过的那一进程，看一下它另外几个重要的方面，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下也好。

随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性质的改变，其它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对苏联这个中心的依附有所增加（从而也增加了它的消极后果）。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是革命的，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它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个社会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取消了刚刚开始苏维埃民主，而且是越来越全面地取消这一民主（尽管还维持着一个门面），使劳动者不能逐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经济、政治、社会机构的管理人员（当然，劳动者的民主并不是确保这种集体

所有制的足够条件,但是是绝对必需的条件)。

随着党和国家性质的变化,苏联在对外政策和与其它共产党的关系上以“国家利益”,即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取代了“革命利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了一种公式,即从思想上证明利用各国共产党来为克里姆林官的对内或对外政策服务是合情合理的,尽管这些政策的目的与这些共产党的对内政策是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失去了在马克思著作中所包含的民主内容,从而变成了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骗人的幌子。“马列主义”没有了马克思的思想所特有的批判的革命的内容和科学的严格性,只是变成了为新阶级秩序进行辩护的教条。这样的演变不可能使苏联领导主动去克服在本章开始时所说的最初就出现的那种矛盾,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些理论和组织同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需要而采取的行动之间的矛盾。相反,苏联的“国家利益”关心的就是各国共产党成为俯首帖耳地服从它的工具。

为什么在一个长时期里共产党没有能力制定一条符合各自国家阶级斗争特点的政策呢?对这个问题共产党最通常的解释(现在还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这一解释)就是,在西欧革命的尝试失败以后,它们必须成为保卫现存的和唯一的社会主义堡垒的先锋队,一切都要服从于捍卫这个堡垒的工作。这一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什么比制定和执行一条符合各国特点的政策更能捍卫这一“堡垒”呢?谁又能比这一“堡垒”本身更加对这种做法感兴趣呢?如果说尽管这一切仍存在矛盾的话,我的看法就是应从上述的理由中去寻找原因,即:(1)共产国际的战略概念和组织概念;(2)“堡垒”蜕化,“堡

垒”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越来越少，更加屈从于正在形成的新阶级的利益。总之，社会主义越来越少。

那么为什么这些共产党对苏联制度的蜕化不但没有反应，反而作为一个附属器官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原因是复杂的，尽管最终可归结为一点，即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太大太持久。在整整一个时期内（这个时期现在尚未完全了结）这种作用变成了神话，这就阻碍了革命者的后代以批判的态度去评定这个革命的某些结果，这些结果否定了这个革命初期的内容。这些共产党刚刚开始形成，就受到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党需要的就是从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说这种思想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是因为它并不是用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工具，而是用来“科学地表明”苏联正在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党的活动都是从属于本应与之决裂的机构，结果为了保卫苏联，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党坚如磐石的团结，这些党的一切批判的倾向逐步消失了。

如果仅从党内的实践并带有某种偏见的思想（例如一种我们不妨简称为“唯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观念曾起着首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至今还是如此，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来看，那么共产党人可能、甚至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将一系列无疑是非常突出但又缺乏证明能力的事实当作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确凿证明。这些突出的事实有：工业取得惊人的进展，广大群众掌握了文化，在打败那些法西斯强国的战争中苏联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它对不少革命运动的帮助。他们可能“没有看见”，这类工业化导致了新的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形

成，而文化又是如此政治思想化，以致去为这些新的对抗性关系辩护并促进它们不断再生产并永久延续下去。有可能他们“没有分清”，苏联之所以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在国际上起到进步作用，是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要过渡到苏联制度就需要消灭现存的统治阶级、改革一系列经济、政治结构）；这两个制度都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一共同特点就使它们之间有矛盾和冲突。苏联之所以起到这种进步作用，也可以说是由于大国的利益的关系，由于新的统治阶级需保持“社会主义”的形象，给自己思想涂上一层保护色。

当局否认或掩饰了集中营的存在、一系列的审讯（先在苏联，然后在人民民主国家）、残酷的镇压制度和取消苏维埃民主，而共产党人（被开除出党的少数个人或小组除外）也不相信右派别有用心的谴责，也不相信托洛茨基和其它革命者（在忠诚的共产党人的眼里，这些革命者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的揭露。他们这种混乱的“革命”思想与烧炭党徒的信念是相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共产党人对自己阵营发生的事情采取盲目相信的态度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此外还要加上当时苏联是一个“受包围的堡垒”和从1933年起就受到希特勒侵略的威胁等因素。在那些年代，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些杰出的外国共产党人可能隐隐约约看出了当时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他们的内心开始产生了怀疑，但是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切因素不是决定了这些杰出的共产党人不可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就是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以消除他们的疑团。一般说来，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有。在这个问题上，恩内斯特·

寅舍尔^①的论据是十分雄辩的。

当今，有些人，甚至左翼团体中的一些人，还强调不能相信从过去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而且又说“不曾晓得”所发生的情况的共产党人。那些人好象不知道，社会“事实”（我们只谈这些事实）很少是以不容争论的赤裸裸的形式发生的。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人总是要通过主观、思想意识、党派利益和历史的局限等这些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事的，这当然不排除犬儒主义的情况。另一方面，各种事情的“清楚”程度也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生根本变化的。

从 1956 年到东方的分裂

苏联在反对法西斯强国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苏联军队解放了东欧国家（这促进了这些国家开始了革命进程，同时也改变了这些进程的性质），这一切使苏联社会主义的神话和斯大林的神话增加了新的异彩。只是这个伟大的独裁者死后，为了对这一制度加以改良并把它保持下来，苏联领导阶级才不得不部分地揭开掩盖事实真象的帷幕。这时共产党人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输；实际要比资本主义宣传机器或那些诽谤者所揭露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苏联的实际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劳动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以独裁者为首的肆无忌惮的专制警察机关的手中（独裁者本身也是辩证地受这一机关支配的）。原来莫斯科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策与帝国主

^① 见恩内斯特·寅舍尔的《回忆与思考》马德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978 年。

义的办法是惊人地相似。

这一揭露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很深的，但当时思想方面制约性的因素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大多数共产党中，“这是健康机体内的一个肿瘤”的说法还占优势。但是，苏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离心倾向大大增加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镇压这种离心倾向的活动。1956年10月用武装干涉威胁波兰，后来武装干涉匈牙利，接着毫不犹豫地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扼杀在血泊中。匈牙利共产党相当一部分人参加的人民暴动不仅仅是针对匈牙利国内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而且也是反对俄国的统治。

莫斯科用坦克在它的欧洲地盘上恢复了秩序，但苏联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誉又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其影响遍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仅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中就有三十万人退党，其中意大利共产党就有二十五万人退党，而许多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些党的领导班子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毛的一套理论引起了重要的反响。这些理论说，如果革命的领导不执行一条符合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政策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陶里亚蒂提出了一种说法，要从制度本身的矛盾来解释斯大林主义。这种提法虽然在意大利领导内部遭到很大的抵制，但也引起了重要的反响。毛和陶里亚蒂都是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了苏联领导，因为苏联领导总是竭力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个人迷信”。

但是，1956年事件唤起的批判精神的觉醒和要求进行讨论的呼声和党员人数的下降引起了共产党领导集团的不安，

即使最有准备实行开放的领导集团也是如此。毛断然结束了“双百”运动，陶里亚蒂也使自己最初的反应温和起来。莫斯科利用这一低潮在1957年11月组织了自从解散共产国际（不算插在中间的共产党情报局），从而解除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束缚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毛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同苏联人一起发动了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南共再一次成了各国共产党为了对付批判性的、自主的倾向而加强团结的替罪羊。这样，莫斯科就得以恢复了一点威信（毛本人就提出必须承认苏联党的领导作用）。但三年之后，举行第二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时，共产主义的“两个大党”之间的暂时一致就转化为深刻的分歧，特别是在国际政策方面，中国人反对莫斯科所解释的“和平共处”，通过阿尔巴尼亚人之口谴责莫斯科投降帝国主义。会议的多数人都为苏联人帮腔，指责中国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它党是“左倾”。会上的争论的情况同1957年一样，没有公布，但还是通过了一项妥协的决议，在决议中用虚夸胜利、团结的词藻把内部严重的不一致的情况掩盖了起来。会议的声明说“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要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象保护眼珠一样，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①一年之后，大分裂的序幕就拉开了。

赫鲁晓夫迫于苏联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1961年11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谴责了斯大林的血腥镇压，补充了新

^① 《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1960年11月。

的细节。于是各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内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混乱和分歧加剧了，再加上中苏论战使这种分歧更复杂化了。在法共和西共领导机构内，赞成赫鲁晓夫政策的意见占上风，认为赫鲁晓夫的政策是苏联制度非斯大林化和民主化的足够保证，但意共领导要求作一些“补充说明，因为揭露斯大林时代的事牵涉到意共和其它党的责任问题”。要求对斯大林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作一次彻底的调查，并再次提出“各个党享有完全自主”^①的必要性。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和二十二大之后，立即爆发了苏联党和中国党的公开冲突，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东方大分裂的前奏，不久之后这一分裂就发生了。在苏共历史上，第一次在共产主义队伍之内，在思想上、政治上、国家和军事方面遇到了一个与它旗鼓相当对手。毛主义的“反修”理论也把西欧的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当作靶子，这表明他很不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问题。加上毛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暧昧态度，就促使一些党，特别是法共和西共，一开始就无条件地站在莫斯科的立场上，不加任何思索地攻击中国党。但是，归根结底，中苏决裂又鼓励了所有的离心倾向，为共产党的独立进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结果促进了1964年赫鲁晓夫的倒台。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直到最后时刻，还把苏联制度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赫鲁晓夫身上！这一很有特色的人物的倒台给他们带来了创伤。1966年，法共和西共第一次同意共一起公开批评在苏联搞的政治—文化镇

^① <1961年11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声明>。

压(审判齐尼亚夫斯基和月尼尔两位作家,这不是偶然的)。

斯大林死后漫长的十年中,在西欧的共产党内重新出现了对走向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尝试。古巴经验(一般地说,古巴经验没有被人学好)导致了拉丁美洲的游击道路。同样,中国经验在亚洲各国推动了人民战争。在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内部都出现了毛派、卡斯特罗派(在拉丁美洲党内),这些分裂活动,使领导层内发生了危机(如西班牙共产党1964年的危机)。托洛茨基主义又有所抬头。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战略,以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现象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作出新的解释。而被莫斯科奉为圣经的、在大多数共产党中还广泛地居支配地位的“马列主义”理论,对此却无能为力。在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一般地说是在共产党之外开始的,如果不是受到共产党反对的话,但是它把这些党内越来越多的党员都卷了进来。“重新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成了时髦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存在主义派、结构主义派、历史主义派、经济派和社会学派等)之间展开了争论。

由于中国的文化革命,第一次产生了与苏联道路完全不同的抉择问题(尽管这还是不完善的)。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大部分现领导人一开始都坚决地抵制这个革新运动的压力,而后却又都先后不同地部分地作了让步,并且试图(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机会主义的方式、不对自己过去的历程作真正批判性的修正)领导这一革新运动。

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世界性的党”的危机不但没有被其继承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译者注。）所克服，反而导致了一个总危机。从共产国际的解散（象征着“世界性的党”的危机）到“运动”的第一次大分裂——东方分裂，经历了一个瓦解的过程。这一瓦解过程（有时虽然作一些短暂的修补）是以保持日益形式主义的和外交上联系勉强掩饰起来的。引起这一进程的震源就是苏联霸主地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江河日下，虽然一系列党还在表面上维持着虚构的苏联领导权（除了东欧卫星国内的执政党外，还有很多党继续无条件地依附于苏联党，这些党在本国影响很小或者说几乎没有影响，尤其是拉丁美洲、阿拉伯和非洲的共产党，它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莫斯科的资助）。一方面是苏联党一政的“马列主义”的经院哲学及其代表新统治阶级利益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内反帝斗争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客观需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使这一瓦解进程到六十年代中期达到了激化的程度。从1968年开始，这一进程更加剧了。

“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对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特别是对集中搞这一试验的三个大的共产党来说，1968年是它们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捷克斯洛伐克之春”为东欧国家开辟了类似的前景的同时，法国五月风暴使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了

现实意义。关于五月风暴的影响，我们后面再谈，现在来看一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一事件再次证实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教训，同时，表明为了在“苏联模式”的国家中打通被封锁了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同与之相对抗的、特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实行决裂，实际上这就是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这一事件也突出地表明了制度上的矛盾在掌权的共产党内也有反映。指出这点对预见这一新的革命有重大意义。虽然这次尝试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引起人们进行这一尝试的那些起因，不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卫星国家都还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镇压活动的加强，这些起因仍要继续发展，为爆发新危机创造条件。

莫斯科的军事干涉是最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它说明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后来由他的继承人所巩固的政权，同民主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到何等程度。西欧各国共产党是沿着上述道路发展过来的，这次捷克事件使它们进退维谷。同意侵略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小国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自己的发展是不可信的，就意味着不可原谅地背叛自己反复声明的对自由、民主的信仰。于是，在他们的历史上破天荒地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极为重要的行动。苏联共产党的这一行动集中反映了苏联制度的本质。这是关键性的，但还不是最后的步骤，因为虽然这些党认为这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不一样，不接受苏联以保卫社会主义为借口进行的辩解，但是它们仍然认为苏联的制度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业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还不至使制度的性质受到怀疑。这是一种西方国家不能

接受的社会主义，但是终究是社会主义。因此，问题不是同苏联共产党断绝关系，而是适度地批评它的行动和在完全承认每个共产党的独立和特殊道路的基础上重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些观点虽然没有被苏联人所接受，但是导致各党达成一项妥协：在1969年6月举行世界共产党的第三次会议。

一开始，(于1962年)中国党和它的盟友要求召开一次新的会议，以便对存在的分歧展开全面论战，不久，召开这个会议的设想竟被苏联人用来策动多数党攻击中国人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有一些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抵制了苏联人的这一计划。陶里亚蒂在1964年夏天，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不久，写了《雅尔塔备忘录》，转交给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他在这项文件中，除了对苏联在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方面的情况提出某些批评外，还表示反对苏联关于召开共产党世界会议的计划，主张共产主义运动在“差异中求团结”，不要开除中国人。

经过几年的争吵之后，苏联人作了某些让步，同意在1968年底举行会议。但侵捷事件使这次会议无法如期举行，但苏联集团为了向各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表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党是支持苏联共产党路线的，克里姆林宫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召开这次会议。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典型斯大林派进行了大清洗，五十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党的领导人被监禁、流放和驱逐，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实现了所谓的“正常化”，接着就要实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常化”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建它的霸主地位。莫斯科对一些原来就持反对态度的党加紧施加压力，结果使这些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

么作出让步，要么进行更加彻底的对抗。然而这些党的许多党员对进行这种对抗还没有思想准备，很难把这种对抗同承认东欧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协调起来。由于克里姆林宫也无意决裂，所以达成了妥协，无论在准备会议的文件中还是在最后决议中，都没谈及中国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所有的发言都给予发表，这样每个党就可以表明各自的立场。

苏联人及其追随者实际上利用了会议的讲坛，向中国人发起有准备的攻击，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正常化”，从而通过勃列日涅夫宣布的“有限主权论”（如果“社会主义”受到威胁，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西欧主要共产党，还有罗马尼亚党和日本党以及其他几个党在这些问题上都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重申了每个党在制定和执行自己政策方面有独立性。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声明，民主集中制不能运用于党与党的关系方面，从而证实了会议本身反映的一种实际情况。贝林格更明确更广泛地提出了一条反对的路线。它揭开了目前欧洲共产主义的序幕。此外，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拒绝在会议文件上签字，因为文件明确规定不允许社会主义有多种“模式”。西班牙、罗马尼亚和瑞士三个党的代表团在文件上签了字，但同时为文件总的內容提出重大保留。只有六十个党（比在1960年的会议上少了二十一个党）在文件上签了字，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但其中法国党、日本党和其他几个党虽然不如意大利党和西班牙党那样强烈，也还是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还值得提一下澳大利亚党，它虽然是个小党，但是在工会中是有影响的。它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最强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应该注意

到中国、越南、北朝鲜、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荷兰拒绝参加会议，在某些国家，如印度、希腊和以色列已经存在独立于莫斯科的、并与参加会议的亲苏的党相对抗的组织，其规模与那些党差不多，或更大些。

总之，不管从各国共产党是否都参加了会议的角度看，还是从在会上发言与否的情况看，都表明这次会议暴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全面危机。但是也表明了苏联企图压住这股潮流的打算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党怕触及问题实质的心情。有的党，如法国共产党，甚至明显表示愿意同莫斯科实行“正常化”（当然是在互相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的范围内），尽管如此，它们都必须默默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接受对“兄弟党”的最野蛮的干涉，必须对“布拉格之春”的发起人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即使有些共产党敢于同莫斯科抗衡，但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不够坚定，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最普遍的共同原因，就是思想意识的纽带仍旧把它们同东方的“社会主义”拴在一起。但是由于各党的特点不同，由于同这种“社会主义”局部对抗在党内造成的具体影响不同，这种思想意识的纽带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在所有这些党内，苏联的神话和斯大林的教育仍在不同程度上强烈地影响着大批党员和不少领导人的性格。但是也有人挣断了这种纽带，认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使苏联及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成了问题。虽然他们的立场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举些他们的例子，如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加洛迪、奥地利共产党的费切尔、马雷克和其他最高领导人、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宣言派小组等。莫斯科

利用他们的情况，要有关党的领导采取极端措施来反对激进的“反苏主义”，同时又唆使和帮助每个党内的亲苏分子指责这些党的领导反苏。

就这样，由于这些因素在这些党的每个党内交织在一起并产生作用的情况不同，决定了这些党的领导在1969年会议上和以后一段时期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同苏联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对抗中（在一定限度内的对抗中），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由于自己经历不同，他们所处的地位要比其他党好些。意共通过长期的讨论，使全党了解了“宣言派”的观点，然后把他们开除出党。这当然是使苏共高兴的事，但是“宣言派”从左的方面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却促使意共的领导没有对莫斯科为争取实现“正常化”而施加的压力作出过分的让步。

法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同整个党一样，法共领导集团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它从自己初期所持的立场后退了，而且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集团退得还厉害得多。虽然没有放弃不同意侵略的立场，但也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了，并把反对“反苏主义”的传统思想放在首位。加洛迪事件就是被用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法国共产党赞扬苏联的物质成就，赞扬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所谓“决定性作用”，同时，加紧攻击毛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采取了一种讨好的态度。在这个时期，他们同莫斯科争吵的主要问题是莫斯科对法国的外交政策的积极评价，在1974年总统选举前夕，苏联大使竟然做出了一个有利于德斯坦的引人注目的姿态。

西班牙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前是著名的最亲苏的共产党之一。实际上，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就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了，当时刚刚把我们这些对苏联制度一直持批评态度的人开除出领导集团和党。在西班牙，争取民主的斗争和建立反独裁的广泛联盟的政策同赞扬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显得越来越不协调。因此，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把杜布切克的“新方针”看成是及时雨，愤怒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所以，入侵一发生，西班牙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就立即发表声明说：“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假设，现在只有我们的阶级敌人才能提出的假设，即：一旦我们党通过西班牙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结成的联盟上台执政，不管是那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竟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甚至可以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而不会遭到我们最强烈的抵抗。”^①

不久之后，卡里略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②中提出，在“我们自己的阵营”中出现了一种“冷战”。他把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严重情况的全部责任都归结于“执政党采取的立场”。他说，这些执政党的政策是根据自己“国家利益”来制定的。他驳斥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出于维持现状和势力范围需要的论点。他说：“我们愤怒反对这种概念，因为它虽然可能是理解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但是同阶级立场毫无共同之处”。还提出有必要深入研究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相继出现危机的根源。”他警告有人“企图危害我们党的团

① 1968年9月《工人世界报》。

② 1968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结”。这一警告是直接针对苏联人的，因为他们开始支持西共中央组织书记爱德华多·加西亚和西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一年以后恩里盖·利斯特尔也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在忠于苏联的旗帜下，这些人在党内开始了斗争。

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流亡的西共的重要核心组织中，这种内部斗争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同时，苏联的代理人施加了种种压力，采用了无耻的手段，使西共领导，特别是使圣地亚哥·卡里略进退两难，要么投降，要么开展坚决的斗争。在西欧共产党中，西共采取了最明确的立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的立场，虽然并没有形成系统反对的运动。1970年8月，《工人世界报》抗议把杜布切克开除出党，声明说：“即使他被开除了，也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①，还谴责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同佛朗哥政权恢复关系。1973年9月，《工人世界报》发表了党的国际关系负责人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西班牙共产党系统地批评了苏联的政策。在表示不同意北京某些方面的国际政策的同时，认为1973年5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争取欧洲安全公众舆论大会委员会上建议谴责中国是愚蠢的；揭露了苏联国际政策中接受政治、社会现状的倾向。他说，革命从苏联对外政策中消失了。报告提出西欧共产党必须为争取一个独立、民主的、“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大国霸权”的欧洲而斗争，必须反对召开各国共产党新的世界会

^① 1970年《工人世界报》第13期。

议的建议。这个建议反映了勃列日涅夫的看法，是由保加利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开始提出来的。他们主张恢复对苏联共产党无条件服从的那套做法。西欧共产党加强了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并制定了一项共同战略，包括社会主义在西欧应该有的“最佳形象”，以此来对抗苏联的这种计划。尽管是附带的，报告批评了在东欧国家缺少民主的现象。认为这些国家毛病的根源就是，在那里政权和党政合一的作用占绝对优势。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一个出版物中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了猛烈的反驳。为了回答苏联共产党的攻击，西班牙共产党同时发表了阿斯卡拉特的报告和苏联的反驳文章，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击苏联的反驳，并加了一段按语，重申这个报告代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①。

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后者比较不明显)，但并没有解决主要的有争论的问题，也没有避免它们进一步恶化。这两个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一样，反对(他们的反对是决定性的)召开一次苏共支持的新的国际共运会议。他们加强了互相间的联系以及同西欧其他共产党的联系。经过一系列的预备会议和讨论之后，1974年1月，举行了一次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欧洲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在会上，有些观察员就看出了“西欧共产主义”在形成。

在左翼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每个党都逐步确定了自己的战略：法国的“共同纲领”，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西班牙的“争取自由的协议”。随着这些情况的发展，这种战

① 1974年3、4月间西共出的一本小册子。

略,为了使人相信,就要更明确地有别于苏联的“模式”。1971年,三个党都已经批评了在列宁格勒对试图离开苏联的几个犹太人的审讯,1973年,又批评了苏联禁止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75年,抗议把数学家列昂尼德·布鲁什监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同年5月,法国共产党发表了一个“自由声明”的草案,它明显的目标之一无疑是想同东欧的制度划清界线,另树旗帜。这一系列的言行同当时这些党的其他态度是相矛盾的。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它还是无条件支持非常亲苏的葡萄牙共产党的政策。但是,西欧三个主要政党路线的精神和总内容是进一步脱离莫斯科,使苏联领导所追求的所谓的“正常化”落空。1976年,这种倾向发展到了导致危机的程度。

走向西方的分裂?

1974年秋天,苏联人在会议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不开“世界性”会议了,开“泛欧会议”,也就是说,开东欧和西欧共产党的会议。为此,1974年10月举行的协商会议决定,会议最晚也要在1975年的年中举行,但是直到1976年6月也没有开成,因为在头几次筹备会议上,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倾向就对抗起来了。由于西方这三个主要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战略和观点在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1975年7月里窝那声明里和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1975年11月罗马声明中明显地具体化了。这种倾向的对抗就尖锐起来了。罗马声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法国共产党几乎完

全站到意大利共产党传统的立场上来了(对待欧洲共同体和北约问题上的策略分歧除外,不过这些分歧也是重要的)。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这几个基本文件,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再谈,欧洲共产主义见于文字,正确地说,是在罗马声明之后出现的。这里只要指出一点,这三个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共同确定了同东欧国家政权实际上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和过渡的概念。同莫斯科日益发展的对抗中,它们迈出了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此后,进程就加快了。虽然事情是新近发生的,而且很可能读者还记得,但是最好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法国电视台放了一部秘密拍摄的影片。影片上显示了囚禁在苏联“劳改营”的政治犯的某些形象。法国共产党领导马上作出了反应,它声明,如果苏联当局不公开辟谣,“它将表示最大的惊讶并对这些不公正的事件表示最严肃的谴责”,因为法国共产党“反对一切损害人权,特别是损害言论、出版自由的镇压活动”。莫斯科通过《真理报》对法国共产党作出了答复,指责它“自愿或不自愿地帮助煽动一场新的反苏活动。”^①法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反驳,重申自己的立场。这是法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它的历史上这样泛泛地承认和谴责苏联的政治镇压活动。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采取了类似的立场。西班牙共产党乘机指出,1968年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情况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否定”。^②

^① 1975年12月12日法共政治局公告,载于1975年12月13日《人道报》。1975年12月19日苏共在《真理报》上作了回答。

^② 1976年1月2日西共公报。

在法共二十二大准备期间(1976年2月),法共总书记主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放弃”这种提法的理由和方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此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抛弃了在苏联政权历史上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理论 and 实际的内容。人们也可以对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这些党,在最近几年,都悄悄地“扔掉”了这个著名的提法。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这样令人注目地采取了这一步骤和其他“异教”的步骤,耸人听闻地补救自己落后于别人的状况。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声明不能接受莫斯科炮制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概念(这是它用来套住苏联集团的那些党和国家的一种圈套),莫斯科还说,这是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高一级的范畴。显然,莫斯科的目的是要为“有限主权论”提出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够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以后对其他国家的干涉进行辩护。卡里略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概念之所以被取消了,不仅是因为它掩盖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而且是因为在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太狭窄了。

法国共产党二十二大结束之后十五天,苏共二十大就对它发起了全面的反击。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还有其他共产党的忠实于他的人都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发起了攻击,指责他们为“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等,特别是指责他们破坏了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夫科夫提出的一切原则中的原则:“对苏联的态度就是检验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是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的分水

岭。”^① 勃列日涅夫及其追随者已经几乎不提正在筹备中的全欧各国共产党的会议了，相反，他们坚持必须举行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因为在这样的国际性的会议上，实际的力量对比将更有利于他们发动对欧洲共产主义和毛主义的斗争。

马歇和卡里略采取了在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活动历史中史无前例的行动，即不参加苏共的代表大会。贝林格则选择了出席会议的方法，以便通过讲坛阐明意大利共产党的观点。卡里略在罗马以他特有的方法参加了“辩论”。他认为苏联的制度是处于“原始状态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虽然痛恨被它推翻了的几乎还是封建主义的制度，然而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却还带着这个封建制度的烙印。”^②《人道报》有意突出报导了在苏共代表大会期间对勃列日涅夫的浓厚的“个人”迷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3月17日苏斯洛夫发表了一篇攻击欧洲共产主义党的演说，但没有指名道姓。他强烈谴责了他们的思想观点。他说什么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为阶级敌人效劳”。关于寻求通向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问题，他说：“机会主义者称作与不同地区和民族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同革命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是危害工人阶级的”。^③ 欧洲共产主义党的机关报严厉地反驳了这些指责。

继苏斯洛夫之后，东欧一些党的负责人也纷纷发表了类

① 1976年2月28日法国《世界报》。

② 同上。

③ 1976年3月19日法国《世界报》。

似的演说，捷克人表演得比谁都突出。他们对苏联的顺从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成反比的。比拉克宣称，“苏联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共产主义模式”，同时，堪比斯大声疾呼反对那些“表面上装得象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上受命于帝国主义颠覆中心的人的背叛活动”。^①在苏联出版了一本攻击意共文化委员会负责人格鲁皮的小册子。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团结报》马上进行了反击，指出作者的苦心杰作只不过是奇谈怪论，把列宁的思想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团结报》指出，对格鲁皮的攻击，实际上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西方共产党的基本抉择”。^②

在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5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继续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攻击。但是要把在苏共二十五大以后几个月里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党的运动的例子一一列举出来，这个单子未免就太长了。

然而，欧洲共产党会议终于在1976年6月29日在东柏林举行了，因为争论双方都不希望分裂，特别是莫斯科和从属于它的那些东欧国家。它们害怕西方分裂会在自己国家和自己党内产生影响。在会议开始前四天，爆发了新的波兰工人运动，反对波兰政府反人民的政策，并得到知识界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布拉格之春”的代表们从监狱里或从流放的地方向西方共产党发出呼吁，要求声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代理人冒着严重的风险，甚至比预见的还要严重的风险：欧洲共产主义者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只好去参加会议。会议通过

① 1976年3月21日巴塞罗那《先锋报》。

② 1976年3月21—22日法国《世界报》。

的文件本身反映了苏联人出于不得已作出的那些让步的重要性。在文件中没有出现莫斯科正统的神圣提法，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对反苏主义”。相反，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莫斯科原来不同意的提法，例如：参加会议的党将发扬“国际主义的声援”（这是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思想基础上”（这一提法取代了在斯大林领导下炮制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严格保持各党一律平等，自主独立，不干涉内部事务，在争取进步的社会改造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自由选择不同的道路。^①此外，文件集中谈了和平和共处的问题。虽然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发言中不会对苏联对外政策某些方面间接的然而明显的批评，但是在和平和共处的问题上与会者仍然取得了较大的一致。

会议的特色是欧洲共产主义者都明显地直言不讳地摆明了自己当时的观点。^②卡里略说，“莫斯科过去是‘我们的罗马’，但今天已经不是了”。他指出，“今天我们没有任何领导中心，没有束缚我们的任何国际纪律”；“我们是不会接受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时代特有的那套国际主义概念和结构中去的”。卡里略认为，“今天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除了“帝国主义野心”之外，就是“霸权野心”。他还说，“我们运动的多样性必须

^① 1976年7月3日法属《人道报》。

^② 以下都引自卡里略、马歇和贝林培在柏林会上的讲话。卡里略的讲话，引自西共代表团提供的打字文本。马歇和贝林培的讲话全文分别发表在1976年7月1日的《人道报》和1976年7月1日的《团结报》。

永远得到承认，必须拒绝对抗这种多样性的一切形式的阴谋。”他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项更加主动积极的政策，向世界人民提出更加直接的建议，撤回一切在外国（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和基地；解散两大军事集团；在最广泛的含义上有效地保障人权”。

无论是卡里略，马歇还是贝林格在发言中都重申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是性质相同的概念。贝林格详细地提出自由和民主的具体内容。人们听了这个讲话，都不会再继续认为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的，就连“原始的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这是一种矛盾，一个不小的矛盾，欧洲共产主义还处在这一矛盾之中。

马歇提出，“和平共处绝不能与我国的政治、社会现状视为一回事，不能与世界被分割为由最强大的国家统治的势力范围这一事实等同起来”。这位法共总书记更直接地指出莫斯科一再支持德斯坦的外交政策，同时他提醒注意：“我们绝不允许以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的名义，侵犯我们反对大资本政权和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利益。”

贝林格也声明，缓和不应该包括“维持所有国家中原有的政治社会的平衡”，但是，“在不单方面改变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之间的战略平衡的情况下”，应该“逐步”取消军事集团，意大利人民应该独立地、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意大利所在的国际联盟的范围内，决定自己的命运（后面，我们将要谈到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

马歇和贝林格批评了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会议方式，包

括正在举行的会议的方式，建议做一些改变，对各种问题进行更加公开的、直接的和坦率的讨论。苏联原想使泛欧会议成为筹备世界性会议的桥梁，但是马歇和贝林格的批评使苏联的这种企图破产了。

上述三个党的领导人通过他们的发言完全证实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存在（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是最合适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基本问题上的提法事实上是一致的，而且也因为他们都明确承认这种一致性。贝林格声称，“有意义的是西欧其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经过独立的研究，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在他们的国家应该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一致性和这些共同的特点，最近在我们同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所签署的声明中都谈到了。”贝林格还强调（本书一开始也谈过），“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传播之快，表明在西欧寻求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要求多么广泛和深入人心。

总之，柏林会议是苏联集团和欧洲共产主义第一次全面和公开的较量，是使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分裂更加明朗化而又迈开了一步，因为应该注意到，虽然公开讲话是直截了当的，但是它们只是局部地反映了冲突的深刻程度。

柏林会议之后，双方的对抗日益严重。在东欧国家政权的反人民性质的问题上，对抗双方的营垒日趋分明。这种反人民的性质最明显的方面就是镇压要求自由的人，如1976年6月在波兰发生的事件那样，当要求自由同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权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时，这种镇压就更加残酷。在意大利报纸发表了库龙给贝林格的信的同一天，意大利共

产党向波兰党的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信，为受迫害的工人说情，因为库龙在信中要求贝林格“帮助遭到波兰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污蔑的波兰工人，帮助遭到警察毒打的、被关进监牢的、被指控为犯破坏罪的和被判处长期徒刑的那些波兰工人”。^①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组织向波兰工人表示声援。不久之后，法国总工会也表示了声援。12月，它的一位书记声明说：“我们不能允许象几个月前在波兰发生的那样，劳动者由于参加罢工而被判处坐牢的重刑。”^②

10月份，法国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一个新步骤，决定派它的代表、中央委员皮埃尔·朱坎参加在互助大厅举行的争取释放一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玻利维亚、智利和乌拉圭的政治犯的群众大会。（在一年前，法共还表示拒绝参加由同一个委员会，即所谓“数学家委员会”组织的声援列昂尼德·布鲁什的集会，虽然法共也呼吁释放这位乌克兰数学家。）莫斯科对此的反应是威胁性的。塔斯社发表声明说，“苏联的公众舆论不理解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怎么能够参加这种肮脏的交易”。又说，这是企图掀起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浪潮，破坏国际缓和”。^③马歇反驳说，法国共产党只限于执行它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而且“谁也不能使我们稍微离开这条路线。《人道报》重申自由“同社会主义不可分”。^④而且法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同意将朱坎在互助大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印发六百万份。

① 1976年7月21日法国《世界报》。

② 1976年12月30日法国《世界报》。

③ 1976年10月21日法国《世界报》。

④ 1976年10月23日《人道报》。

在1976年11月，趁东德持不同意见的歌唱家沃尔夫·比尔曼在西德演出，东德注销了他的国籍，而且开始了一场旨在反对知识界反对派的新的镇压运动。这也引起了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抗议。在12月，法国共产党特地派卡纳帕参加电视台放映完影片《忏悔》后紧接着举行的电视讨论会。这部电影反映斯大林时期的残酷的审讯。卡纳帕在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中负责国际关系。他在历史上曾是新兴的、最有教养的、崇拜斯大林的人物之一。当这部影片在1970年开始放映时，《人道报》那时还谴责它是在为一个“丑恶的事业”效劳。现在卡纳帕对这部影片则表示无保留的赞同。说这是“确实无疑的”，说那本书“是为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服务的”。^①已经“正常化”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揭露法国电视台播放这部影片是“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共产主义的挑衅活动”。^②《人道报》的总编辑反驳说，尽管莫斯科和布拉格的审讯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侵犯个人自由的罪行还在继续”，“对此，我们声明反对。只要我们认为必要，我们还要再发表声明……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能强制我们接受不公正的事。”^③

12月，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首脑日夫科夫指责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反苏主义”。日夫科夫最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勃列日涅夫转弯抹角、含糊其词、想说又不明说的话。《团结报》认为这种指责是“直接的攻击”和“严重的事件”。^④

① 1976年12月16日法国《世界报》。

② 1976年12月17日法国《世界报》。

③ 同上。

④ 1976年12月5—6日《世界报》。

不久之后，举行了著名的苏黎世交换囚犯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和皮诺切特互相交换囚犯：布科夫斯基换科尔巴兰。马歇认为这一事件是一笔无法接受的交易，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一个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思想而斗争的人却被置于不可容忍的选择：要么坐牢，要么流放。这是不能容许的”。^①《团结报》提出“真正的问题是苏联对自由的种种限制(……)。这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应公开讨论、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指控别人犯有言论罪并加以逮捕，同其他任何限制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形式一样，都是不能容忍的。根据上述情况，苏联可以而且应该考虑，与自由有关的、在其内部生活中至今仍未解决的所有问题有多大的分量。”^②

莫斯科几天之内就用新的逮捕活动作出了回答：逮捕了企图在莫斯科市中心集会示威的犹太人和列宁格勒的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被指控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墙上写了一条大标语：“你们窒息自由，但是，人民的灵魂是不容你们作任何限制的。”

1977年1月初，在捷克斯洛伐克散发的《七七宪章》是一百多人签署的文件。他们都是政界和文化界的杰出人士，其中许多人在1968年的运动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份文件揭露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了，而且依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要求恢复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是一场广泛的运动，它没有组织机构，但提出了这些具体的目标。他们的创举在全国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尽管当局进行镇

① 1976年12月18日《人道报》。

② 1976年12月18日《团结报》。

压活动，但是新签名的人数迅速增加。欧洲共产主义党对此表示了声援，虽然声势不算大。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散发了这个文件，并加了中央委员会新闻秘书处的按语。指出这个文件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担负建设具有人类面貌的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的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广泛感受到的一种感情，因而得到了西班牙所有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共产党人的支持”。1月25日，《人道报》谴责道：“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发表了与官方不同的意见，当局就对他们采取了行动。”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说，“我们法国共产党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这种行动感到严重的忧虑……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在《红色权利报》上指责《七七宪章》的签字人是‘受反共的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指使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惊讶。”这种做法使人不得想不到在刚刚过去的悲惨时期的那种专断。法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反对恢复这种专断的作风。尽管当局对《七七宪章》的签名者进行镇压，如开除公职、审问、逮捕和在报刊上进行诽谤，但是支持《七七宪章》的活动却遍及全国。官方企图诋毁这一运动，为了对付官方这种企图，最杰出的签名者之一，前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在2月初向奥地利电视台发表了讲话，声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在民主和人道主义方面得到深入发展”和促进“缓和在整个欧洲大陆取得进展。”哈耶克说，“我们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想以公民的身份提出倡议，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在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也在加紧活动，迫使

政府减少镇压活动，答应实行大赦。保卫工人委员会努力制定政治战略并坚持呼吁西方共产党和社会党给予声援。在苏联各地建立的各种委员会也加强了活动，争取实现赫尔辛基尊重人权的协议。流亡者（布鲁什、贝拉察尔科夫斯基、布科夫斯基、阿马尔利克等）也增加了活动，开展了内容相同的运动，同时设法为反对苏联独裁制度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派统一政治活动而打下基础。马歇在电视里同阿马尔利克进行了对话。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也都和东方各国的流亡者取得了联系。东欧各国当局，特别是苏联当局的反应则是加紧了镇压，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欧洲共产主义者进行了频繁的攻击。就在马德里召开欧共“首脑”会议的那几天，苏联集团的共产党在索非亚也举行了一次会议。从此，对欧共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就更为激烈了。然而，意共、法共和西共在马德里举行的首次会晤却使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特别是在对东欧各国局势的批评方面并没有提出新鲜的内容，也没有揭露当时在这些国家中日益加剧的镇压活动，也没有表示对受害者的支持。他们只是重申以前的立场。

关键的问题是制度的实质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已经到了这样的处境，即已经不能后退了，否则在本国人民和党员中就要威信扫地。一方面，他们肯定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继续认为东欧各国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揭露这些国家侵犯自由的活动却日益广泛和普遍。所以很难解释这

种同制度性质相矛盾的侵犯自由的活动是例外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很难回避从这些揭露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一切并非反常现象，而是同民主和自由已名存实亡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实质密切相联系的事实。这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但是如果得出这个结论，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得出与此相同的结论，那么在这个制度里，他们所继续承认的社会主义又在哪儿呢？如果说它是“原始社会主义”，这只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因为这一模式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已经达到我们大家都清楚的工业水平。即使撇开这六十年和工业水平不说（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那么在一个“原始社会主义”社会里至少也应有能推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和民主发展的某种动力。在苏联，这种动力又表现在哪里呢？不能因为历史条件，我们要继续把那里的东西看成是社会主义，因为，欧洲共产主义理论认为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性质相同的概念，要是我们始终承认这个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得出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即：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坚持认为在上述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自由和民主。

托洛茨基有一个“主要的论据”，现在已被欧洲共产主义者所采用。这个论据即：尽管苏联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的生产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个理论除了与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性质相同的理论相矛盾外，还暴露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基础不就是劳动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吗？如果实行这种所有制的政治—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都不能彻底实行民主的话，难道会存在这种集体所有制吗？

既然有过各种各样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形式和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模式，如有议会民主的形式和法西斯独裁的形式，当然也就会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形式和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有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以这种类推的方法，进行论证的。但是这种类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还有逐步建立的过程）的特点正是它同从十九世纪的拿破仑主义或自由主义到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形式上的民主制这些政治结构都相适应的，但是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这种相互适应首先表现了政治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因为它要控制和调停资产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和资产阶级同劳动群众的对抗性矛盾，以利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其次，这种相适应还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里（也不只是在生产领域里）剥削和专横的特点。由于这两种原因，上述关系能同形式上的民主相适应，因为这种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恰恰是政治和经济相分离，即政治领域里的民主和生产领域里的不民主。或者，由于明显的理由，它同各种形式的政治专政是相容的。它们之间的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关系一般都是取决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中，实际民主的多少，首先是由劳动阶级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政治、思想的多元化范围内进行斗争的能力、它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和团结水平所决定的。

如果在生产机构里民主也具有实质性的形式，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就终结了。这也就是“走向社会主

义的民主道路”的实质所在。正如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在罗马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因此要为“彻底实现民主”而斗争，就是因为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形式上的民主是不够的，没有任何民主就更不行了。没有民主，就必然会出现新的统治阶级，象在苏联发生的那样，它就会占有生产资料。

在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阶段中，政治独立于经济的状况将逐步缩小，这就是民主的逐步扩大和深入发展。考虑到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内和国际各种条件对这一进程的影响，考虑到传统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向共产主义过渡会有不同的民族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多样性只是包括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不民主的社会主义，那是不合适的。实际上，第一个概念中形容词是不必要的，尽管为了消除一些模糊观念，这种形容词也是可取的，因为此时此刻从勃列日涅夫的政权到卡扎菲的政权都自称是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概念则是自相矛盾的。

前面批判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制度观念是欧洲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保留着某些来源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又经过列宁和第三国际，最后被斯大林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加以系统化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认为取消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认为生产力的一切方面：技术、科学、某些劳动组织，都是中性的，都是可以毫无区别地、无需作任何质的变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在这两个前提下，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它的物质成果。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认为，

虽然政治上层建筑不是社会主义的，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是存在的。

所以说，苏联的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同莫斯科的关系，而且也影响到它们自己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至于第一个问题，只要坚持目前这个概念，苏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某种霸权主义就会继续下去，就是说这是一种制度的霸权主义，它除了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外，还实行了社会主义呢。

在东欧各国日益显得重要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潮流都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只要坚持这一立场，就不可能制订出一种旨在联合这些越来越重要的力量的适合的战略。这是首要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力量得不到发展，西方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到严重的危害，情况正如六十年前一样，那时，由于西方革命的失败，俄国革命者的胜利不可补救地受到了威胁。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过渡的战略适应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特点。今天，它具体地体现在它们制订的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道路”中，体现在把这一战略实际应用于各自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尝试中。

这条“道路”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正式的说法吧。在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文件中对此都有各种解释，然而1975年11月，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罗马声明中包含的解释肯定是最全面、最有综合性的。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社会主义将是民主和自由的最高阶段，即彻底民主”。

——“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得到实现”。

——“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进行公开监督，要求将这些手段逐步社会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计划”。“中等农民、小农、手工业者、中小工商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

——国家的特点将是世俗性的、民主管理的和民主分权

的,让地区和地方团体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区和地方团体行使权力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

——多党制(包括反对党的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自由组织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民主轮流执政。

——工会独立和自由活动。

——“在企业中发扬民主,使劳动者能有实际权利参加管理,享有广泛的决定权”。(在声明中给这一主张以“特殊的重要性”)

——“保障和发展”人民在过去斗争中争得的自由权利(声明详细地列举了这些自由权利)。

——“这一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只能是大规模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并动员大多数人民的强大的群众运动的结果。这一改造要求有充分代表人民权利的民主机构,确保并发展这些机构的权力,要求自由地行使直接的普选和按比例选举制。两党(过去一贯尊重并将继续尊重普选的裁决)就是在这一范围内设想劳动阶级会掌握国家的领导权。”^①

这一声明强调,两党认为文件中阐明的民主生活一切的条件都具有“基本原则的价值”,强调他们的态度“不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是来自对各自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分析,出于对整个国际上已取得的经验的考虑。”

这些原则性的观点集中反映了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各种纲领性和战略性的理论的实质。^②这

① 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些理论广泛地阐明了下列各点：进行各种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这种改革应体现过渡进程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特点；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联盟的体制，这一体制能够建立一个善于实现这些改革的权力集团；能使这个新的集团获得政权并保持政权的斗争形式和过渡时期的国际政策等等。不过，在进入这些具体问题之前，最好还是先看一看使“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切民主道路”成为现实的原则问题。这一原则是从所阐述过的各点中引申出来的。这就是要把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不可分的关系，即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实行充分的民主；要实现充分的民主，就要实行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里，我不过只在方法上从两个最容易成功的方面入手：(1)马克思主义和它指导下的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二者关系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即理解和实行这种关系的不同方式；(2)把它同发达资本主义在结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点进行对照。

历史经验

在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初期，马克思和

② 贝林格在智利失败后写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了“历史性妥协”的建议；意共十四大及其中央历次会议进一步发展了这条路线；1971年，法共通过的纲领成了为签订《左翼联盟共同纲领》进行谈判的基础。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罗马声明及法共二十二人对这条路线做了进一步发展；西班牙共产党《纲领-宣言》最初草案是在1973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通过的，而最后文本是在197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确定下来的。

恩格斯就提出了关于民主的见解，认为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根本矛盾的。1845年底，恩格斯在他和马克思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写道：“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个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在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①“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②在写《共产党宣言》的前夕，恩格斯写了另一篇文章，他指出“一切文明国家中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都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③恩格斯就是以客观的语言提出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纲领性的语言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④

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矛盾。反过来说，民主和无产阶级统治之间有客观的一致性。这一设想是在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理论的核心。这是他们在革命活动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并加以肯定的理论。革命失败后，法国立宪议会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共和国宪法，马克思分析说：“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⑤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宪法最后告成和宣布之前就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6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489页。——译者注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页。——译者注

使用军队镇压了民主的主要堡垒——巴黎的无产阶级，从而消除了这一威胁。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它面临同样危险的时候，则是和君主制妥协并求救于沙皇的军队。在这些革命的失败以及后来其它的失败中，马克思并没有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无济于事的。他证实了资产阶级反民主的性质和民主的反资产阶级的性质。他得出一条经验，提出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形式。当普选无效时，必需要有一支武装力量来支持，这支武装力量又必须拥有对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的优势。这就是阶级革命中的第一步（“争得民主”），要求摧毁过去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违背一切民主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为迈出这第一步，无产阶级需要同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它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有矛盾的，当然这种矛盾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质的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主就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里，《共产党宣言》所提到的由这些阶级和阶层所组织起来的“绝大多数”在真正唯一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那个时期情况的文章中，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强调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最杰出的政治表现。在他们整个一生的事业中，始终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不仅在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如当时的德国。那里的革命最初还包含了反封建的目标），事情是这样，就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了的国家里，如英国，情况也是这样。宪章运动就是“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第一个历史性样板。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战略有过重大的影响。^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初看起来是同马克思赋予民主的特殊作用相矛盾的。但是这个提法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来源于雅各宾思想体系中更加激进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在1848年革命中的主要代表就是布朗基党。马克思在1850年接受了这个提法，但对它的含义作了实质性的改变。此外，只是在很少场合使用这一提法。^①根据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包括列宁的表述)，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提法的意思相当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且包含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恰恰是在同那些认为这一概念包含对民主的否定的人展开辩论时，恩格斯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例子提了出来。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专政”这个概念，不管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从来就没有斯大林专政和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实践中所普遍获得的那种内容。现在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改正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这种错误的提法。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都充分地证实了民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矛盾。在国家结构中或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任何民主都是工人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的。有时，这种斗争是在资产阶级的某些派系领导下进行的。这些资产阶级派系在同资产阶级的另一些派系的斗争中，或是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需要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资产阶级迫于某种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只好使自己的政权形式适应这些民主成果，利用它多种多样的思想工具和强制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1848年的革命》第13—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和1848年的革命》第312页。

工具“夺回”这些民主成果，以便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这一矛盾消失了。这些矛盾只是转移到别的领域去了，采取了新的形式。

在这方面，恩格斯在自己的晚年，也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的1895年提出来的一些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他考虑了1848年革命后五十年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总结，也考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新条件。这些条件形成的原因有两个，即在政治结构中民主成分日益增长（这是无产阶级力量在这一斗争中日益发展的结果）和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机器的变化。^①恩格斯认为，由于军事技术的完善和军队的增加，“旧式起义……和城市巷战”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并没有排除将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武装斗争将具有别的特点。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的基本结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②这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③恩格斯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成效地利用普选”这个事实来驳斥没有成效的“旧式的起义”。^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几年之内就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恩格斯写道，“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

① 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译者注

③ 同上。——译者注

④ 同上，第603页。——译者注

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①“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②恩格斯在自己的“遗嘱”中（人们都这么说）勾划出了下面这样一幅前景：“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二百二十五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它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③

对恩格斯的这些战略和策略性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些观点应当理解成为“最后决战”积蓄力量的政策。由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危机，这一“最后决战”是可能会提到日程上来的。伯恩斯坦和明目张胆的改良主义者则把恩格斯的话说成是合法主义和竞选主义，是和平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核心。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统中派”批评伯恩斯坦的那种理解方法，但在行动上似乎又是同意的。总之，在选举中迅速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对以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10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译者注

思想指引的党来说还是第一次)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党员群众都处于一种迷惑的状态,就连恩格斯本人也不例外;这种情绪在他的“遗嘱”里就有所流露。所以,这一“遗嘱”被用来当作权威性的根据以便证明导致1914年投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主义路线是正确的。为此,1918年,德国革命处于高潮时期,罗莎·卢森堡就批判了这份“遗嘱”,部分地纠正了她以前几年的一些看法。然而她还是赞成(她在这个时期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就是证明)恩格斯晚年思考的中心思想,即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大多数人自觉行动的结果,因此必须要有民主。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其它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不管是1914年战争以前的还是以后时期的,都从历史上表明,如果不注意民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矛盾,在“一切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上”都潜伏着危险;而且也表明,在民主成就可能使劳动者获得政权前后,资产阶级势必要采取它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阻止这一进程的彻底完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选中,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野蛮地中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象1914年投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一样,这次向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不打一枪就投降了。在整个第二国际中,最左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一样,当然它的工人队伍在后来的1934年2月的流血事件中挽回了革命荣誉。1927年4月的选举中,奥地利社会党曾获得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在维也纳获得了广泛的多数。该党主要领袖奥托·鲍威尔写了一篇对胜利抱盲目乐观的文章。这篇文章使人想起1895年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

主党描绘的乐观主义的前景。他写道，“1920年，我们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三十六。在上一次选举中是百分之四十。而这次，几乎是百分之四十三。在六年半中，我们的选票增加了百分之七左右。还差多少呢？我们要走完通向政权的道路大致还需要从1920年开始再经过一、两次大选，我们就可以结束资产阶级政府了。”^①但是，不早不晚，这段时间一过，倒是资产阶级政府结束了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的罪过就是在每个具体场合都把自己的民主理想局限于资产阶级统治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这就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个特点。社会民主党这样做，在思想上是有借口的，有根据的，它认为资产阶级的使命就是实行民主。然而，每当民主的发展严重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撕毁了它的民主外衣。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生产关系彻底地否定了这种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任何一个资本家，或者资本主义结构都是不会屈服于受它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民主决定的。这不是个人意愿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本质问题。其它用来保障这个制度或使其再生的机构（军队、警察、司法、教育、思想机构等等），尽管情况和程度有所不同，都会这样做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当时不是应该谴责社会民主党讲民主，而是应该谴责它不讲充分的民主，谴责它把民主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然而，那时社会民主党

^① 见作者给恩斯特·费舍尔的《回忆与思考》写的前言，马德里“Siglo XXI”出版社1976年版。

的罪过还有另外一个实质性的方面。那就是以经济主义的方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日益社会化和原封不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据他们的解释，这对矛盾引起的客观趋势应该是不可避免地逐步导致资本主义自行转变为社会主义。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自动作用，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自动作用。这样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前景，而不必进行革命的决裂；社会民主党人的作用就是促进这一进程，使民主每时每刻都能促进改革发展。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倾向在形式上批判了这一观点，但保持了关于“质的飞跃”和“革命”的理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他的政治实践同改良主义右翼没有区别。至于左翼，它是以灾难性的，也是经济主义的自动作用来对抗右翼渐进主义的自动作用，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会把资本主义引向“毫无出路”的境地，引向“最后危机”，造成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革命力量应该促使这种局面形成，不要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议会和工会活动方面，而应该采取其它一些群众斗争的形式，如政治罢工。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左派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改良主义右翼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简单说成是把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机械主义和渐进主义的一种见解。采取相应的改良主义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由于剥削殖民地而获得长期和平和繁荣发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产物），然而，由于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第一次总危机，所以这一切企图都落空了。革命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来。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影响下并在其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大部分西方工人运动，都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些特点,都不会利用这个制度的危机。只有在俄国,作为一次社会的革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其它国家(匈牙利、巴伐利亚、芬兰、意大利、西班牙等),无产阶级的革命尝试都一一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却是法西斯专政、军事专政或教会专政,在布尔什维克寄以最大希望的德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在1919年和1923年进行了尝试,结果也失败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不惜以政府部长身分指挥对工人和斯巴达克团(共产党人)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就在这一事件中,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都遭到了杀害。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德国革命在推翻了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之后,就停止不前了。不过,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这一有限的结果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大部分群众更加相信靠共和制,通过议会,逐步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能的,然而帝国主义战争把这一发展扼杀在血泊之中。此外,根据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本身就会导致克服资本在国际上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导致资本集中。这也就为资本主义自行演变为社会主义创造理想的条件。考茨基得出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即克服帝国主义范畴里的这些矛盾可能意味着新的战争灾难和阶级之间的大搏斗,其结果一定是有利于资本家,而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则遭受一系列失败。

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领导这一革命的先锋队就是这样说的),迄今只有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革命使人懂得,它的主要敌人(没有它的支持,沙皇反革命决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就是法、英、美等战胜国代表的国际“资产

阶级民主”。正是这些国家对它实行了“预防性的包围”并派了军队帮助白卫军。俄国革命无法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列宁和他的党认为是巩固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胜利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虽然维护俄国革命，但是不轻易地去推进列宁认为已经成熟了的这个“世界革命”，而且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都认为，在具有俄罗斯特点的国家中，要想使革命超越它最初反对沙皇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是注定要失败的，其后果必定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俄国本国工人运动中引起消极的反响。

总之，十月革命和它的世界性的党——共产国际——就是这样面对自己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和社会民主党走上历史舞台的。这种情况给共产党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对民主所采取的立场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革命前，“无产阶级民主”的提法在列宁的语言里是很少出现的。他常常用的“民主”一词都是不带形容词的，尽管一般地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含意的。在他的语言里，以及在第二国际的语言里，有一些表示承认资产阶级的民主倾向的词语，^①但是，在许多场合下，列宁也强调和谴责这一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彻底性。革命前夕，他强调指出民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他说，帝国主义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他批评了一些布尔什维克低估了民主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他们对他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

^① 比如：“资本主义又引起群众中的民主倾向，建立民主机关……”；“资产阶级建立的和资产阶级歪曲的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机关”。参见《管皮·崑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15页。

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①

1917年，列宁第一次(1905年革命前后，他都没有这样做)赞扬了苏维埃这一国家形式，认为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合适的形式。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但是他没有把这一国家形式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形式截然对立起来。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是主张立宪会议的，只是发现了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少数地位时，才主张解散立宪会议。在这个时期，列宁的观点好象是把过去取得的一切民主成就毫无限制地归结到苏维埃民主中去。但是，自从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引人注目的行动之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受到前面提到的因素决定性制约的，这就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潮流在内部的反对，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和“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干涉。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讽刺了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对民主的限制，把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得的民主成果减小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他说，“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出版自由是“一种欺骗”；实际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甚至还抨击了那些“拥护民主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

而不了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①有趣的是，这样一来，列宁倒同社会民主党相吻合了。他们都承认民主的资产阶级本质。社会民主党承认这点是为了给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奠定基础，而列宁是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和民主权利都归结为“欺骗”和“空话”。有一段时期，在列宁同考茨基的辩论中，在他的一些谈话中，以及在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中都出现过类似的倾向。在这段时期中，这位俄国革命的领袖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一直相信“世界革命”会取得进展并认为根本问题是反对西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在这段时期，他一直把（苏维埃）委员会制度看作唯一“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看作最终被发现的、尽善尽美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并且以此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

这样，在共产国际的思想体系中，委员会这种民主形式同代议制或代表制形式在本质上的彻底对立从而就正式形成了。前一种形式是唯一适合无产阶级统治的，而后一种形式则只是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

委员会制度作为国家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制度）就被固定下来了。然而，委员会制度这一具体的、物质的唯一现实就很快暴露了它同关于这种民主形式的理论观点（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观点，或者葛兰西、潘涅库克等人的观点）有本质的矛盾。这不

①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7、438、442、444页。

是概念模式的偏差（只显示整个社会政治现实对理论观点的特殊性、偏差，而不影响这一模式的那种概念模式的偏差），而是使模式的实质本身都受到怀疑的矛盾。列宁宣布的劳动者应享有的民主被（军事的、镇压的、经济的、行政的、司法等等机构）国家机器扼杀了。这些机构不受人民的任何监督，都成了真正的权力中心，从属于组织它们和领导它们的中央机构，即独一无二的党的机构。苏维埃的结构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民主内容，象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一样，变成党和国家机器的传动装置。而国家机器本身又是党的机构的传动装置。党内民主逐步被取消，从而加深了整个制度反民主的性质。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就越来越被排除在“无产阶级民主”之外了，更不必说其它阶级和其它劳动者阶层了。列宁死后，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这些特点就更为加剧了：“苏维埃”政权竟然成了对劳动群众实行残酷专政的政权。但是，斯大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进程的初期后果，尽管不是注定的。这一进程在国内战争以后就已经明显形成了。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俄国革命被孤立和资本主义大国对它的干涉，这一切无疑都是对确定这一进程起到特殊影响的因素。但是，这一影响之所以重要，还是由革命本身固有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有这样一个根本事实，就是反沙皇、反封建的革命无疑是绝大多数人的革命，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它就不过是少数人的革命了。这少数人起初只是暂时地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这就是发挥民主的一切作用的困难所在。

那时，人们企图回避这一困难，其办法就是使工人代表比

农民代表占优势，使广大小资产阶级处于一切代表机关之外，把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政治、思想潮流压下去；把实际权力集中到前面提到的那些机构中去，以保证残存的那点苏维埃民主能够在必要的含义上得以实行。然而，这一企图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实行了一套办法，把最后一点民主也化为乌有。

这套办法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没有遇到什么大困难，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俄国社会总的特点来看，是因为这个社会完全缺少民主传统，就是说，人民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争取民主而进行了斗争，然而民主只是从二月革命到苏维埃民主开始被取消这一短短的时期内得到了实行。从十月革命以来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观点来看，因为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和保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它是自行其是的，不受群众民主监督的党。这个党的列宁主义观点使它在思想上就作好准备，一旦群众的觉悟达不到“历史需要”的高度，就对群众实行监护作用。总之，在思想上就是准备取代“无产阶级民主”的言论自由，如果党认为这种言论自由违背革命利益的话。

这种同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教育，能够使人以世界上最好的良心，把借口情况紧急而必须限制或取消民主看成是一种美德，认为是实行“更高的民主”。然而，如果说开明的君主专制能够在积极的含义上促使资产阶级社会降临人间，那么共产党的开明专制对于社会主义的诞生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消极的。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想走类似道

路的其它国家的革命的经验，都充分地证实了列宁自己在革命之前讲过的关于不实行充分民主就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那段话，也证实了恩格斯“遗嘱”的基本思想。

1918年，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的胆略表示钦佩，并强调德国无产阶级对没有在自己国家进行革命应负责任，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提出了批评和警告。这些批评和警告竟成了戏剧性的预言。她批评他们“对立宪议会、普选、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总之，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自由的整个机器冷淡、蔑视”。她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建立普选基础上的代议制机构，而是建立了苏维埃，拿它作为劳动群众的唯一的代表机构。但是随着在全国政治生活被窒息，苏维埃本身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里瘫痪了。不实行普选，不实行无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不为言论自由而奋斗，一切政治机构的生命就会停息，就会变成虚假的东西，唯一留下的就是官僚主义了”。^①

当欧洲革命潮流开始明显处于低落时，在共产国际中，列宁不得不批评左派对待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其它形式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尽管这种虚无主义态度是他自己促使形成的。然而，不管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还是在新时期发表的其它文章或讲话里，列宁都是提倡在这些机构里进行活动，以便进行宣传并和群众建立联系等等。但时机一到，革命还是必须摧毁它们，而不是设法改造它们和辩证地发展这些机构内部的民主成分。这些机构被看

^① 卢森堡：《俄国革命》。

作“资本主义的创造”，“资产阶级的创造”，而不是被看作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斗争的创造，因而也不是被看作内部充满矛盾的形式，其中民主的东西同专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潜在地或公开地对立的。后面三者都表现了在这些形式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列宁和共产国际在新情况下主张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执行的，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为争取经济和政治要求而进行斗争，反对在意大利抬头的并开始威胁其它国家的法西斯。这项政策被理解为一种在有利于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展直接斗争的时刻来临之前积蓄力量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一经建立，它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民主”，按照俄国模式采取“苏维埃”民主的形式。那时认为有可能建立“工人政府”或者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统一战线的“工农政府”，但同时又肯定地认为“只能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工人政府来实行无产阶级的完全专政”。①从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4年开始的转折时期，在这段共产国际宗派主义最严重的时期里，甚至放弃了旨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矛盾以及利用法西斯和其它反动力量之间的矛盾的策略。从1924年起，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说“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②后来把它叫作“社会法西斯”。1931年，共产国际认为，把“资产阶级民主”同法西斯对立起来是自由主义的观点，因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宣言、提纲和决议》第159页，米兰，“Filtrinelli”出版社1967年版。

②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46页。

为“法西斯在组织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中派生出来的”。在这些看法中，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创造，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形式，是完全适应它的阶级统治的，这种观念在思想上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反映在共产国际“民族小组”所采取的政策上，后果是恶劣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德国共产党被希特勒打垮。

这一失败和纳粹侵略苏联的威胁使共产国际在策略上采取了一个惊人的转折，把保卫民主和在民主被取消的地方争取恢复民主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中心目标。其实这里所指的民主还只不过是尽可能积蓄力量的必要阶段而已。时机一到，这支积蓄起来的力量就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的模式演变成了警察专政，对老一代革命近卫军进行了阴险的审讯，把几百万共产党人和非党劳动者投入集中营。对这一现实，特别是对这种镇压的方法和规模，外界实际上是无法知道的，甚至连大部分苏联人民都是无法知道的。

有关这一镇压的保密工作和镇压本身一样，是组织得很好的。如果有些案件得以公开，那是因为这个政权自己认为这样做对它有利，或者是因为保密机构没有控制住。就是这样，这些案件也被认为是保卫革命成果免遭叛徒、破坏者和资本主义国家秘密情报机关的间谍的破坏而采取的措施。在本书第二部分，我们已经谈过迷信“社会主义祖国”的原因。那时，这种迷信是共产党人的特点，它使他们无条件地相信官方对这些事情的说法。但是，对托洛茨基和俄国其它革命者的指控，就连社会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其它民主力量的大部分人

都只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对“反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指控，他们就更不相信了。另一方面，1936年斯大林搞的宪法，给用以掩盖镇压行动的党政一体化机构披上了一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官方把它宣传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它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政权从结构和方法上实际否定了的一切在文字上保留下来，造成假象。但除了对苏维埃制度难以认识清楚之外，在当时情况下，对西方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来说，更关心的是法西斯的威胁。

法西斯的威胁和共产国际的转折，使得建立人民阵线成为可能和必要了。人民阵线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同样，苏联也同那些与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主义目标有利害冲突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联盟。苏、美、英“伟大联盟”的形成就使后来反法西斯民族联盟有可能（也需要）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民主纲领的基础上，把一切力量，从共产党到资产阶级的上层阶层（其民主成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决于国际和国内力量的对比）都包括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正象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说的那样），在共产党内有人企图制定一种带有民主性质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从1935年举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7年冷战开始（除去执行德—苏条约的两年）的十年当中，共产党都是把民主问题作为自己的战略中心。在制定和执行这条新路线时，起主要作用的都是那些经受了法西斯独裁考验的共产党，那些为阻止法西斯上台而进行过斗争的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党）以及在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内活动的共产党，如法国和捷克的共产党。在理论阐述方面，季米特洛夫和陶里亚蒂最为突出，陶

里亚蒂在这方面的建树最为杰出和持久。到葛兰西的“发现”（在意大利那是1947年以后的事，那时在意大利开始出版他的《狱中札记》一书。在其他国家，则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分析和思考补充了新的基本因素。

意大利共产党第一个提出必须把争取民主的斗争作为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抉择。葛兰西是完全在列宁主义的战略蓝图内设想这一斗争的。但是他分析了意大利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南方问题”和“梵蒂冈问题”，并以特殊形式提出“工农联盟”的问题，从而丰富了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1926年，他被捕入狱，接着，由于他同苏联领导，也就是同共产国际有分歧，他靠边站了。意共改由陶里亚蒂领导，在1924年至1938年这一时期内接受并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极端宗派主义的政策。葛兰西是反对共产国际这一政策的，但是陶里亚蒂为首的领导没让全党了解和讨论他的意见。

从1934年开始，陶里亚蒂虽然还是抱着他自己原来的、大体上可以说是倾向于策略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观点，但他还是接受了葛兰西的上述思想。他受到西班牙内战时期民主共和制的启发，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在这种“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将争得领导地位。但这种思想还是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民主和自由保留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只有通过社会经济改革，才能使其超越这个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的胜利后，在苏联军队解放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内再次出现了这个思想。实际上，不管是“新民主主义”也好，还是后来所谓的“人民民主”也好，它们都

是由解放他们的军队从“外部来决定”的。在这支军队的支持下，共产党对政权，特别是对军事和警察机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政党都只是起跑龙套的作用，工人和农民的自决权被限制在共产党的领导们所能接受的限度内。

冷战一开始，莫斯科就要求把这类“人民民主”中仅能存在的那点民主都一笔勾销掉，并把作了这样那样无关紧要修改的苏联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都搞了莫斯科那样的“审讯”。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干部都因为以这样那样方式抵制（或者有抵制嫌疑）各自国家的“俄国化”而被处决或关进了监狱。他们都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者。铁托主义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第一次胜利地抵制了莫斯科的统治。

作为西欧抵抗运动的主要核心的共产党人，左翼社会党人和其他激进的民主团体，都把“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提了出来。“新民主主义”开始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提出了问题。但是，在意大利，自陶里亚蒂根据莫斯科的意见强加给意大利共产党“萨莱诺转折”（即抵抗运动同君主制以及在最后时刻从法西斯营垒中解脱出来的力量实行妥协）后，在法国，法国共产党（也是在莫斯科的授意下）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也实行了妥协。这些抵抗运动的先进的民主纲领失色了。在抵抗希特勒法西斯时期，以及在1945年成立的反法西斯民族团结政府中都是主要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共产党，都接受了美国军队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要求。

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当时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实行另一种政策，不是直

接为争取政权而斗争的政策，而是实行在抵抗时期所主张的那种为深刻改革而开展**进攻性**斗争的政策。^①的确，对这种抉择根本就没有探索过，因为两党的政策都是自愿服从于“伟大联盟”的，并首先从尊重雅尔塔大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做起。在1946年立宪议会竞选纲领中，意大利共产党就断然宣布，“意大利必须在民主大国的团结中谋求自身的安全，反对利用这些大国之间的分歧的任何企图。这些大国的任务是领导重新组织全世界的工作，以保障各国的和平与正义”。^②在共产党内部从来没有过这么荒唐的幻想，以为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会忠实地服从民主的作法，会接受劳动者在社会和国家的一切领域中越来越大的干预和作用，直至进入一个新的社会。

在“渐进的民主”观念（这一提法是陶里亚蒂开始使用的，他是想强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民主主义”的渐进性质）中却充满了这种幻想。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从政府内部为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恢复和保持秩序，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使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保持在这一恢复工作能容忍的限度内。1947年，共产党被赶出西欧各国的政府，这不仅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统治的内部需要，而且也适应它的对外政策（完全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需要。那时，美国手中拥有原子弹，从而在军事上占了优势，它的经济在战争中又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而苏联的经济却削弱了，从而美国在经济上又占

^① 我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一书的《（法国）失败的革命和（意大利）失败的革命》一节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② 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第116页，巴塞罗那，“Avance”出版社1976年版。

了优势。于是它利用这种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对它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结成的“伟大盟国”开始发起攻势，以图改变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分割，使之对自己有利。共产党因为继续把“捍卫苏联”作为自己政策的最高原则（其根据就是在那里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从那里开始发展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它们都被看作是同美国新政策水火不相容的力量而被清除出西方政府。

实际上，正如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分析过的那样，“冷战”只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想不要走向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直接冲突而进行的对抗，以便适应在签订雅尔塔协议之后变化了的实际力量对比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瓜分世界。这种实际力量对比的关系只能通过这种对抗才能显示出来。而在严重时刻这种对抗就在亚洲的朝鲜和欧洲的德国表现出来了。

“冷战”并没有使各国共产党在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上对莫斯科的从属关系更加密切，而是使这种从属关系公诸于世。为了对抗美国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莫斯科在属于它势力范围的国家里推行了另一条帝国主义的政策（它的动力和方法有一部分与华盛顿的政策不同，也有一部分是相似的），即各国共产党都无条件地、不加任何批判地支持莫斯科的这一政策。另一方面，只要莫斯科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各样“民族道路”可能会削弱在它领导下的各种力量重新组合起来对付美国这个对手，或者可能引起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哪怕是表面的怀疑（即出现铁托主义的危险），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民族道路”的探索工作也就中断了。实际上，1945—1947年间的各种“民族道路”尽管包含有这种

危险的萌芽,但也并不意味着拒绝苏联模式,而只是类似人民阵线政策在扩大了的范围内的翻版,是走向苏联模式的一种新途径。这些道路还包含这样一个设想,即苏维埃制度代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高形式,它要求共产党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冷战揭开了西方共产党战略中这种顽固的“两重性的背景”。

1956年以来,各种“民族道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意义,这是苏联内外政策的转折直接影响的结果。现在的情况也是由冷战的“僵局”和斯大林逝世出现的政权内部危机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对内政策方面,苏联领导集团内的多数派决定使制度“非斯大林化”,以便更好地延续这种制度。他们把这一行动称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对外政策方面,同美国达成具有长远意义的谅解成了坚定不移的方针。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提出,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可能通过“和平议会道路”取得政权。苏联领导人提出这一倡议有几个目的,那就是使西方共产党都把自己的战略与苏联的新政策一致起来,把这些党对苏联这个中心的服从建立在较少矛盾的基础上。苏联的这种调整似乎就是承认1947年以前在这些党内出现的要求走民族和民主道路的倾向,同时还使这种道路不会危及对它的服从,使这种道路处在莫斯科正统思想和内外方针的政治需要所容许的限度内。

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议会道路”在西方成为可能,是因为每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用原子弹消灭它的对手,而使世界大战被排除在历史的前景之外。因

此，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根据苏联的分析，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从一个五年计划到另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前进，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面危机”中挣扎，已经不能发展生产力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变化不可避免地将会到来。（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庄严地宣布，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在七十年代一定会在一切领域里超过美国）到那时，如果各国共产党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议会多数，谁都无法阻止它们和平地取得政权。

1957年会议声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和平而斗争”。保证两个制度的和平发展就等于保证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和平地）获得胜利。为了能够利用有利于将来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机，为了促使这种变化的发生，各国共产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机构和制度，提出类似人民阵线的战略，在“为和平而斗争”的问题上，甚至提出比人民阵线更为广泛的战略。但是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1957年会议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必须确保执行这种过渡的第一条“根本规律”，即共产党的领导。^①这就意味着可以选择苏联形式（被称之为“最高级”的形式），也可以选择“人民民主”国家采取的形式，那里有由共产党操纵的非共产主义的虚设的政党，有虚设的议会和虚假的自由。

^①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

西欧的共产党都采纳了苏联的这种观点，只有一个有影响的党除外，那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从陶里亚蒂接见《新议论》的记者起到意大利共产党八大这段紧接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时间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确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条道路已经包括了二十年后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根本思想，特别是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多元化，同民族、历史具体发展的有机联系，以及拒绝苏联的模式等等。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现任领导人说，“那时，我们想打消人们的一种疑虑，即以为我们的党愿同其他政治力量合作并尊重民主制度，但是只要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而需要进行一次“飞跃”的时刻为止；以为从那以后历史进程的方向和我们政策的方向必定会越来越象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模糊的观念已公开得到了澄清。”^① 各国共产党战略引起的这种疑虑或模糊的观念实际上是同在1956年以前民主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的战略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三十年代人民阵线和四十年代反法西斯联盟）联系在一起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种疑虑还继续影响着西方共产党的政策，甚至影响着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意大利共产党虽然考虑到它对国内问题的看法受到东方“模式”的明确批判，但在国内的言论和实践仍同它所签署的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相矛盾。

^① 罗波利塔诺：《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同恩里·奥布斯巴夫曼的谈话）第42页巴黎社会出版社1976年版。

这种模糊的观念特别影响到法国共产党的反对戴高乐独裁主义的政策，和西班牙共产党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因为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二十大后两党继续以极端亲苏而闻名。这同他们的民主目标是格格不入的。法国共产党附和了苏共不可言表的欲望，对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采取的路线发起了众所周知的攻击，而在以后的十年中，对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观点一直采取很大的保留态度。后来，这种情况虽渐渐地有所缓和，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一直延续到1975年11月两党会晤为止。这次会晤才使法国共产党站到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当然在国际政策上还存在分歧。

总之，苏共二十大以后，显示出东方国家历史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民主的否定。这不仅是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也是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否定。这就或早或晚地迫使欧洲共产党批判性地疏远这些“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在这段时期的发展，以及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社会主义”制度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共产党可以执政的希望，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构的东西了。与此相对照的是，苏联集团长期以来处于相对贫困，生产率低，存在着尖锐的不平衡现象和其他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别看官方的那些说明全面增长的数据十分引人注目，但由于缺乏任何民主监督，这些数据没有多少可靠性。就是出现资本主

义制度新的全面危机，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困难也同样严重起来了。

上面的希望破灭了，这也促进了西欧共产党更加坚定地决定探索自主地解决问题和探索在国内建立巩固的联盟。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前面提到的模糊的观念，并且坚定地解决民主问题。当前，不仅“和平竞赛”的结果变得靠不住了，就连“和平竞赛”本身也正变成两个超级大国的合作，以确保合伙统治世界，互相尊重与各自认为是生命攸关的势力范围。具体地说，在欧洲，苏美积极共处的最高原则过去是，现在也还是维持现状。这就产生了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的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与莫斯科对外政策的冲突。

中国企图用文化革命来全面替代苏联模式，但只不过是企图而已，然而它促使西方共产党内的一些人更加贬低苏联的模式。不过，除了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外，并没有很多人提出新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思想来取代它。在这少数人中，一部分人同传统的党断绝了关系，建立了一些追随别人的毛主义党。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宗派而已，因为他们的观点和实践都是完全脱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实际的。还有一些共产党人的小组织企图在党内（直到他们被驱逐出党）用文化革命的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寻找西方革命的新战略（宣言派组织就是这一态度最有代表性的组织）。

第三世界的革命和革命运动，特别是古巴革命，拉美的游击战争，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越南的革命战争和巴勒斯坦的游击战争都对欧洲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特别是对青年人起到激进作用。在党外，这些革命也促使左翼（往往是左倾分子）

起来批判这些党因循守旧的政策，这些政策只着眼于同统一的战略抉择毫不相干的眼前目标。

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一种简单化的观念，即以为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就不断地处于“总危机”之中。由于理论上受到这种观念的制约，各国共产党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严格态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的实际发展，分析这种制度在一切领域里结构上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漫长的发展阶段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只是在很晚的时候，当战后的发展已经接近衰竭了，这些党才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新资本主义的思想臭气熏天，遍及各个角落，而欧洲各国共产党还是把自己关在防守的阵地上，只局限于支持（如果支持的话）工会斗争，争取在市政和议会里搞点席位，作一些宣传性的演说，没有对国内外现实进行分析（包括对赫鲁晓夫式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和对新资本主义深刻的批判），也不去分析第三世界的革命在西方产生的影响，更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前景。反对戴高乐政权或反对天民党的斗争淹没在毫无前景的日常斗争中。反对佛朗哥独裁专政的斗争给西共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全面目标，它在这场斗争中开展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行动，不过由于党不了解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也不了解佛朗哥政权的真正本质和作用，这些行动受到了影响。党长期抱着一种幻想，以为佛朗哥政权是很脆弱的，即将倒台，还想建立各种各样的、不以各阶级的实际观点为基础的联盟，结果在1964年党领导的机构发生了危机。被开除的少数派提出了一些与苏联制度、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和党的性质有关的问题。几年之后，这些问题（除了有关党的问题外）

都部分地被党的领导班于接受了。在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局面和冲突。陶里亚蒂逝世后（他的“遗言”就是深入实行“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开始了一场争论，当时意共内部有左、中、右三种倾向。一开始就争论意共青年组织的激进化问题。

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二十大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共产党内外的重新活跃，使法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学生组织的危机和内部的紧张局面。多列士甚至抵制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把塞尔文—加萨诺瓦派撵出了党组织，但他临终前也只好作一点让步，回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路线上来。这条路线由于1964年瓦德克·罗歇被提拔到总书记的职位上而最终形成。

六十年代后期，这三个党（特别是法共）发现党外不仅建立了极左组织，在学生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新潮流。它们都想取代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与此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以及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已提及过这个问题）都在它们内部产生了影响，暴露了这些党从共产国际时期以来就有的一个毛病——理论上的贫乏。所有这一切缺陷集中表现在政治方面缺少一个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战略。苏共二十大炮制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议会道路”行不通了，但又没有别的道路（除意共政策中所包含的局部因素外）来代替它。

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三个党被1968—1969年的事件弄得措手不及。1968年春天在法国和1969年秋天在意

大利爆发的伟大的社会运动，一下子就使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提到了日程上来，证明这一改革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又表明实行改革的道路不能只局限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的形式和范围内。这些事件恰恰指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深入实行和扩大民主。到了一定程度，这就意味着政权关系，社会结构，整个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过，关于这个民主要求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再来谈。这里，我们提前谈一谈 1968 年和 1969 年的运动问题。这场运动不仅向整个社会，而且也向各种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其他主张社会主义的组织提出了这一要求。而共产党由于没有自己的战略，由于自身特性，本身都困难重重。它们非但不能去发挥这些运动潜在的力量，给它指明政治出路，反而起了阻碍这些运动的作用。意大利共产党对这一点比较了解，它机敏地“骑上了老虎”，使自己去适应工人和学生群众自发创造的基层民主形式，以便从内部去“节制”这一运动的冲力。但是法共却公开对抗学生运动并且竭尽全力使工人阶级也去对抗学生运动。

法国的 5 月，意大利的秋天和入侵捷克（它的影响我们已经谈过了）成了对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真正的挑战，把它们理论上的许多空白、落后状况和墨守成规的作风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种来自群众、特别是来自青年的批评，也是来自进步工人的一种健康的批评，尽管有时也犯一点“左派幼稚病”（不过老年人的保守主义也是危险的）。从那时起，这两个党，还有西班牙共产党和西欧其他共产党都

加倍努力深入分析现实和调整自己的战略。法国共产党在其中央委员会 1968 年 12 月通过的《香比尼宣言》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1972 年又同社会党和左派激进党签订了《共同纲领》。意大利共产党采取了 1973—1974 年的“历史性妥协”的战略。西班牙共产党也在 1973 年开始制定自己的《纲领—宣言》。1975 年，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意共和西共，另一方面是意共和法共都共同制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说是一回事。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以及以它为指导的工人党的政策中，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所经历的历史性、反复变化的简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如下几点：

1.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与此同时雇佣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民主的旧概念获得了新的、与资产阶级统治相对抗的含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中，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因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争取阶级统治的轴心。

2. 工人运动一开始，经济和社会要求就是同争取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实行民主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3. 由于无产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日益增长，资产阶级只好在民主领域里作一些让步，但还是利用它自己思想上的统治和强制性的机构把劳动者争取到的民主成果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所允许的范围内。

4. 资产阶级用来保持自己对群众施加影响的最有效的思想手段之一就是占有民主的专利权。资产阶级把必然性变成美德，同样地把通过斗争从它手上夺走的东西变成了资本

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变成了它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创造，甚至变成了它的理想的国家形式。这样，民主就成了没有阶级内容的、独立于社会阶级的一种形式上的政治手段，它使各阶级互相合作和协调行动。资产阶级被迫向劳动者的经济斗争和社会斗争做一些让步，这就加强了上述思想上的幻景。然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做这些让步，是由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

5.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把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夺取来的成果看作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本质的表现，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化是对人民群众觉悟产生消极影响的异化形式之一。它使人民群众在一些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毫无根据的幻想，以为这些局部的民主成果是牢固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使他们低估民主的重要性，不相信民主。这些作用深深地制约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思想和政治潮流，即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潮流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潮流。

6. 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大多数社会党内处统治地位的右翼）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奉为至宝，认为民主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机构。在民主的范围内，通过各阶级的合作，就能逐步地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实践中把竞选、社会谈判和资本的利益所能允许的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它的政治和社会目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适应资产阶级统治所强加的界限的。这样，它在资本主义相继现代化、合理化中起到积极因素的（非对抗

的)作用。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无法消除劳动人民的民主成就和资产阶级统治之间潜在的或公开的冲突,只不过使它们稍微减轻了一点。

7. 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各国共产党是在同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展开针锋相对的长时期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在它们的思想 and 政策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们总是把民主同资产阶级的统治等同起来。这种作法正好是同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相合拍的。当把民主这一词冠以限定词并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时,就给人一种印象,好象资产阶级也可以是民主的。另一方面,由于在整个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民主”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政权中的,在那里劳动群众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否定了,共产党就助长了那种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容纳民主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中,西方各国共产党把部分实现群众争得的民主的那些机构和制度只是策略性地加以利用,或当作工具来使用。一旦获得了政权,就要取消这些机构和制度,并以东方各国制度化了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模式来取代它们。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政策就是共产党重新评价“资产阶级民主”和利用它来积蓄力量和建立联盟的一个开端。但其前景(直到最后几年的转折)还是一样。在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也一样)的实践中,“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这一概念传统地包括政治领域里的活动(共产党负责)和社会领域里的活动(工会负责)的相互脱节。这一概念如果不是同基层的或群众的民主形式相对立的话,那也是低估这些形式的。而基层的或群众的民主形式往往是把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8. 已经执政的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光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实行工业化是不够的。其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它象以前那些制度一样,还是建立在把人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建立在文化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在专制和不平等的基础上。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以帝国主义战争、殖民主义战争、法西斯和各种类型的独裁专政为里程碑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民主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说明部分民主和自由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的利益不需要它们,而人民群众的斗争又阻止不了,这些民主和自由往往就会退化。这两方而的经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理论上阐述过的一条真理,即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9. 随着东欧的“社会主义”实际情况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了解,资本主义欧洲的共产党就面临着一个尖锐的抉择。这个地区的人民是经过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受过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锻炼的人民。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导致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建立,那么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就等于把一切政治前景都堵死了。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者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作用,用这种思想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的作用,以及几十年的传统和实践的影响,结果很难使理论现实化,以至于经历了很长时期,才重新发现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并形成了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战略。这一战略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主力所在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严峻考验。

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

在资本主义的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统治和民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在目前全面危机的时刻更为激烈。这一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特点中完全反映出来了。根据普兰查斯的看法，^① 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权力极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损害了代议制制度（议会、市议会等）；三种权力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在组织上合而为一，这种合而为一的主要特点就是行政机构干预另外两种机构（如警察干预司法机构）；由于国家机器的霸道，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资产阶级政党的衰落和它们对掌权集团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组织作用转让给国家的行政官僚机构；无论是对人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更加施用国家的暴力，并不断完善其暴力机构；建立实行“社会控制”的新的范围和手段；国家每一个部门和机构（军队、警察、行政、司法、思想机构）一方面都成了徒有形式的、装样子的结构，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真正作用让位于受最高行政机构严密控制的隐秘的核心，结果，实际的权力中心不断地从国家各部门和机构向这些隐秘的核心转移；保密的原则扩大了，而公开宣传的原则被破坏了；与此

^① 尼科斯·普兰查斯，《国家的危机》“目前国家的改革、政治危机和国家危机”一章，第55—57页，巴黎“PUF”出版社1976年版。

相协调，和传统的“权利国家”相适应的权利制度和司法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及其它反民主的、专制的、镇压的特点。

即使是这样，在西方社会还保留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它掩盖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变化（今天这种变化更严重了），但是，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下的一点民主恰恰是工人和人民群众运动抵制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取消民主的内在倾向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力量直接作用的结果，是力量对比的一种表现。今天垄断资本主义正是要改变这种对比关系，使之对自己有利，以便打击劳动阶级的抵制，靠劳动阶级作出牺牲来解决危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对民主自由发起进攻和采取“反危机”政策，总是并行不悖的。上面提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变化，也就是强制推行下列“紧缩政策”所必需的政治—组织机构的本质部分：失业的同时又加之以通货膨胀，财经负担的加重，本来就不足的社会服务事业的恶化，对在职劳动者的剥削的进一步加剧，生产的集中和合理化不仅损害雇佣劳动者，而且也损害农业、工业和商业小资产阶级，中型企业等。

垄断资本的这种政策结果对人民群众的处境和态度起了自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以传统的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和新的雇佣劳动阶层为主体的广大人民，集中力量反对垄断资本的政权。从这一观点看，垄断资本这种政策倒反而为制订反垄断资本主义战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客观基础。这种战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捍卫民主，而且还要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包括生产）的一切领域里广泛深入地实行民主；要把这一种彻底的民主要求同下列经济和社会目标不可分割地联系

在一起；对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民主制订计划，投资以社会需要为方向，充分就业，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改造，使小型私人企业适应各种新型的发展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反危机”政策又促使社会机体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和矛盾进一步加剧，比如在已就业的劳动者和失业的群众之间、不同级别的劳动者之间、劳动者和小企业主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等等。使雇佣的青年和妇女的生活条件恶化，这部分人在失业者当中占多数。堵死了学生群众的一切出路。这一切引起各部分人的集体自卫的反应，增加了分裂的因素，激起了群众忿怒和沮丧的情绪。垄断资本的政权和它的政治和思想机构通过各种途径煽动并利用这种情绪，在进行镇压的同时，采用损害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办法向另一部分人作某些让步。

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种战略才符合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道路，这种战略要把垄断资本的经济手段和政权当作人民群众的主要敌人、危机的最大祸根，而且要把绝大部分人民团结起来，以消灭这一政权，并用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来取代它。但是，法共、意共和西共提出并执行这一战略时，又有一系列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涉及反垄断资本主义战略的实质内容问题。

三个党都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民主的方式战胜垄断资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而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漫长阶段的开端。法共称这个阶段为“先进民主”，西共称为“政治和社会民主”，意共称为“民主革命新阶段”。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至

今,这三个党中没有-一个党怀疑这一观念),社会主义就是处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长时期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以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取政权开始,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主要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蓝图中提出的“向过渡阶段过渡”也是以这两个根本特点为特征的。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因为垄断资本是决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而垄断资本的国家机器,除了对经济领域也进行决定性的干预之外,还是决定这一社会形态的政治-思想结构。所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战胜垄断资本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纯粹反资本主义的,而不只是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意义。由于这一胜利,一个新的进程也就开始了。这个进程的逻辑是由下列特点决定的:着手改造国家的新政权具有工人-人民的性质;集中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有决定意义的经济手段的大规模的公共经济部门的特点;市民社会一切领域的彻底民主化。尽管在法国左翼联盟《共同纲领》中,或是西共建议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纲领中,都有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是切实地执行这些纲领,就能开创具有上述特点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为什么不能赋予这一进程以社会主义性质呢?

在意大利共产党内,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具体回答,这里有其特殊情况,这就是由于它的“民主阶段”更不明确,因而有别于法共和西共的民主阶段。意共的“民主阶段”是渐进主义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的规律开始让位于倾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规律。但是,为了使这些“因素”和这种“规律”占统治地位,需要一些什么条件?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切问题都在“历史性妥协”的迷雾中消失了。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的二十二大对“先进民主”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的问题作了回答。这个党的一些主要理论家是这样概括这一问题的：“《共同纲领》中确定的阶段和带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城墙，社会主义就是贯彻到底的民主，亦即各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延伸到至今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商业和服务行业的一切大企业中去；就是民主经营和民主计划的扩展，新闻报道和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就是工人阶级在劳动人民政权内部确立自己的能力；就是运用与人民运动同样的民主武器；勇敢的斗争和普选，使自己能够在社会解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①可见，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但一下也很难说清，为什么这些差别要比垄断资本的失败、政权向工人阶级领导的联合政府过渡、主要生产资料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等等这种质的决裂，更能识别进程的社会主义性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西班牙共产党。它的《纲领—宣言》说：“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就是目前还掌握在寡头集团手中的、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和财政手段向社会所有制过渡，因而也就是向生产资料社会化跨出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但是，这还不是社会主义。”^②这一文件说，“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阶段，还将有中小型私有制企业，因而也存在资产阶级，它只要享有合法权利，自然是抱有权欲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社

^① 让·法布勒、弗朗索瓦·辛格尔、卢西恩·塞夫：《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第213页，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版。

^② 《西班牙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124页

会内部的一切领域，都会有积极的阶级斗争。”接着《纲领一宣言》宣布，“把带有这些特征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就等于降低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只是整个生产和交换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而且也是生产力、个人和社会觉悟、平等和自由关系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一种新文明。这种水平不仅是由在政权机关里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这些阶级在经济结构里，在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觉悟方面实现的实际变化所决定的。”贬低社会主义？要明确无误地解释清楚西共想以此说明些什么是很不容易的。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阶级斗争，尽管阶级斗争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阶段是存在的。这使人推测，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又指出还将有阶级存在，但是这是存在阶级而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吗？这是赫鲁晓夫式的、唯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新翻版吗？

阶级继续存在(其中包括中、小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些因素继续存在(如市场、资本主义的分工等等)，因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只有经过很长的过程，也就是经过阶级斗争的过程，这些特征(象国家一样)才会慢慢地缩小和消亡。因此，把欧洲共产主义者称之为“先进民主”的阶段与社会主义质的差别建立在这些特征上也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可以想象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他们还没有说出来或明确地提出来。

其中有一个原因，即：为了稳住非垄断的资产阶级而进行广告性的宣传（正如把商品放在迎合顾客心理的包装里一样）。因为“先进民主”的观念尊重资产阶级利益，只反对垄断

资产阶级，它比社会主义标签更能博得资产阶级的信任。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一宣言》很清楚地流露出了这一点。它说：“工人阶级保证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阶段尊重非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来争取与之有联系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以便结束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国家政权。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走投无路的非垄断阶层有可能同工人阶级联合，以争取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得到保证。”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一种特殊观点（前一个原因是从这一原因中派生而来的策略主义的东西）。后来虽然对这一特殊观点做了一些修改，但它在共产党内仍占统治地位。（意大利共产党常常回避这种观点，但在文章的分析中又不能不有所流露。）根据这一观点，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同一切劳动者阶级有对抗性矛盾，而且还同非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切派系有对抗性矛盾。这种观点似乎没有考虑到，非垄断资本也是有机地结合在垄断资本领导的总结构里的。这就是说，它的运动、发展和再生是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制度的运动、发展和再生的有机部分。这一制度的规律不断地使一些非垄断资本的（也有垄断资本的）企业破产（危机时期这种情况更严重），但同时它也会再生出新的企业，会产生出新的非垄断资本的企业。垄断资本一方面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喜欢非垄断资本，另一方面又希望非垄断资本破产。在这两类资本之间有对抗性矛盾，但又相互补充。

这种两重性联系也表现在政治权力和国家方面。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并不象共产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只是垄断资本一家，而是一个**权力集团**。除了垄断资本各派系（有时这些，有

时那些派系处于领导地位)外,还有非垄断资本一些派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个权力集团。垄断资本的国家正是这一权力集团政治、思想和组织制度的产物。它反映了这个集团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同时这个国家又受到被统治阶级力量及其斗争的制约。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对统治集团中的一切阶级和各阶级派系有一定的自主性,只有这样它才能完成确保整个制度运行和再生的首要任务。但是,法国共产党现在仍认为,“国家同垄断集团一起有机地组成一个直接掌握控制社会一切杠杆的唯一机构”。^① 西班牙共产党在《纲领一宣言》中说:“现今的国家是垄断资本独有的工具。”从把垄断资本和非垄断资本的关系缩小成简单的对抗这一点出发,共产党就认为在反垄断资本政权的斗争中整个非垄断资产阶级都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为了促进这一联盟的形成,必须向非垄断资产阶级保证它的利益会得到尊重,保证新政权不超出“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框子。

提出“向过渡时期过渡”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共产党相信由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所以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西班牙共产党在《纲领一宣言》中声明:“历史证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使共产党比任何其他工人政党都有更好的条件在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战斗中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② 共产党认为,工人阶级如果不是由共产党来领导,就不可能真正成为领导

① 《共产党人和国家》第 119 页。

② 《纲领一宣言》第 139 页。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阶级，而这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为了减少这一理论同与社会党结盟的矛盾，法国共产党现在使用“起领导作用的影响”这种提法。但对这个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有其‘普遍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有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要有这样一个起领导作用的先锋队的影响。”^①这可能就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在自己战略中谨慎提出的“向过渡时期过渡”的另一个关键。只要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发挥它的“起领导作用的影响”，就不能从“反垄断资本的过渡时期”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乍看起来，这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的问题可能有点抽象，有点学术性质，但是，它对欧洲共产主义党具体行动的实际影响不是不重要的。首先，它影响着这些党的短期政策，把它们导向（已经开始被导致）同垄断资本领导的统治集团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因为要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向过渡时期过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是为了指出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一个没有把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垄断资本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并没有被击败。这个阶段意味着阶级斗争将特别激化，因为垄断资本的失败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所以，把这个阶段看作是持续时间很长的、“稳定民主的”、“先进民主”类型的阶段是不实际的。打算同整个非垄断资产阶级、同为垄断资本这个或那个派系利益服务的政治力量建立稳固的联盟那是幻想，尽

^① 马歇：《在法国共产党二十二大的报告》，收在《走向政权的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一书第128页，巴黎1976年版。

管需要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需要争取受它们影响的群众。

在象法国或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先进民主”的前景只有在类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样经济高度增长的条件下方有某些现实的可能性，这不是战胜垄断资本，而是以瑞典的方式或西德的方式同它在逐步改良的环境中共处。其条件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完全社会民主党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目前仍处于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这种前景。要么争取社会主义的力量决定性地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要么发生反革命倒退（这在西欧的条件下不一定就会出现皮诺切特主义，尽管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两者必居其一。这一类型的阶段在意大利已经开始，在法国正在接近，在西班牙已经为期不远了。

有一种是渐进主义的策略（“两个阶段”的策略可能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它主要反映在政治领域里，特别是反映在竞选活动中，它使社会斗争和一般的群众行动都从属于同资产阶级（剥削广大工人阶级的非垄断资产阶级就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的这些或那些派系结成的联盟，但又害怕这一斗争会促进统一的工人和人民群众组织获得自主权，从而加强他们的政治作用，因而使共产党神圣的“领导作用”受到怀疑。在这一时刻，没有比这种策略更加不明智、更加危险的东西了。这一看法根本不是要低估竞选斗争的重要性和普选的作用。相反，民主选举各级的代议制议会时时刻刻都表现一定的力量对比关系，而且又反过来影响这种对比关系。如果这一重要的指示器表明支持彻底改革的足够巩固的和有觉悟的多数

还没有形成，这就说明，在代议制机构里和在群众斗争中同垄断资本开展决定性搏斗的根本条件还不存在。但这一力量对比关系（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主要是在社会领域里孕育起来的。正是在这一领域里，广大人民群众（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由不同等级的雇佣劳动者和个体小生产者组成的）能够通过为争取以自己如下的目标来取代资本家的目标而进行的实际斗争来提高自己的觉悟，使自己统一起来，组织起来。这些目标就是不仅给那些最令人痛苦的问题（如：工资、物价、就业、劳动条件、住宅、教育、交通和卫生等问题）提供直接的、根本性的、尽管是部分的解决办法，而且还要改变市民社会的一切领域和机构（首先是劳动场所里）以及国家机构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在这些机构的职工当中，包括军事和镇压机构的人员当中，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在他们的声明中都强调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往往又违反这些声明。对此，不论是在这些党的内部，还是它们领导的工会组织内部，批评越来越多，这不是偶然的。当然，在这方面的具体批评必须从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出发，这已不是我们所要讲的了。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明，“两个阶段”的战略观点，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总是要导致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脱节（正如我们说的那样，这是共产党极为传统的做法），使社会斗争从属于政治斗争；在竞选中，把政治斗争置于优先地位；阻止阶级斗争，以便不至于妨碍同“非垄断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阻碍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自治等等。目前，由于危

机,选择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日益紧迫,在这种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我们只想强调上述种种倾向的危险性。意大利目前的局势最能说明这种危险性。

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尝试

随着“历史性妥协”不断地具体化(和缩小)为“跳跃性妥协”,随着意大利共产党日益接近参加政府,西欧这个最大的共产党内部不安和疑虑的征兆也越来越多;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感到不安,对党的现行路线感到疑虑。令人烦恼的事情开始是在基层出现的,后来在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意大利共产党主席隆哥和一些在1976年10月当选的中央委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求劳动者做出的“牺牲”真的将会导致人们期待的改革,还是将强化天主教民主党为之效劳的垄断资本主义呢?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人们批评贝林格为首的领导说:“靠上层的考虑和活动就想解决一切,势必失去与基层和斗争的联系,党将被削弱。”^①那时,工人阶级中的重要阶层已经开始了反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和帮助执行这一策略的工会执行委员会,指责它们对安德雷奥蒂的“紧缩政策”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补偿的要求却显然什么也没有达到。

由于已经就业的工人通过罢工和其他斗争方式进行抵制,他们已经挫败了对他们生活水平最严酷的进攻;但与此同

^① 1976年10月21日重共《团结报》。

时，广大失业劳动者（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和妇女）的境况却越来越糟，几十万学生第一次就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对工人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与传统工会的不信任感在这些群众之中开始出现了。到目前为止，这种令人忧虑的进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2月和3月发生的大学生骚乱。类似的思想状况也在无产阶级中的“遭受歧视”的那一阶层中蔓延着。1967年4月末一位意大利共产党的崇拜者、意大利政治观察家写道：“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将可以说，在这个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意大利。一个是制度上的意大利，那里共产党取得了无法抗拒的进展；另一个是现实中的意大利，那里遭受歧视的人们、妇女、失业者和大学生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在他们当中共产党员已经根本不是受欢迎的人了。”^①

大学生骚乱刚刚告一段落，1977年3月，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在紧张和危急的气氛中召开了会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巴叶塔认为形势是“复杂的、充满危险和困难的。”^②卢波里尼认为，年轻人的造反暴露了党的迟误和缺乏准备，不能察觉最微小的进程和爆发性的矛盾。“天塌下来了，有一块已经砸在我们头上了，当心！不要再发生类似情况。”卢波里尼指出，“学生骚乱的原因是对前途感到空虚，对现状无法接受。他们感觉到自己受到社会的歧视，对民主的组织形式有一种不信任感。”他还说，“人们不把我们共产党人当做一个崭新社会的开拓者，而是看成现存社会的伙伴。”另一位中央委员卢西奥·利贝尔蒂尼认为，“人们对共产党和左翼寄予很大的希望。这

^① 马尔切莱·帕多瓦尼，见1977年4月25日《新观察家》。

^② 见1977年3月16—17日《团结报》关于意共中央会议的报道。

里指的不仅仅是那些支持共产党和左翼的人。希望意大利社会会有一个确实的转变。如果长久地叫这种希望落空，那么危险的就不是失去社会赞同而有利于极左，而是整个社会就有可能象本世纪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一样全面倒退，向右转。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个更广泛问题的信号。”利贝尔蒂尼还指出，“有一种想法，认为如果事情很糟糕，那么只要我们回到反对派的立场上去，就能恢复与群众的联系。这种想法对实际问题非常缺乏了解；我们在泥潭中行走，即使后退也不会安然无恙。或者我们冒险冲过去，或者我们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是只有在群众斗争取得胜利和政治得到进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冲过去。”

对中央委员会展开的讨论，科苏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是一个斗争的党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陶里亚蒂一直说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党，执政的党。”在1945至1947年短期参加了政府以后，意大利共产党一直是反对派。在这期间，意大利共产党是斗争的党，这一特点从来是无庸置疑的，同时意大利共产党希望它的第二个特点执政党能够再次得到确认。但是自从开始执行有条件地支持安德雷奥蒂政府的策略以后，问题变得越发尖锐了。巴叶塔本人在讲话中也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应当讲清楚，我们并没有参加政府，我们也不是政府，相反，我们认为这一届政府不适应国家的需要。确实，我们将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但也要表明我们既是一个执政的党，又是一个斗争的党。”他要党“置身于运动之中，把运动变成一场有觉悟的和统一的战斗。”他强调说，“目前的政治格局只有当它能使一种新的态势得到发

展时才有意义。”

巴叶塔立场在中央委员会中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明显地与阿门多拉的立场相对立。阿门多拉是党内右翼的代表。他主张“专门开展一场斗争反对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是今天工人运动及其政治路线的主要敌人，这种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同的特点。”阿门多拉还提出，在当前“改变与政府打交道的态度”是不适宜的。按照他的主张，党应更彻底地支持“紧缩”政策，而这种政策的资本主义本质恰恰导致出现歧视和社会解体的令人担心的现象。

贝林格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但是他的一些“亲信”的讲话和大多数人的意见相抵触。特别是同一种倾向相抵触的，这种倾向就是：起来造反，把公共秩序的问题交给国家的强制机构去解决，让它们去对付大学生和其他一些被歧视阶层的造反。最后发言的是那波利塔诺。他为这次会议做了政治总结。他说，“必须加速改变6月20日以后在政治关系中出现的格局。”这个结论在党后来的立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就是说，尽管意大利共产党还没有直接参加政府，但是在与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得到宪法承认的”政党一起制定一项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应尽快地改变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中采取弃权的作法，从而使党也能参加应急的议会多数。

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央委员会的整个讨论也无法回答讨论本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提出的疑问（尽管有一些发言不能说一点价值都没有）。意大利共产党总路线的一致性遇到了问题。意大利共产党几年前在大选中获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和其他左翼一起共得百分之四十七的选票），取得了巨大进

展：它还在事实上进入了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和国家机构，在国家主要的地区和城市的政府中都获得了席位。为什么仅仅过了几年，那个曾经聚集起来的广泛的人民社会集团这样快地又开始分化和解体了呢？为什么民主遇到了危险呢？为什么在群众中，在党内怀疑能这样快地代替了原来的信任呢？在那些“略有价值”的发言中，类似卢波里尼的讲话有特别的影响。他指出，党没能响应1968年运动提出来的伟大要求——实行抉择；波尔格纳指出，意大利共产党更多的是想维持当时存在的政治格局，而不是为克服当时的格局去创造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事情的由来并不是从6月20日以后开始的，而是更早。

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在1968年以它比法国共产党更高明的策略“骑上了老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目的一定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想阻止那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而不是把它引向一个进行过渡的全面抉择；他们都想限制这个运动自治形式的发展，把运动纳入制度化了的政治范畴，以避免和这种政治范畴发生冲突。那个运动创造了实行基层民主的组织形式——工人委员会，房客、失业者、士兵、下级军官的委员会，争取交通、用电和电话等价格的“自动调节”委员会，法官、医生、记者、警察委员会等等。这些有组织的形式使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内容的斗争目标具体化了。这场运动并没有象以前在欧洲一些国家中发生的那样一下子就消失了，它一直延续了十年。然而，这场运动没有把它的所有潜力都发挥出来。作为这场运动主要政治力量的意大利共产党也没有想这么做。这些实行基层民主的新形式和工

人运动与人民运动传统的形式从原则上讲没有客观的矛盾。相反，它们的结合和联系只能使新的社会集团更加充实和完善。但是，这些形式和它们的目的显然与政治范畴正式的法律界限有一定的冲突，有必要与现存的政治范畴决裂和重新组织这种范畴，而意共的战略是要尊重现存的政治格局。葛兰西的“阵地战”越来越变成一种渐进主义的模式。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了。什么“决裂”、什么“质的飞跃”完全不可能了。有人指责意大利共产党循规蹈矩、奉公守法，是议会迷。贝林格不止一次地否认那些指责，尽管如此，意大利社会的危机越深化，总是害怕“冒险”的意大利共产党就越强调它政策中关于循序渐进和恪守法律的主张。贝林格越来越把他的行动纳入制度允许的政治轨道，并在这个轨道内使社会运动服从联盟的需要。

向天主教民主党提出“历史性妥协”以便开始一个“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是执行这个战略的最终结果（意大利共产党说，这个“民主革命”1947年曾因冷战而中断）。正如贝林格在他1973年写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历史性妥协”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多数赞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人数要远远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以避免使国家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部分，避免这两部分之间的对立。贝林格认为，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对立和取得广泛多数赞同，要特别吸取智利以及其他党从前的教训（可能他还想到了西班牙的悲剧）。从原则上说，这样明智的考虑还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怎样”去实现这种考虑。显然意大利共产党想一举拆除已经残缺不堪的反共围墙（这堵墙是教会和天主教民主党三

十年来修筑起来的),使在天主教控制下的人民群众向左翼接近。这部分人一直是接受天主教民主党的组织和影响的。象陶里亚蒂说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还希望使天主教民主党内“人民的心灵”战胜“反动的心灵”,从而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获得多数赞同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样就能民主地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尽管有些道路能使你登上市长的宝座,但在政治上不是条条道路都通向罗马。当意大利共产党提出通过与整个天主教民主党达到谅解,其中也包括同作为意大利资本主义主要政治工具的天主教民主党领导层的达官贵人们达成谅解来实现上述目的时,意大利共产党不但没有把天主教民主党中的“民主心灵”争取过来,反而主动把自己的革命心灵献给了魔鬼。意大利共产党员现在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问道,“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斗争的党吗?”特别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即当资本主义需要执行极端的反人民政策的时候)要和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工具达成长期谅解的打算(即“历史性妥协”),只能使意大利共产党(还有工会的领导)克制工人和人民斗争的要求和方法,修改它提出的改革建议,使之变成现行制度所能接受的东西,并对这些建议做一些宣传(并不为其实施开展任何斗争)。这样一来,意大利共产党就只能制定和提出一个克服危机的真正的纲领性的主张,来反对垄断资本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张。但是,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这样做还能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阶层寄希望于自己,意大利共产党大选的成绩节节上升,控制了国家一些主要的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在这些地方,一般地说意大利共产

党给人的印象是比天主教民主党效率高,诚实,但永远不会超出制度允许的范围和规定。它的行动永远要符合与它的主要对手达成“历史性妥协”的首要目的。这就势必要妨碍利用那一部分在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国家机器中已经取得的权力,或者为使用这种权力造成困难。这就势必要妨碍使用这一部分权力来更有效地把失业者、大学生、妇女和其他最受危机之苦的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妨碍把这一部分人的斗争同在职工人的斗争统一起来;不利于通过代议制民主来发展基层的民主形式。在这种基层的民主形式中群众可以更直接更主动地参加斗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可由选举中的多数变成积极的、有组织的和富有战斗精神的多数。群众将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使命。

总的说来,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成就,在政治制度中不断“占据”要津,但是与此同时并没有随之形成一个经得起(以其觉悟程度、内部联系的程度和纲领的水平)严峻考验的社会集团。考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智利和以前的革命提供的两个教训中,除了要朝社会主义稳步前进,就需要使大多数人明确自己的目标;除这一条外,还有一条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绝不会坐视各人民阶级的集团人数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而无动于衷,除非他们相信各人民阶级的代表(政党、工会)不会进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观点看来是质的变革。(各个社会民主党正属于这类情况,但是共产党现在还不享有资产阶级的这种“信任”,有一些社会党即使曾获得过这种信任,也正在丧失。)我们假设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欧共党确实准备朝社会主义走。当一个准备朝社

会主义迈步的社会政治集团在大选中民主地、合法地取得了多数的时候，统治阶级就会求助于丝毫没有民主气味的程序，以阻止这个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如搞经济破坏，让官方和半官方的镇压机构进行挑衅，从思想上进行牵制等等，花样繁多）。这还未包括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危机可以同时在两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加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抉择更为刻不容缓；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以及意大利局势戏剧性地表明的那样）也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尖锐化，为统治阶级搞阴谋提供可乘之机。至于当一个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性质的集团民主而合法地取得了政权并真正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到那时，上面指出的反民主手段将变成采取最后一着——武装暴力的前提。

确实象欧洲共产主义说的那样，在掌握政权之前和以后，支持社会主义力量的协商一致规模越大，反动势力使用各种暴力的困难也就越多。反动势力当然不希望这种协商一致成为决定性的主宰因素。任何力量也无法避免出现我们说的“不明朗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阶级斗争空前尖锐，权力问题是首要问题（不光是政府的权力）。这就是说，要表达大选中广泛多数的意志，必须同时使能够表达这种意志的条件得到保障，这是其一；其二，要保障这种广泛多数的意志免遭大选失败者的暴力镇压。也就是说，议会斗争和各级代议制民主机构中的斗争都应得到群众斗争，即社会政治组织各个领域里的群众斗争以及国家机器和生产结构中的群众斗争的支持。这就需要发展和协调基层民主的形式以及把这些民主形式同代议制民主的各种形式协调起来。这是巩固各种社会联盟的唯一办法。

这些社会联盟包括传统的工人阶级、新的领薪阶层和象小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一切能参加到进行抉择的社会集团里来的各个阶层。这个社会集团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反垄断（当然也是反资本主义的）纲领，上述的联盟才能牢固。这个纲领应当根据危机提出的迫切要求把应急措施同较长时间内实现的改革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规划出更长期的改革打算，以一种新的发展规律逐步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但是如果象意共的战略那样，这个建设新社会集团的有权威的核心只是想与垄断资本的主要政治力量搞长期的妥协，那么所有上述的设想还能实现吗？把天主教民主党目前控制的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争取到这个社会集团里来确实是需要。但是意大利的一些左派乃至意大利共产党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如果在天主教民主党内部民主的人民阶层与为垄断资本利益效劳的阶层不进行决裂，上述目的就无法实现。难道他们这种提法就没有道理吗？很多观察意大利形势的专家们都证实，意大利共产党大部分领导人赞成和执行的“历史性妥协”的政策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威信（因为这种政策反而使天主教民主党能够制定出真正人民性的政策），阻碍了天主教徒中的某些阶层和分子向左翼的立场靠拢。这样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

伟大的意大利共产党正处于十字路口。不少人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可能使意大利共产党与天主教民主党达成全面的合作，以便治理危机，再次维持支离破碎的资本主义体制，发挥着象英国工党和西德社会民主党的类似的作用。不同的是，在意大利的条件下发挥类似的作用很难避免对人

民运动进行“诺斯克”式的镇压。党内也将发生深刻的斗争和决裂。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出现。意大利强大的工人运动有丰富的斗争历史和经验，是经受过锻炼的。丰富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多次证明意大利工人运动具有伟大创造性和战斗精神。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队伍已经对他们自己和意大利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也类似。意大利共产党同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当他们受到压力的时候，反应是很敏感的。在意大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个社会结构和各级组织中，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和地位就更大了。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意大利平均每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投共产党的票。如果再加上社会党、新左派和天主教徒中的民主人民级层的力量，这就不仅是意大利人民的大多数，而且还是一支最有觉悟、最有能力和最积极的力量。现在提出的关键问题（克服当前危机的积极出路也有待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寻求一种政策能把这支力量团结和一致动员起来，对国家进行深刻的改革，能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发动攻势，并使这些力量认识到同现在的这个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为了保卫民主，而且也是为了使它超越目前这种局限，以便使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发生作用。正如意大利共产党组织的党内外讨论说明的那样，无疑的一点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首先要从修改意大利左翼主要力量的战略开始。在极端主义的冒险和“历史性妥协”（即同阻碍形势所要求的急迫变革的根本力量合作）的冒险之间应当还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政

策可以推动意大利社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过危机不允许有太长的考虑时间了。

民主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一些人以前对意大利共产党政策某些方面的批评并不意味着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有问题，对这一点需要正确理解。我们认为，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唯一行得通的道路。问题在于把这条道路说成是单纯竞选主义、渐进主义和合法主义；说成是与资产阶级领导集团搞阶级合作路线。我们刚才比较仔细地分析了意大利的情况，因为那里总危机非常严重，因为那里对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所作的这种错误解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作用。这不仅对意大利左翼而且也法国和西班牙的左翼发出了警告。在法国和西班牙左翼中，无论共产党党内和党外对民主道路作机会主义解释的也大有人在。

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实际上是很普遍的。但是在那些称之为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仍然占少数，生产力的水平还很低，在那里（正如过去所发生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另一种类型的过渡性革命（虽然他们自己也把这种革命叫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革命中也需要“攻打冬宫”，开展游击战争和革命战争，需要经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或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其他政治—社会制度。尽管这样国家不能算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类似苏联的制度就属于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在

这些国家中也还会提出民主的问题。这时民主就成了同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本质上相同的东西。所以在东方国家里，民主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反对派主要的和迫切的目标，这不是偶然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主义抉择在客观上已经成熟，因为实行这条民主道路成为可能的相互依赖的两个基本的，互为依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首先，在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过程中，占人口的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这些人具有长期为民主而斗争的传统。他们在斗争中已经取得的那一部分成果使他们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们是一个需要并能理解社会主义改革方案的多数。当前的危机使他们的这种需要更迫切了，理解也更深刻了。其次，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过程本身使生产和人类的要求高度社会化了，这在客观上提出了实行集体管理和计划经济的要求。

但是这两个强大的客观条件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不过能在一个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至少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客观条件是能发挥作用和找到出路。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曾设想过这种类型的制度。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客观趋势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自动为自己开避道路的，而且因为客观条件本身也是相互矛盾的，本身包含了可以同时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提供依据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生产、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不仅部分地适用于社会主义，也部分地适用

于专制主义制度。后者的基础是剥夺群众的生产资料，那里由专家和官员们统治着，这种社会化还可适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机器人”社会，但那里却一点自由都没有。不管是在东方的国家里还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形式中，现在都已具备了某种制度的强大因素。如果当前的这场危机在不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情况下得以解决，那么这种趋势的影响将发生相当大的作用。

要争取社会主义的出路就要求那个客观上需要社会主义又能理解社会主义的多数变成主观上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准备斗争的多数。为了实现这种转变，通过普选表达大多数人的意志，虽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因为要考虑（所有历史经验也表明了这点）当普选真正危及统治阶级的地位时，他们是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普选。统治阶级的本质是反民主的。因此选举中的多数同时还必须成为一支有组织和不分散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政治集团的概念。这是一个以共同纲领和战略组织和团结起来的社会政治集团。它有能力采取各种情况迫使它采取的行动。

这样做，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这个在客观上向往社会主义的多数数的社会成分混杂。在组成它的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又给它们提供共同的客观利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出现了新的领薪阶层，即服务行业中的职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和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也起了很大变化）一起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新的阶层内部也是有区别的。主要

是上层和群众之分。它的上层和资本的利益联系紧密，而它的广大群众尽管不生产剩余价值但它与资本的关系和工人阶级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相似。但是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不同，由于分工、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各异，在传统的工人阶级和这个新的领薪阶层之间在很多方面又是有矛盾的。由工业、商业和农业主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比以前有所减弱，但仍在社会的机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特别是在意、西），这些阶层的作用比在讲英语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作用要大。有些社会集团，它们构不成一个阶级或阶层，但却日益表现出自己的突出作用。它们所具有的各不相同的特点，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社会舞台。这就是妇女、大学生和整个的青年一代，还有在长期的结构危机中被排斥在生产之外的人。

由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同资本对立最深，由于在其创造剩余价值中的地位 and 所属工会与政治组织的威力，在这个成分复杂的整体中它仍是一支最革命的力量，因此它也应该成为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集团中的领导。但是，新的领薪阶层也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一道发挥着愈来愈大的领导作用。他们与资本的对立将越来越尖锐而同时他们的阶级觉悟也日益提高并且愈益拥护社会主义。

要把这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客观多数变成社会主义的主观多数，变成团结在同一个纲领和战略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社会政治集团，必需有多种形式的联盟、多种形式的关系及多种形式的一致，如政党之间的政治联盟，或者更广泛一些，包括工会、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联盟、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议会、

市政府和代议制民主的其它机构。社会政治集团结构中不同形式的相互排斥并没有客观的基础。相互排斥只能妨碍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极端复杂性。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根据历史的传统，现行的民主范围，各政党、工会、群众组织、基层民主形式和各代议制民主机构的相对影响等，这个集团结构不同形式间的相互结合也可以是各不相同的。这不应受到妨碍。但是每一种结合的形式都有自己的可能性，也都受到特有的限制。政党不能取代工会，工会也不能取代政党。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议会或其他形式）不能取代基层民主的形式，反之也不行。阶级的组织起不了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所能起的作用。这个道理可以以此类推。

在社会政治集团各种结构形式中，政党即葛兰西所确定的智慧的集体，发挥着总结、概括、全面思考、制定基本的战略和策略的作用。但这里指的政党不是一个唯一的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所有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象发达资本主义这样复杂的社会就更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分成对立的阶级，而且也因为被统治的阶级和阶层内部也是各不相同的。除了这个社会原因之外，还因为即便在单一的社会集团（例如传统的工人阶级）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选择。这已为所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一种神话，实际上应象政党一样的工人阶级（政治、工会和文化形式的总和，形成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因此，只有一种政治联盟（由广义的工人阶级最有代表性的力量领导）才能在由被统治阶级、阶层组成的社会政治集团中充分发挥总结、思考以及战略战术总指导的作用。这个政治联盟包含了各不相同

的特性，但各个政党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为了使各政党真正在集团各社会力量间起到代表和协调的作用，这些政党自身应当同这些社会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基层民主、代议制民主和群众组织接受这些社会力量的监督和影响。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和其他人民力量的各党派都应当是真正民主的，接受群众的批评与检查。欧洲共产主义各党虽然有一些积极的演变，但自身的概念和内部的运转（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仍然不能完全符合上述的需要，因此，使这些党难以为建设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集团做出贡献。

正如历史上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个集团只有通过斗争和行动才能建立起来。各个阶级、各社会阶层及其组织只有在具体斗争的过程中，而不是按照事先规划的框框，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政治力量。（我们所说的被统治阶级集团的结构特点，也只不过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事物的一种“概括”，一种“模式”，它对于发挥未来斗争中的主动性是有益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一切斗争对新的社会政治集团的形成都能做出贡献（或都能做出同样突出的贡献）。如果斗争带有狭隘行帮主义特点，那它不但不能把这一斗争的领导力量同较接近的社会阶层团结起来，反而会使他们分离。如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的要求同政治权益的要求没有系统的联系，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人民内部的矛盾，争取改善各自生活和捍卫在这方面已获得的进展的迫切性，以及统治阶级的政策（这是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也是使政治脱离社会的政策，使一部分社会阶层的权益要求同另一部分社会阶层权益要求分割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政策），这些都是争取统一的斗争道路中出现的新因

素。为了切实有效地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社会政治集团团结和建设好，必须把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组织的眼前利益和近期的目标结合并协调起来，使之成为争取更长远目标的步骤。在共产党内（和其他左翼政党内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政治行动（至少是总的政治行动）看作自己的属地，操纵在自己的手里，而把工会、群众组织、居民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让它们只是致力于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使它们对一些大问题无法发挥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倾向反映了一种统治者的思想，反映了一种认为政治只是专家们干的观念。这种倾向当然要阻碍建设一个由于本身高度一致，又有好的战略和纲领，而能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中战胜统治阶级反抗的社会政治集团。

为了使这条道路能够真正成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而不是陷入仅仅是“改善”资本主义的道路，各劳动阶级的集团必须把夺取政权做为自己的根本目标，以便推动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结构的改造。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结构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因为国家深深地渗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范围之内，这也就意味着经济也“渗入”到国家机构之中。

要解决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光靠把现存的生产资料逐步变为集体所有（欧洲共产主义者一般只这么提这个问题）是不行的；还要对生产资料本身和科学技术进行改造，使之同生产关系的新特点相适应。科学和技术、劳动的分工和组织并不是中性的，不能不经变化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科学和技术与劳动的分工和组织需要

改造和革命化。这种改造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某些方面可以相对短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教训告诉人们，要从过渡时期一开始就着手办这件事。在争取政权斗争的阶段，除了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之外，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可以取得某些局部的成果，例如在企业内部反对劳动组织中专横独断的做法和一些方面的斗争，或者在争取制定发展科技的方针，使之为满足社会消费的那部门生产服务方面，在保卫环境的斗争方面等等。

在夺取政权和改造国家的关键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战略表现为通过选举活动和群众斗争在现存国家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虽然在实践中选举活动经常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一旦大选使左翼联盟带着“社会主义过渡”纲领进入政府，它便通过国家机构和体制的民主化实现过渡进程。不管这些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观念怎样（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认为，只要不寄幻想于那种完全渐进的发展，那种同统治阶级不发生尖锐对立，也没有质的决裂的进程，只要不把民主化理解为仅是政治人物的更替，而能意识到这是国家机构和体制本身结构上的变革，意识到这是这些机构和体制与市民社会联系形式的变革，并要朝着使这些机构和体制接受人民越来越有效的监督的方向发展，那么欧洲共产主义各党所执行的战略是有现实基础的。

在这种战略思想中，力量对比有利于新社会政治集团的决定性变化应当是一系列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如在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和强制性机构内部民主和社会主义潮流的发展（在学校这类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民主和社会主义潮流可能

发展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至少要使暴力机构不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意愿)；再如在议会中，代议制民主机构中和政府中取得多数；又如国家机构之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增长等等。鉴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复杂性，“权力中心”的多样化恐怕是更为可行的一种设想，比通过一系列的对立和决裂，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并取得成果还更加可行。这里说的是通过一系列对立，而不是根据过去革命的那种“模式”，通过一次对立(当然，说的不是武装对立)就解决问题。关于那种所谓的“模式”还有不少东西需要探讨。即使对以前发生的那些革命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也无法轻易确定那一个是“决定性对抗”。在俄国革命中，究竟是十月“勇敢的打击”(列宁有时这样称呼)，还是红军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呢？西方革命同落后国家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西方，革命要么不发生，一旦发生，就是主观上向往社会主义的客观多数人的事业，是一种社会政治集团的事业。由于这个集团包括了社会最基本的活力，因此它就能够开创所描述的那种民主进程。但是如果把这一进程说成纯粹是演变性质的、没有剧烈对抗的、甚至没有武装冲突的，那就太理想化了。社会主义力量非常希望避免对抗和冲突，自始至终希望实行民主机构的和平作用，不过这就不仅仅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力量了。

不管是在争取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还是在民主取得政权以后，使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集团能够团结起来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纲领。这个纲领应包括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把马上要采取的措施同长远的改革结合起

来，把参加这个社会政治集团的不同阶级、集团、阶层的不同利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协调起来。不过要在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动力的推动下进行。正象经验表明的那样，纲领中有关经济的那一部分很快就会成为它的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环节和部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紧密地相互依存。如果发生任何深刻的动乱，如果这种动乱又不意味着实行一种新的发展规律，保证生产继续下去，保证分配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持续下去，并使大多数人很快地看到一种更好的前景，那么整个社会就将无法忍受这种动乱。还要考虑到，统治阶级就是丢掉了政府，也只是部分地失去了权力，他们总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由于进行深刻的变革而引起经济体制不可避免的混乱，把责任推到人民力量一方，特别要钻人民力量经济政策中可能出现的空子。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办法。他们用这种办法来改变这些或那些社会阶层的态度，使他们脱离人民集团，重新把他们吸引到反动营垒中去。

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上台，它执行的经济政策和要实行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造如何同“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纲领“一致起来”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成为法国当前关于“共同纲领”辩论的中心问题。也成为意大利左翼关于急需一种这类纲领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意大利左翼要求在新的发展规律中把紧急状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逐步打破资本主义的规律。这是在意大利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不得不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在西班牙还没有那么尖锐地提出来。因为左翼（他们至少这样认为）所处的地位离可能上台执政还很远。传

统左翼政党主张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
围。可能要提出这种“一致性”问题，这是指在没有超出资本
主义范围的前题下，传统左翼提出的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
同摆脱危机的资本主义政策是互不相容的。但是这种冲突并
不是因为左翼经济政策代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抉择才造
成的。左翼经济政策介于平托和巴尔德莫罗的主张之间，在
西班牙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至于欧洲共产主义所主张的“国家民主化”，在争取政权
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可以部分地着手进行了。一旦民主和社会
主义力量取得政权，就将其进行到底。在这方面一个关键性
问题是在国家机构中仅仅更换领导人员是不够的，那怕他们
是用最民主的办法挑选上来的也不行，因为国家机构还是那
些为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那些结构。这
种机构应当改变，要扩大人民对代议制机构的真正的干预，使
人民对这些机构的工作能够进行监督。除了其他的条件以
外，还要求建立一种向人民群众及时通报情况的制度。另一
方面，为了保障民主的进程，保存和发展传统的代议制机构是
完全必要的，但也同样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发展我
们多次谈到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以便使人民能够更广泛
地进行干预。代议制民主同基层民主的结合应能找到办法使
人民有可能广泛的参与对国有化的企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
制的其它形式、基本服务行业和其他经济要害部门的领导和
监督。同样，也要参预对其它的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等领导
和监督。这样，就有可能逐渐在各级建立一种自治制度。这
个制度应接受总计划的指导，既有自己的伸缩性，又保持相

互之间的联系。这一总计划是民主地决定和科学地确定的。国家的民主化当然包括地方分权，有力地推动在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实行地区性的地方自治和民族地方自治。

一般地说，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关于国家民主化的概念显示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传统的影响。这不仅是对党而言，而且也是对社会的组织而言。“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概念超过了“民主”的概念。“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传统即便不否认和反对基层民主的作用与自治，起码也倾向于贬低基层民主和自治的作用。上述倾向的存在是由于要实行党的领导作用这种意识还很浓厚，这样就产生对于群众的积极性和自治能力持保留和不信任的态度。即便有自治的“形式”也被认为缺少党的“含义”。

显然，代议制民主与基层民主，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具有创造性的潜在能力，同时也含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关系可能导致一种破坏性冲突，反革命势力可以从中间渔利。有时极左组织主张搞“越轨行动”或搞“双重政权”，并把它作为克服传统组织一旦取得政权后就要实行的“改良主义”的灵丹妙药。这种做法除了垮台以外，很难再有什么其他的结果。但是如果左翼取得政权和占据了代议制机构的领导地位后，不能和群众组织、群众运动以及基层民主机构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破坏性冲突将无法避免（虽然任何一个极端主义派别不会有意识地主张搞这种冲突，然而这种冲突会自发地向前发展）。这不仅只是（或主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和政治方法的问题。

题；这个问题还在于对力量对比要有一个现实的估计，不只是消极地承认它，而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去改变它；在于要把现实主义与坚定不移的信念结合起来、把谨慎和勇敢结合起来，避免表面化和策略化的解决办法，防止机会主义的破坏作用，不要在群众中散布毫无根据的幻想。同时，领导阶层每时每刻都要寻求基层的合作与帮助（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各式各样的合作与帮助），这不仅把基层当作“靠山”，还要当做解决当前问题不可缺少的对话人。但基层也有责任。这些责任特别是落到了基层最积极和最有觉悟的分子的身上，落到了基层领导人的身上（在基层也同样有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细胞里没有领导人，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些基层领导人每时每刻都要正确地估计形势中存在的危险，时刻都不可忽略反革命的威胁。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他们的上级想用危险和问题的复杂性来为自己开脱的话，危险与复杂性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情况。

在我们前面讲述的过程中，我们提到了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一些原则立场。这些原则立场涉及它们对社会主义、对自身，或者对自身建设及作用的观念。我们认为，这些原则立场与这些党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内容和要求有矛盾的地方。有必要把这些原则立场概括地总结一下。

1、在正式文件中，这些党为它们当前的社会在今后的发展方向提纲挈领地确定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同这些党关于“社会主义是民主和自由的高级阶段，也就是彻底贯彻的民主”这一原则宣言相符合的。然

而这个原则宣言显然又是同这些党承认东方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作法相矛盾的。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怀疑这一原则宣言有多大的坚定性和意义。

2、这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下列想法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筑起了一个障碍；它们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它们声称，这就使它们“具备了比其任何工人阶级政党都更有资格在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去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引自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宣言》）。另一方面它们反复声称“它们的政治路线始终是正确的”，这是自然的，因为人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吗！从这一想法也自然地引伸出这样一个提法，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起领导作用，因为工人阶级在新的社会集团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没有那样一个政党、集团或个人可以声称只有它们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因为可能有其它的工人政党，它们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表明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党并不多，当然现在的共产党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理由了。试问，使各共产党几十年来都无法摆脱斯大林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模式，使这些党在几十年中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保持一种错误的观念（直到现在才改正过来的观念），使这些党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历史的极限的这种办法究竟是什么的“科学方法”呢？至于这些党在分析事物的现状和预见它们的将来方面以及在政策和其他问题上的无数错误，

我们就不谈了（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几乎每年都预言佛朗哥主义的垮台已迫在眉睫，而且会彻底垮台）。如果将这些错误收集起来，将可搞成一部大的、有教益的汇编。确实，其他的政党也没有少犯错误，但至少这些党没有打着科学的招牌。另一方面，各个共产党本身的结构和运转并不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完全一致。同其他任何一个科学的方法一样，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本质要求进行自由的讨论，公开承认错误，不承认不可侵犯的权威和批评完全自由。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本是在共产党之外得到发展的，而这些党并没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而是表现出理论上的极端贫困。这些情况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象法国共产党那样只以把大部分工人从政治上组织到党里来为依据，说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的话，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英国工党和其他的工人社会党也就都是这种情况了。

这种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会给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设置障碍。因为这种观念把工人阶级的其他力量（其他政党、工会、群众组织等）置于附属的地位。那些力量是不会接受的。这种观念最后就会变成分裂和对立的因素，还会妨碍工人阶级自我领导的能力得到发展，而这种能力的发展是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举出很多反面的教训。

3、另一个与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相矛盾的因素是缺乏内部的民主或民主不够。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尽管和斯大林主义时期相比有了一些进步，但是民主集中制仍然还只是集中制。各个共产党非常容易对最困难的问题取得完

全一致的意见或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对于再突如其来的转变也很容易通过；在这些党内，尽管事态刚刚雄辩地证明原来的预见和路线并不是正确的，但却仍然能非常容易地承认是正确的；只要领导人能对最高领导者的立场和权威唯唯诺诺，他们就能几乎是终身地占据领导的位置；领导班子的组成、产生与增补虽然要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但事先早有安排和内定，而这种安排和内定决定性地制约着代表大会的组织与运转，领导人的选举是如此，通过领导提出的政策也是如此。在这些党内，不在党的报刊或其他报刊上公开讨论问题，广大党员和群众无法参与，基层组织的声音也很难反映上来。凡此种种现象都是缺乏真正内部民主造成的后果。这些党这么搞，还冠之以禁止各种倾向的美名。

以上几点提出了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按照自己的设想，共产党成了社会主义主要的领导力量，而它本身却不讲民主，这样的社会主义又怎么能是民主的呢？如果共产党同时还承认可以有不民主的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那么这个共产党要是仍然和现在一样搞下去，它领导的结果不还是那样的社会主义（即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吗？对于这类问题，这些共产党反驳说：党和社会是两回事；如果党接受了多元化，尊重选举的民意，维护各种自由和主张党与国家分开的话，这种顾虑还有什么道理呢？道理其实就在于表面上说的和法律的解释是一回事，而事实却又是另一回事。从表面上和法律上看，在东方的制度中有多元化、自由、民主和党政分离，即苏维埃民主或人民民主。但是，事实上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而这个权力机构从骨子里就是反民主的。这一事实使法律的外衣

完全失去了真实性。让我们假设一下，在某一时刻这些国家掌握全部权力的共产党开始讲民主了，这样就立即开始一个民主化的进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发生过的一样）。一个在社会中起着至高无上作用的党的性质和这一社会性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很难否定的。如果各共产党坚持搞他们现在的“民主集中制”，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或者党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只占次要的与从属的地位，因为随着劳动群众觉悟的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他们将不接受这样的党；或者由于一系列原因以及群众的不成熟，这些党最终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朝专制国家的方向演变的危险性则是非常明显的。还有第三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总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就是欧洲共产主义党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下去，成为真正民主的党。就这方面的情况而言，一些党比另一些党有更多积极的迹象，但是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步骤。例如西共在其《纲领—宣言》中宣布，“争取到自由后，党内将就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合法的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和应具有什么性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在事先开展广泛讨论的和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的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就我们正在建设的群众性政党的组织方法及组织形式问题作出决定。这样的党一定能保障西班牙革命向前发展，保障在民主中实现社会主义”。是事实与这些目标相符呢，还是现行的作法将这一“广泛的讨论”、“民主的选举”等变成虚构的想象。实践将对此作出判断。（为使前而讲过的东西更加充实，提出以下两点：为什么一定是西共注定来“保障西班牙革命向前发展”？还能有不包含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如果它不管执行者的美好愿望如何，不致于导致一个新的不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或变成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现代化提法的翻版，那么势必需要一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唯一的党）。这些政党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党也好，都应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党，要与劳动者、推而广之要和社会现实保持紧密的联系（一方离开了另一方都无法存在）；指导这些党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向一切社会科学有价值的贡献和现代思想的进步潮流开放，使革命理论在西欧得到发展；这些党必须去掉党“领导”群众的列宁主义的陈旧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反科学的和专制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它非常容易蜕变成操纵群众；这些党不仅不搞对领导人的迷信，而且是鼓励群众的独立见解和批评精神，加强群众对政党、工会、其他群众组织、代议制机构以及基层机构的干预和监督。

民主的道路尽管走起来很不容易，但在（南欧）和整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唯一可能行得通的道路。法共、意共和西共可以为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做出相当的贡献，但是这不仅取决于它们的政策，还取决于这些党的内部发展，即民主不仅在社会上而且也在党内得到发展。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一百二十七年前，马克思天才地预感到欧洲如果不及时进行“第二次伟大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它将在美国这个当代年青和上升着的国家手中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

世界优势。当时有一个更直接的另一种类型的威胁笼罩着欧洲，这就是泥足巨人沙俄的威胁。这个泥足巨人的武装程度足以充当反对任何一个欧洲革命运动的宪兵。确实，正是沙皇的军队进攻了称之为“人民之春”的1848年革命。

那时出现的情况成了后来欧洲形势的先兆。在所有的革命尝试都失败以后，欧洲从雅尔塔会议被划分成势力范围，实际上失去了独立。美国的多国公司、装甲车和火箭分布在西欧，人们看不见任何要把它们撤回去的意图。白宫决定哪些政党可以或不可以参加政府，同时可以规定相应的条件和限制。另一方面，横跨欧亚的钢铁超级大国已经取代了软弱的沙皇帝国。在那里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含义早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超级大国把俄国疆界之外的另一半欧洲变成了自己的卫星国。

鉴于这种历史演变，做为欧洲工人运动的长期发展和西方先进思想产物的一个真正社会主义幼芽，开始在地平线上破土而出了。然而它刚刚开始萌发便遭到了双重的威胁。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既存在矛盾和紧张，也有一致的地方，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双方都不容忍在西欧出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每个超级大国出于自己的考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办法争先恐后地对欧洲左翼进行攻击。正是这个欧洲左翼提出了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主张。

基辛格—索南费尔特^①的学说（这个学说是由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他的东欧问题顾问1975年12月在美国驻欧洲

^① 1976年4月14日法国《世界报》。

使节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提到过)就是以此为目的的。这个学说的实质就是建议莫斯科搞一个“帝国之间的历史性妥协”。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代表这样向“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代表扼要地说道,先生们,我们承认你们也成了世界超级大国。这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了。让我们达成一项长期的谅解吧。我们可以帮助把你们的社会也变成你们人民向往的消费社会。我们关心东欧帝国的稳定,因为东欧人民对独立与自由的向往,可能会造成爆炸性局势,可能把我们拖向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希望的毁灭性的对抗之中去。我们承认,共产党可能进入欧洲政府一事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基辛格直言不讳地说:“苏联人不是造成我们在西欧面临的不稳定局势的因素。一个共产主义的西欧对苏联人来说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可能他们更希望共产党不要在西欧掌握政权。”)。但是,请你们让我们来解决问题吧。当你们迅速地消灭了在捷克出现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尝试的时候,我们连一个指头也没有动。现在是关于意大利或是法国问题了。它们属于我们的势力范围。

吉米·卡特进入白宫以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历史性妥协”会从实质上被取消或发生根本性变化吗?美国新领导集团的世界战略是三边委员会制订的。新领导集团的主要首脑人物: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卡特本人,还有国务卿万斯都是从这个三边委员会里出来的。(这个委员会是1973年成立的。所以称三边委员会是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发达资本主义的三个中心,如美国、日本、西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形成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的

更全面的一体化。)①这一战略的各种分析家们指出，美国新的领导班子与基辛格路线的不同点与其说是本质的不如说是形式上的；与其说是战略上的，不如说是策略上的。②这当然不是说，这种不同就不重要。特别是在对待西欧左翼和对待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等问题上就更是这样。例如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影响在东方集团内部被削弱可以加强美国同莫斯科谈判的地位。无疑，这就是现在苏联集团内部搞“维护人权”运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它是卡特搞起来的。如果人们仅把卡特掀起的维护人权运动视为是美国内政、外交需要的一个策略手腕（看作是因越南问题、水门事件等一系列的暴行和丑闻面遭到的严重损伤，为“美国民主”的声誉涂脂抹粉），那就只能说明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所代表的一切简直是视而不见。

就左翼可能在某些欧洲国家中上台执政一事，“三边委员会”的一些声明，特别是卡特本人的声明与基辛格、黑格将军和福特政府的其他代表进行的直接威胁截然不同。这些声明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发生了根本变化（甚至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曾这样看）。直到1977年4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人们才把问题搞清楚。首先，声明披着一件自由的外衣，声称“我们相信，一个国家共产党的地位是由本国人民和政

① 三边委员会由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总部设在美国，二百名成员中美国人占七十四人。其他人当中还有本届法国政府首脑巴尔，菲亚特大老板阿格涅利和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经理藤野中次郎。

② 迪亚前·约翰斯通：《“三边委员会”的战略》，参见1979年11月《外交世界》。

府决定的问题。我们不想介入就此做出决定的过程”。但接着在声明中美国又露出了帝国主义的嘴脸，声称“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将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在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与西欧各国共事的能力。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落到了某些政党的手中，而这些政党的特性、思想和实践都和我们基本的民主原则与共同的利益格格不入的话（这些共同利益是我们同西欧关系的基础），那么我们同西欧共事的能力势必将受到阻碍。”^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进一步说明基辛格和福特提到的两种政府的概念。一种是共产党“统治”的政府，另一种是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那么“参加”到了什么程度可以忍受，又到了什么程度就算是统治，而无法忍受了呢？可以推测，组成一个共产党占多数的政府，尽管它符合大选的民意，白宫也是不会容忍的，也不会容忍共产党员担任某些部的部长，如国防部、内政部、外交部。不过，白宫采取这种态度，最一般，也是最具体的解释或许就是因为华盛顿不能允许真正主张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府存在（不管在这些政府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是多少）。要反对这样的政府，华盛顿是不乏其手段的，而且无需进行武装干涉。三边委员会显要成员之一的乔治·巴尔1976年5月对《华盛顿邮报》说，与其象基辛格那样进行威胁，倒不如“提醒意大利人民，如果共产党进入政府，他们的经济福利就要遭到危险。而且由意大利的欧洲邻国提醒意大利要比美国去提醒的效果好得多。当然，美国要参加协调的战略，但只是充当默默无闻的角色。欧洲共同市场

^① 1977年4月8日《世界报》

显然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非常厉害地压缩意大利的经济活动，诸如限制农产品进口，停止地区性援助等等。其他成员国还可以把意大利从共同体中开除出去作为最后的惩罚”。^①不久，基辛格和福特在波多黎各会议上就开始执行这种“协调战略”了。这一点已从德国总理施密特的讲话中披露了出来，这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左翼的愤怒。密特朗说，“以为西欧各国人民容忍长期接受新神圣同盟的束缚那是可耻的。”^②卡特在他当选总统的前夕也毫不迟疑地对“波多黎各战略”表示支持。但他批评基辛格和福特威胁搞得过于露骨。卡特说，“施密特的态度是得体的，他说（如果意大利共产党进入政府）德国对意大利的援助将会遇到问题。我认为，如果民主国家作出坦率、有力和公开表示，那充其量不过是合法地运用一下自己的影响而已。”^③1977年4月6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不正是确认了这条路线吗？如果左翼政府在罗马、巴黎或其他欧洲的首都上了台，真的要进行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革，那时不必指望美帝国主义会执行什么其他的政策。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西欧是它世界战略的关键，不仅在战略和军事上是这样，在经济上也是这样。西欧是多国公司的一个主要基地。还有一个我在第一部分已经说到的有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即：西欧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内部问题，这是因为

① 迪亚纳·约翰斯通：《“三边委员会”的战略》，参见1979年11月《外交世界》。

② 1976年7月20日《世界报》，施密特7月16日在波多黎各举行的会议上透露，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参加了政府，西方各国决定停止对意大利的经济援助。

③ 迪亚纳·约翰斯通：《“三边委员会”的战略》，参见1979年11月《外交世界》。

西欧的经验有可能传到美国的工人和进步力量中去。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对西欧可能发生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如果不是敌视，起码也是防备。这里有条根本理由。第一，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这就是苏联国内以及它的整个集团的秩序问题。一个民族独立的、民主自由的、多党制的和工会独立的社会主义对苏联帝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榜样，会促使他们也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不要忘记，1968年侵占捷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在那里发生类似的抉择。第二，在西欧开始出现的社会主义进程将影响目前的现状，严重搞乱两个超级大国寻求“帝国之间的历史性妥协”的探索，从而给苏联集团经济上目前日益需要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带来困难。对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和原因，左翼力量是很清楚的，但对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是由于左翼力量对东方国家的本质搞不清楚，被表达那种立场的奥秘的推论搞得晕头转向。当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之流训斥西欧共产党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掉进了机会主义泥坑与资产阶级和解”时，他们并不是在发表革命演说，而是在要求西欧共产党重新就范，屈从莫斯科的指挥，承认勃列日涅夫新斯大林主义独裁是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这些党接受指教，势必失去与本国人民的联系，放弃民主的旗帜，不去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力量结成联盟并最终堵死西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对他们是否能够改变西欧共产党现实的变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但是他们希望能破坏这些党，现

在不能立即实现,在将来实现也好。希望能够象已经在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那样扶植一批旧式的党反对那些党。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革命论述”中,他们利用这些党存在的或者他们臆断的缺点,利用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罪过,从“左”的方面向这些党发起进攻,以便能够利用“革命词句”、陈词滥调和苏维埃主义的神话在这些党内留下的影响。经过这种意识形态的炮弹的狂轰滥炸之后,开辟出一个地盘,使人们在欧洲共产主义者及其同盟者的权力面临困难考验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同他们团结在一起。利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炮弹的基础就是假设欧洲共产主义的做法要失败,从而创造条件,以便充分利用这一失败,向离经叛道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发起一场决战,挑起这些党内部分裂。凡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这种分裂已经实现了。继希腊、奥地利、西班牙和另一个国家之后,最近的一个就是瑞典。目前在法国共产党内部正在开展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一个亲苏派冒头了。亲苏派把多列士的遗孀多列士·维美徐当作自己的英雄。她曾是法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1968年,她因不赞成法共领导反对侵捷的立场而辞去了上述职务。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她又跳了出来,在《世界报》上连篇累牍地对爱伦斯坦的立场进行猛烈攻击。她通过批判爱伦斯坦的立场也批判了法国共产党对苏联的立场。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人们都谈论说,多列士遗孀的重新出现同东欧国家加强了对法国共产党公开和隐蔽攻击是相吻合的。仅在多列士遗孀的文章发表的前几天捷克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说法国共产党(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党)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背叛。法

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活跃分子认为，不能排除无条件跟着苏联跑的派别制造分裂的可能性。

在西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治社会力量腹背受敌。它们在自己的战略中必须考虑到如何面对大西洋彼岸的超级大国和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超级大国保护自己。因此，西欧的社会主义问题包括了各国民族独立，各国防务以及维护整个西欧独立的问题。首先要警惕那个在当前拿西欧独立为赌注的超级大国，其次要警惕可能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危险。在后一个危险中，西欧的独立事业与苏联集团国家的独立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要忘记俄国各族人民是向往真正自决的。因此，尽管与第三世界的情况有所差别，但对帝国主义保持民族独立的问题恰恰也是当前欧洲大陆的现实要求。这个问题与社会主义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处于这种复杂、困难和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缺少一个共同的国际政策（从所有的迹象看，它们也回避这样做），只是在基本上属于防卫性的立场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经验摸索着。这些党都接二连三地仿效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越来越接受大西洋原则。当他们遭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攻击时，大西洋原则对它们实际上可以起到保护盾牌的作用。假设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一旦进入了政府，那个超级大国的攻势将更加猛烈。然而，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坚持这种立场的同时，必须制定一项政策，这一政策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考虑到每时每刻力量对比情况（特别要看人民力量的觉悟程度和发动情况，要看自己有否可能从外部得到声援，要看如何利

用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矛盾，要看到第三世界反帝国家的支持等等)。这一政策就是逐步削弱美国在欧洲的统治。否则欧洲共产主义各政党利用大西洋原则来保护自己的立场会把自己引进一条死胡同。

上面谈的问题和另一个超级大国提出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在这方面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政策基本上也是防御性的。在这条战线上和在那一条战线上保持谨慎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把它们同东方制度拴在一起的那种“思想意识的纽带”，人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不执行一种更积极的政策，声援苏联集团国家中主张改革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呢？这些力量正在不断地增长，天天都在期待着得到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迄今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种全然不够的，顾虑重重的反应。很清楚，如果东欧国家连起码的民主和独立进程都没有开始的话，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也将会受到封锁和威胁。这和当初由于西方革命失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遭到孤立和出现人们所熟识的倒退情况是一样的。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国际政策的第三个方面是欧洲团结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欧洲一切社会主义力量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作为劳动者和人民的代表积极参与欧洲团结的进程。这是有各种实质性原因的。其中最普遍、最原则的理由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中完全建成，更不用说在西欧这样一些小国了。当前的生产力有一种国际化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限。国界已经成了生产力

发展和计划性的障碍。欧洲国家要想从两个超级大国那里重新取得独立，必须在它们相互之间进行越来越密切和自觉的合作，因为只有这样它们的独立才能有保障，才不至成为社会主义的障碍。还必须建设一个劳动人民的团结的欧洲，它势必会逐渐向东欧扩展，在那里民主与独立也会随着为自己打开道路。实现这样的前景无疑需要社会主义力量参加到欧洲目前的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反对多国公司、反对垄断资本和反动力量统一的政策基础上。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在执行这项政策时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些机构的框框之内，主要还要进行一致的斗争，开展人民各阶级各种全国性团体的联合行动。这要求人民各阶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要进行密切的协调。到目前为止这类协调还仅仅是个萌芽而已。由于最近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对欧洲议会选举采取了新的立场，法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和西班牙两个党在欧洲政策上的分歧看来有所克服。但制定一个共同政策的问题还全然没有解决。不仅共产党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就是共产党与社会党或确实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别之间也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

最后一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的问题，要在欧洲发展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欧洲的主要进步力量要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需要欧洲劳动者的声援，就象欧洲的劳动者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一样。如法国社会主义教育、学者研究中心建议搞的“地区性义务”或发展双边关系等，就是一些实际措施。世界的经济局势迫切需要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和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同“第

三世界”反帝力量达成一个共同的方案。

* * *

欧洲共产主义还在犹豫，不敢正视自己，甚至对自己还有些怀疑，一面肯定，一面又否定。不管是对国际问题还是对各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三个主要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到目前为止，都回避进行深入的讨论和采取共同的立场。正如意、法、西三国共产党总书记马德里会议表明的那样，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加深同莫斯科的对立。可能这不光是从策略上考虑，而有其历史渊源。但是，它们所以抵制搞共同行动，可能因为对各自的政策还没有把握。是按社会主义党的主张，把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退化成简单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呢，还是想办法创造条件对资本主义危机提出社会主义的抉择呢？三个党还没有最后打定主意。这三个党都宣布党内要民主化，但是也都还没有决定不搞反民主的集中制。三个党都说它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主义在过去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但是在全部澄清历史真相的问题上仍在继续后退。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欧洲共产主义是有希望和可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但是也有可能成为共运史上最后的一章。不仅共产党人应当感到疑虑，所有主张社会主义的力量都应当感到疑虑。因为如果缺少了共产党人，那就会象没有了社会党人一样，要在西方考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怎样的困难啊。假如欧洲共产主义的实践没有使自己的诺言兑现，假如社会主义没有能战胜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将再一次得到恢复，在难以预见要持续多长的时期内，欧洲通向社会主义的这一条狭窄、艰难和充满危险的道路（如

果否认这一点,那纯粹是幻想)再一次被堵死。但是这还是一条可能走得通的道路,应该试一试。因为取代社会主义的唯一抉择仍然是野蛮。

四、朝“西方分裂”迈出的步伐

莫斯科 1977 年 6 月份的《新时代》杂志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攻击。对两个月前在苏联发生的点名攻击事件，本书已经分析过了。莫斯科发动的这次攻势是这些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书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问世，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分裂”。有些读者认为这样提法太过分了。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和苏联领导人猛烈的反驳提供了新的和有说服力的材料，事情很可能就是朝着西方分裂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正象我们在第二章所说过的那样，早在 1976 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苏联共产党和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主要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恶化并达到了“危机点”。从在 1976 年 6 月召开的欧洲共产党柏林会议上，苏联集团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第一次发生公开的、全面的对抗起，冲突就不断加剧。尽管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谨慎，1977 年 3 月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共产主义首脑会议”还是使同一天在索菲亚开会的苏联集团领导人感到新的惊恐。如果说目前的这场攻势是在索菲亚会议上策划的，那是非常可信的。不久后出现的卡里略的书成了导火线。

苏联发动这场进攻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卡里略这本书，由于书中对莫斯科和欧洲共产主义争论中最敏感的一点：苏联制度的性质问题上（我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里说过的问题），作者的想法比自己原先的提法走得更远了，他已经不限于“原始社会主义”的提法了。他还提出了一些怀疑苏联制度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还是含混的，不明确的。一旦卡里略挣断了把他同莫斯科拴在一起并使他附属于莫斯科的“思想意识的纽带”，他就能够深入分析苏联对外政策自相矛盾的内容并做出判断。这同他对苏联制度性质的判断比起来，苏联领导人就更难以接受了。因此，莫斯科无法保持沉默。

第二个原因是，同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相比，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是一个更容易摧毁的靶子。他的政治基础和在国内的作用目前都要比马歇和贝林格脆弱得多。因此，卡里略就成了合适的靶子。尽管《新时代》的文章把欧洲共产主义分为“好的”和“坏的”，企图各个击破，但实际上，攻击矛头是指向整个欧洲共产主义的。莫斯科非常清楚，不能把卡里略目前的观点当作偏离其他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总路线的病态东西。相反，他的观点就是这条路线的理所当然的结果。正象我们所强调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导原则（不实行民主，就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否认东方制度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事实证明在那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有些“辩证”的把戏（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是很熟练的）很难阻止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党早晚弄清这一主导原则的含义，走西班牙共产党走过的路。对那些要求意大利

共产党谴责苏联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人们，意共《再生》^①杂志回答他们说：“我们再说一遍，不行”，“这仍是个政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实际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当今世界具体的均势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换句话说，不能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来对待，而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不管东方国家的实际性质是什么，这些国家自认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它们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他们说他们是只老虎，那么我们不要说他们不是老虎来激怒它！因为这只老虎你说它用什么做的都可以，唯独不是纸糊的。

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推测错，贝林格和马歇关于东方国家的真正性质问题的想法和卡里略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决定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策略立场的政治因素是不同的。什么时候亮出他们各自的想法，这首先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因素使得卡里略急于引人注目地表示他独立于莫斯科和他对民主的信仰。这一因素严重地影响到西共在大选中选票下降，尽管西共在反独裁的地下斗争中取得的成绩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因素就是西共尽管从1968年起就对东方专制制度的某些方面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是它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包括广大工人群众面前）的形象还是同东方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显然，由于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人们很难了解它的这种变化，不然的话，它目前的这种立场本来是可以冲破各种束缚、对改变党的理

^① 1977年7月1日《再生》杂志。

论、改变党的内部结构、对调整它的政治路线和提高自己的民主威望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卡里略感到遗憾的是苏联对他的攻击不是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发生的，不然，“我们就可以多得几十万张选票”。^①苏联的攻击要是在二十年以前（苏共二十大时）发生，或至少在十年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发生，那又会如何呢？但毕竟西班牙共产党，尽管在捷克问题上走在前面，但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和其他许多共产党一样，大大落后了，因而都吃了苦头。西班牙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近四十年反法西斯独裁斗争，客观上要求把民主问题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西共终于迈出了这一步，然而由于没有赶上时间，因而这一步并没有给西班牙共产党增加卡里略所说的“几十万张选票”。西班牙共产党之所以能迈出这一步，正是因为它在西班牙政治进程中还是比较软弱的，因而它的总书记没有被那些制约着马歇和贝林格的因素缠住。卡里略迈出了这一步，什么也不会失去，只会争取到人们对自己的信任。

马歇和贝林格拥有牢固得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这就使意、法两党有可能而且必须首先考虑外交上的需要。这一需要出自这样一个考虑，即意大利共产党越来越有可能进入政府，法国共产党也要为参加政府做准备。同莫斯科保持某种关系已经包含了国家之间关系的多方面的因素。（保持同苏联的某种关系对平衡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有好处。同时，还可以继续维持与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关系，不至于被社会党或

^① 1977年6月27日在马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引自1977年6月29日《工人世界》报。

其他人取而代之。) 尽管上述策略有很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这不只是个机会主义的问题。如何能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又能被东方国家所接受，且不至于导致彻底的决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又极为困难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声援这些国家中要求改革现行制度的进步力量的问题)。之所以困难，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要么你们承认我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我们就撕破脸皮。

卡里略同马歇和贝林格的处境不同，看法也不同。这一点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共产主义“首脑会议”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在这次会议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发表声明揭露东方国家侵犯人权的问题。苏联的战略家们很了解他们在欧洲共产主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中可以得到好处。苏联6月23日发动的攻势就是要有策略地利用这些矛盾。只要读一下《新时代》的文章和观察一下这一冲突后来的发展情况，就很清楚了。

确实，《新时代》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两种“解释”做了严格的区别。第一种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力量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解释”。^① 尽管《新时代》对欧洲共产主义本身的提法有一系列保留，但它还是承认这种解释有有价值的一面，即：确定了这样一个无疑的事实，“西欧几个党的战略思想，从更广泛的含义上讲，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战略思想都有着共同的基础。”然而，紧接着《新时代》又急忙指出，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列宁早就指出，必须考虑每个

^① 1977年6月26日苏联杂志《新时代》法文版。

国家的特殊性！但是除了上述尚有价值的一点外（《新时代》强调指出），由于各种理由，“欧洲共产主义”概念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竟列举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三国共产党的领袖一开始曾经援引过的那些理由，即：有一些属于这类性质的国家不是欧洲国家，但是基本理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涉及到的不只是上面提到的战略的一致性，还涉及到“谁知道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然而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如果指真正科学的共产主义的话，那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之奠定了基础的，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遵循其原则的那个共产主义”。不管怎样，对于这个“解释”还是可以讨论的。第二种解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解释流传很广，一开始，这种解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人物搞出来的。”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就属于这一类。《新时代》杂志说，这类欧洲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一，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二，诽谤现实社会主义，即诽谤那些已经建立了新社会的国家，首先是苏联；三，否定欧洲共产党人共同得出的一切结论，否定他们在争取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利益的斗争中，以及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事业的斗争中所确定的目标。〔卡里略〕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要保持欧洲被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的状况，而且还要强化侵略成性的北约。”《新时代》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注释道：“无需提出具体的证据来证明类似的立场既不符合和平的利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实际上，确实没有必要再提出什么具体的论据，这就如同没有必要

提出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这类指责也是毫无道理的一样。在斯大林独裁建立以来的五十年中，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开始是在莫斯科搞内部清洗，现在又搞到卡里略头上来了。在这中间，他们搞了多少类似这样的谴责，这已经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惯常的官僚主义伎俩。而且每当出现一个新“转折”而需要否认这些指责时，他们又总是厚颜无耻地加以否认。问题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谁也不把这种指责当回事了，因为他们是不会说什么真话的。然而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却应当认真对待，因为它往往暴露出某种企图和关注。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新时代》杂志对卡里略进行点名攻击的某些方面有必要进行考察。

为了替他们自己提出的第三点谴责进行辩解，苏联对卡里略关于西欧联合问题的主张（这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公开主张，意大利共产党也有同样的主张）进行了粗暴的歪曲。卡里略在他的书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欧洲，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中，我国将保持自己的特点。”^①《新时代》的文章认为“该书的作者主要的打算是实现以反苏为基础的西欧‘联合’”，而这种打算又是和“把欧洲的民主力量与共运分裂为两部分的企图联系在一起”，使西欧“走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的‘第三条’道路，或者叫‘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卡里略原来的思想竟被歪曲成这个样子了。《新时代》杂志最后说，“毫无疑问，圣地亚哥·卡

^①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134页，巴塞罗那“Critica”出版社1977年版。

里略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解释是迎合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利益的。”

实际上,除了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的主张外,卡里略在他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欧洲联合的问题和西班牙共产党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解决,西班牙共产党进入政府的问题虽然不是次要的问题,但也不是眼前就能办到的。在这些问题上,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相反,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欧洲”政策倒是关系到莫斯科的实际利益的,因为这两个党很快就有可能执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在发挥这种作用。即使他们没有参加政府,也会对各自国家的政治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攻击卡里略的时候,《新时代》竟以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因为正是意共在这方面走得最远,所以很自然,在就其他一些问题上攻击卡里略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然而一提到欧洲联合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便立即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说的,于是他就重申意共的政策。

在攻击卡里略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苏联政府越来越害怕出现一个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团结的欧洲,之所以害怕,不仅是因为这样的欧洲会成为一个能同苏联这个军事上的庞然大物(它位于“曙光”升起的东方)进行较量的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还因为出现这样的欧洲,必然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掌握领导权的社会主义欧洲。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忧虑的不是团结独立的欧洲会局限于西欧,恰恰相反,这种欧洲的民主和

社会主义性质会对东欧产生一种日益增大的吸引力，从而出现一种倾向于解散军事集团，倾向于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两个欧洲统一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总之，克里姆林宫害怕的不是欧洲将成为美国的欧洲（因为美国的欧洲最多也不过就是现在的欧洲，就是德斯坦、施密特和安德雷奥蒂的欧洲）。苏联真正害怕的是一个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的欧洲。卡里略在反驳苏联的攻击时，暗示说（他在自己的书中也暗示过，但没有这么清楚），“人们能这样解释莫斯科在这一点上的立场，即：因为存在一个美国控制的北约的欧洲，因而就有理由在另一边有一个由苏联控制的另一个欧洲”。^①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苏联的“控制”，苏联地盘上的“现实社会主义”将会很快导致一系列新的“布拉格之春”。

最后，莫斯科担心的是东方国家毛主义顽固、猛烈的反对同西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对汇集在一起。双方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欧洲共产主义的欧洲主义战略同毛主义的欧洲主义战略结合起来。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报导中国共产党似乎开始改变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的问题不是没有用意的。还有，铁托访问朝鲜以后，北朝鲜的领导人就表示同情欧洲共产主义。

但是，苏联对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进行攻击的主要问题不是“欧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对莫斯科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而是“苏联问题”，就是说，在沙皇帝国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

^① 6月27日记者招待会。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东欧真是社会主义的话，它对西欧的吸引力早就使现今的一些问题不复存在了。然而现实的历史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问题除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外，还有着无法估量的政治实践意义，这是无需论证的了。(正象我们在前面括弧中提到的)过去有，将来还会有这种意义。具体到欧洲共产主义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两方面的问题(在本书“关键的问题……”一节中)。现在我们想再补充谈一谈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并不奢望能谈透彻。

首先，国际工人运动是否承认在苏联存在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对苏联统治阶级来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是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的一着，也是在苏联人民中在意识形态上为这一制度辩解的重要的一着，苏联领导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步。应当记住(并不象有些头脑简单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大部分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员之所以显得被动和顺从，不仅是由于庞大的党政机构的高压和警察迫害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通过真正娴熟地神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遗产，达到使人在意识形态上自我异化的那套有效办法的结果。社会民主党否认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对莫斯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几十年来官方意识形态反复宣传，社会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特别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出一个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榜样来。左派组织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但是如果威望最高、最重要的共产党(过去是南斯拉夫的党和中国的党，今天是西欧的党)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极其严重的。(卡里略在他的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一点也不新鲜，很

早以前，其他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以及无党派的学者都谈到过了，不过，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再次把它们提出来，这件事本身在东方各党和人民中，更广泛地说，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象对待铁托主义、毛主义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样，莫斯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断绝同这些党的关系，声称这些党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已经落入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手中。需要建立忠于“马列主义”的新的共产党来对付这些党。不是苏联领导人犯了错误，老毛病又复发了（甚至连这方面的专家也常常这么说），而是新的统治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在不同的场合莫斯科都采取特殊的策略，有时还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但是最后不是那些敢于怀疑苏联制度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宣告投降，就是决裂。正如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发生的那样，这方面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那一天，大概就是从制度内部提出问题的时刻。

对欧洲共产主义，苏联领导人通过《新时代》的文章宣称，战斗将是激烈的，但必定要以胜利告终。他们说：“同资产阶级分裂主义者、同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思想塞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斗争终将胜利。因为欧洲的共产党人不止一次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一定会挫败他们队伍中新的分裂阴谋”。当前，“资产阶级分裂主义者”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暴露了自己可恶作用的入，他们，如卡里略，甚至怀疑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实质和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利他主义的精神。另一类是马歇和贝林格等人（还有一部分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还没有横下一条心来。但是这两部分人都得到这样的

警告：“尽管斗争是长期的，但是不会是仁慈的。”首先，莫斯科开始了准备工作，它又是动用思想意识形态的重炮，又是利用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内部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分歧搞阴谋诡计，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只要观察一下《新时代》发表的这篇文章所揭开的这一冲突的新阶段，其发展情况是不难看出这一点的。

首先说明问题的重要事实是：同反对毛主义的时候相比（更不用说同反对铁托主义的时候相比了），这次莫斯科的行动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遇到的抵制要大得多。听到《新时代》吹响冲锋号时，苏联集团的各共产党当中也只有保加利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一股脑儿地向欧洲共产主义猛扑过去。其实，这两个党从来都是这样干的。波兰人、匈牙利人，甚至东德人一开始则是吞吞吐吐，苏联只好对他们施加压力，才能使他们积极投入战斗。古巴人据说没有转载《新时代》的第一篇文章，而只是转载了后面几篇不那么激烈的文章。罗马尼亚人（他们在苏联集团内部持反对的立场，这是人所共知的）出来替卡里略说话。齐奥塞斯库接见了卡里略。在那些不属于苏联集团的掌权的共产党中，南斯拉夫的党维护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最坚决，并谴责苏联又采取1948年攻击铁托时用过的“斯大林主义的做法”。这是铁托访问莫斯科前夕的事。朝鲜人也支持卡里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国人和越南人到现在还没有表态。

正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帮助苏联的只是向来都是紧跟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小党，如美国共产党，还有就是奥地利、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共产

党。(不久前,一位共产党记者曾把这些党说成是克里姆林宫安插在西欧共产党中的“第五纵队”。)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国内派),自然还有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程度不同地出来支持卡里略和西班牙共产党(因为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这个名单是不完全的)。

总而言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和以前类似的情况相比,莫斯科这次行动受到了大得多的抵制,但是这种抵制是含糊的,有限度的。

首先,那些出来为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说话的党,都是各干各的(而莫斯科的攻势却是由苏联共产党一手策划和指挥的)。《新时代》发表那篇文章之后没有几天,卡里略就接见了《世界报》的记者。记者问他,三个主要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意共、法共和西共)是否将进行共同的防御。他的回答很简单:“不,我们各自保护自己。”^①

其次,实质上,每个党向莫斯科争的是独立,是解决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主权。一般他们都回避谈及卡里略在他的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只有少数情况例外。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意大利共产党就是这种例外情况,他们重申了自己的欧洲政策。还有瑞典共产党总书记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声明,圣地亚哥·卡里略那本书的主要思想和瑞典共产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有些党虽然也提出有必要进行“科学讨论”,但并不真的去研究那些问题。可以说,根据其他欧洲共产

^① 1977年6月28日法国《世界报》。

主义政党公开采取的立场，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性质提出怀疑的关键性问题上，卡里略实际上是孤家寡人一个。例如法共，它的讲话都是尽可能谨慎的。它在《人道报》国内版上发表过一篇短评说：“除了一本书外（这本书有些章节是可以批评的，但不要谩骂和中伤），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还遭到了直接的攻击……”（法共还在维护卡里略呢！）。①

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最明确地分清了自已同卡里略的区别。他们同时又在西班牙共产党和苏共之间进行调解（特别是意大利人）。齐奥塞斯库在会见美国记者代表团时，为卡里略辩护，但明确指出：“不要把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的社会主义同西方共产党主张搞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②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看看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再生》杂志的一些见解就明白了。显然，齐奥塞斯库对怀疑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不感兴趣的。贝林格也曾以政府官员的口吻说，他希望把同莫斯科的关系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的基础上。他们两位谁也不想涉及这个棘手的问题。还是让那些没有政治职务的理论家们去研究这一问题吧！他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这个卡里略何必要在与他无关的事情中插一手呢？”

众所周知，苏联刚发起对卡里略的攻击，意共的一个代表团立即赶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繁忙的会谈。联合公报用了“诚挚的气氛”一词，这通常是表示有立场分歧的一种委婉说法。意大利《晚邮报》表达了意大利报界一致的意见。它说，就其语气和内容来看，这一公报倒更像是两大国

① 1977年7月7日法国《人道报》。（加重符号是作者加的）

② 1977年7月20日《宣言报》。

之间的公报,而不象兄弟党之间的公报,就连表兄弟都不象。率领这个意共代表团的巴叶塔声称,“在莫斯科,当前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都涉及到了,特别是那些有分歧和争论的问题(明显指同卡里略的冲突)。”“双方还就上述问题极其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一点在公报中没有反映出来。从意共代表团成员回到罗马后发表的谈话看出,意共代表团在政治上还是支持西共总书记的,但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问题上和他保持距离。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关于制度的性质问题。巴叶塔说,“莫斯科不是梵蒂冈”。这显然是不同意卡里略关于莫斯科是共产党的宗教裁判所的说法。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马卡卢索透露,“苏联人表示不想进一步激化与西共的争论,更不想同其他西欧共产党开展这种争论。他们希望能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这种讨论不排除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不允许对它全面否定。”^①换言之,苏联人答应,只要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把事情做绝,否定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他们就可以缓和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攻势。意大利人接受了这笔交易,并负责去说服西班牙人。不久,意共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马德里去和西共领导人进行讨论(代表团由二流人物组成),代表团带去的肯定就是这个使命。《新时代》杂志后来攻击卡里略的语气也就比较缓和了。这是苏共与意共妥协的结果。但是,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运动在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报刊上仍然时起时伏、时紧时松地继续着。

莫斯科的谋士在采取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行动时拿卡里

^① 1977年7月5日意共《团结报》。

略开刀,是因为他们不仅考虑到西、法、意三党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且也考虑到在它们每个党内特别是在西共党内可能会出现分歧。虽然“炮弹”早就准备好了,可是苏联一直等到西共中央开会总结自己在大选中失败的时候才发出去。他们以为能在西共主席伊巴露丽和其他一些领导成员那里得到某种支持。伊巴露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苏联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更不适用于西班牙;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怀疑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对苏联的点名攻击采取什么对策问题,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情况说明,尽管事态并不完全象苏联人预料的那样,但莫斯科的估计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反驳《新时代》文章的声明只限于重申西共的独立性,重申西共的“欧洲共产主义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当触及到禁区时,西共中央的声明只说,莫斯科的做法“使得我们无法把象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存在的现实社会主义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①有一位人所共知的执委主张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苏联没有民主和自由。为了不和伊巴露丽发生冲突,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全文发表《新时代》的文章,并刊登一篇进行详尽驳斥的文章。现在三个月过去了,这个决定还没有兑现。是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调解使西班牙共产党的计划发生了变化吗?不管怎么样,在《新时代》杂志发出挑战后的几周内,卡里略有力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不仅利用党的宣传手段而且还利用国内外群众性宣传工具,强烈谴责苏联的做法。最近笔

① 1977年6月29日西共《工人世界》报。

者得知，卡里略应“私人邀请”（应耶鲁大学的邀请）即将访问美国。

现在（1977年9月中旬）还难以预见西苏两党冲突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冲突很可能日趋尖锐，当然也不会直线上升，有时会缓和一些。眼下，莫斯科企图把欧洲共产主义的批判限制在它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在这一方面，莫斯科和法、意两国的共产党暂时取得了一致。莫斯科想利用这两党来平息“西班牙的怒火”。对于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来说，它们也面临着一种矛盾，即为了争取执政，它们一方面要同莫斯科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要与东方“社会主义”泾渭分明。

莫斯科打的不只是一张牌。它在上述基础上谋求妥协的同时，也准备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一旦步卡里略后尘要与苏共背水一战时，采取断然的“解决办法”。欧洲共产主义党承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向这些党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工作者要求讨论东方国家的性质问题，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久经锻炼的广大干部也要求讨论这个问题；东欧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会放弃对内部的反对派进行镇压，面对这种镇压欧洲共产主义党该怎么办；还有社会党伙伴们和极左组织向这些党施加压力等等。莫斯科预感到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可能会同自己背水一战，于是就要在这些党内制造分裂，扶植一批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党的忠于“马列主义”的政党。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到最后，那怕人数很少，莫斯科也会毫不犹豫地扶植一个“共产党”来反对那些支持卡里略立场的党。

要记住，如果欧洲共产主义政策不能同其他左翼力量一

起有效地使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变成明显的现实，如果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在群众眼中仅仅是社会民主党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的一种翻版，那么这些党和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不再支持主张搞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了。如果其中一部分人走向极左，同时怀疑东方的“社会主义”，另一部分人就可能被莫斯科用来攻击欧洲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想所迷惑。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一直在窥视着这种时机，耐着性子为利用这种时机而创造条件。

在法国，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寄希望于两种可能性。要么在大选中左翼联盟分裂，马歇那个与欧洲共产主义发展有联系的领导班子垮台；要么左翼联盟在执政后失败。在意大利，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期待着意大利共产党现行政策导致党群关系以及基层和领导关系的破裂。在西班牙，他们希望西共与民主中间派联盟党（苏亚雷斯和国王的党）搞“历史性妥协”的现行政策，会使卡里略的领导班子在党和群众的主要核心中失去信任。卡里略越来越深入地执行这项“历史性妥协”，建议成立一个全国联合政府，主张从最忠于佛朗哥主义的右翼（弗拉加的党）到西班牙共产党都参加这个政府。西班牙共产党这样做是模仿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然而意共这个政策有强大的基础。意大利共产党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意大利整个社会和国家结构中势力都很大。天主教民主党内部左翼力量也很强，在工人和人民中也有真正民主的影响。在西班牙则不存在任何这方面的条件。正象选举结果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共产党还很软弱。除加泰罗尼亚地区外，西班牙共产党的选票还没有超过百分之六。尽管它拥有最强的工会

力量，但是工人社会党和其他党的工会也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民主中间派联盟党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相同的地方也很少，无法成为大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治工具。民主中间派联盟党不是在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它在最后时刻才脱离佛朗哥主义。它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更不象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那样在内部有一个有影响的左翼力量。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的关系同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关系正好相反，至少在议会中是这样。在6月15日的大选中，西班牙左翼力量在关键地区都取得了胜利，后来的形势使左翼在力量对比中越来越有利。在不长的或更短的时期内，左翼在议会中取得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真要更替政权就不只是要求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而且要在国家中组织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社会政治集团。这个集团要拥有一个改造社会的具体纲领。除非西班牙国内政局发生意外的变化，否则在这个集团中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只能是工人社会党。工人社会党必须同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结成联盟，但是到目前为止，工人社会党还没有在它的战略计划中提出这个政策。西班牙共产党呢？它努力同右翼搞“历史性妥协”似乎胜过同左翼搞联合，而且还推动工人社会党朝这方面努力。这个“历史性妥协”政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卡里略在西班牙右翼中得到了高度信任。如果把这一点看做是美国邀请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一个原因（而不光是由于他在莫斯科面前表现勇敢），人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在卡特和三边委员会的政策中，利用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利用这张牌要达到两个目的：削弱苏联集团

(鼓励这个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欧洲共产主义对反对派有煽动作用。)和同南欧的社会党一道帮助欧洲资本主义摆脱他们的困境。莫斯科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使西欧芬兰化。苏联想在前面提到过的基础上同欧洲共产主义达成妥协。(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联共产党同意大利共产党的会谈比卡里略问题更重要。)针对卡特打破欧洲均势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是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大规模对抗,而是为了使双方寻求的“帝国之间的妥协”对自己有利),苏联采取了维持现状和均势的策略。勃列日涅夫会说,要么改变雅尔塔协议,要么维持雅尔塔协议,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他还明确指出,第一种办法只能导致核大战,而第二种办法则保障和平。面对这两种选择,欧洲共产主义党提出来的主张(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团结的欧洲)就好象是个漂亮的海市蜃楼。但是如果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左翼获得了政权,并在人民大众智慧的“帮助”下有能力通过广泛民主而真正开始向社会主义前进,那么情况是可以改变的。有很多理由可以使人悲观,然而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前事情总是这样的。

1977年9月